中國近百年史講話

曹伯韓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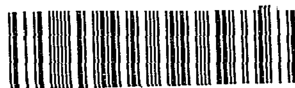


中國近百年史講話

曹伯韓著



致用書店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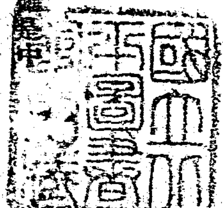
目次

第十講　內戰中的外患

第一講　鴉片戰爭及英法聯軍之役

爲什麼從這兒講起

中國近代史，一般人都是從鴉片戰爭講起，因爲這次戰爭，的確是中國史的一個大轉變點。在鴉片戰爭以前，中國是一個閉關自守的國家，不和外國通商的。就是和外國通商，也只是在邊界上施行的小規模的互市而已，這種互市大半是外國方面主動，中國人是不高興和外國人通商的。再退一步說，就是中國人有些和外國人通商的，但那在整個中國當中，只算得九牛之一毛，於整個國民經濟不發生決定作用，於整個國家政策也就不發生多大影響。那時候中國的國民經濟，是以農業和手工業爲基本，所謂自耕而食，自織而衣。在這種基礎上面的商業，不過是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彼此有無相通。因此到處有定期的市集，所謂趕墟趕場，還保留着「日中爲市，交易而退」的古風。便是那南船北馬會集的交通要道，也只有那由手工業造成的古老城市，除少數特殊產品必須和較遠的地方交換外，大部分東西都只是在附近不遠的範圍內相交換的（這就是封建時代商業的特點）。可是在鴉片戰爭以後，外國人強迫我們把大門打開，和他們大規模通商，從前的情形就一天天地變



了。不但古老的城市變成了花花綠綠的洋貨市場，就是鄉下的農民，也用起瑞典的火柴和美國的火油來了。洋貨如潮水似地湧進來，銀子如潮水似地捲進外國人的荷包裏去；而中國人的土貨，成本貴，貨色差，簡直銷不出去，勉強跌價賣，又賺不到錢。於是弄得人民生活，一天天艱難，社會的不安也一天天增加，農工百業荒廢，國家府庫空虛，到處發生紊亂的情形，時常聽到槍炮的聲響，有分教「戰爭、暴動、革命般般到」，「兵刀、水火、瘟疫一齊來」。老年人都說「世界變了！劫數難逃！」其實這是世界大勢所趨，什麼劫數不劫數呢？

中國史和外國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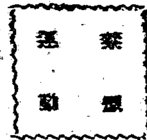
不過要明白現代中國的變化，光是讀中國史也是不行的，造成鴉片戰爭以來的這個局面，一半是我們自己的落後，一半卻是外國的侵略，所以除看清自己以外，還得看清楚外國是個什麼情形，他們為什麼要來侵略。懂得中外的大勢，然後可以明白現代中國的由來。只是我在這裏，不能談外國史，所以恕不將外國侵略中國的緣故，源源本本，從頭細說。這裏單講英吉利國，他是歐羅巴洲的一個島國，人民向來善於航海，慣常在大西洋沿岸做海盜。大約是三百年前，英國工商業漸漸發達起來，恰好那時候葡萄牙、西班牙等國在海外經商，得了好多金銀財寶回來，不免掀動了英國人的發財之念，於是英國朝野上下，都提倡商業，主

破到海外去發洋財。到了一百五六十年前，就是十八世紀下半期，英國的新式工業又產生了。那是因爲想多拿一些貨物到海外去兜售，以便多賺錢，又因爲貨物暢銷，做貨的廠家就百般地要增加生產；尤其因爲在海外發了財的人，資本充足，要找個投資的出路，於是有些聰明人就發明機器出來，來實現工業的革命，比方紡紗機經過三次的改良，就能同時紡一百五十根紗，比之從前的生產量要加多一百五十倍了，又如蒸汽機的發明，使發動機器的力量偉大無比了，這樣，就使得工業的規模一天天擴大，產量一天天加多（資本主義的生產制度於是確立了）。而因爲工業大發展的緣故，影響到商業方面，也更見擴張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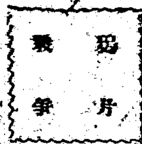
原來在資本主義的初期，工業製造品的銷行國外還不是很重要的事，主要的還是商業。那時商人用商業的欺詐和掠奪去搶金銀，不一定賣正當貨，販黑奴，販鴉片，無所不爲。英國人初來中國貿易，輸入中國的貨物，棉織品並不多，主要的都是鴉片。英國人販鴉片，是以印度做根據地的。英人在印度設立了一個東印度公司，那個公司是以商業爲名，其實在政治軍事各方面都暗中活動，布置爪牙，一心要滅亡印度的。經過多年的經營，果然把印度淪爲英國的殖民地；自此以後，東印度公司的權力更了不得，於是印度的鴉片生意，就由該公司

專利，而運到中國販賣的鴉片，數量就越大了。



中國自清雍正朝至嘉慶朝，累次禁止鴉片入口，但多在廣東一隅禁止。商人則將鴉片在其他口岸賣買，而貪官污吏又從中得利，包庇縱容。所以鴉片進口到了一八三六年(清道光十六年)以後，每年有三萬箱以上，至於白銀的漏出，僅廣東一省，每年漏至三千萬兩。而吸食鴉片者，上自官府紳士，下至工商優隸。以及婦女、僧尼、道士，隨地都是。當時有見識的大官如黃爵滋、林則徐等都上奏朝廷，痛切陳明利害，主張嚴禁鴉片，林則徐的奏摺裏面說：「煙不禁絕，國日貧，民日弱，數十年之後，豈惟無可籌之餉，抑且無可用之兵。」道光皇帝讀了，十分感動，馬上就下上諭，派林則徐為欽差大臣，到廣東去，專辦查禁鴉片的事。林則徐在道光十九年(一八三九年)到了廣東，發出佈告，嚴令外商將所藏的鴉片繳給政府，並且具結表示再不裝運鴉片，如有違反，一經查覺，煙即沒收，人即正法，決無異言。那時我國沒有受不平等條約的束縛，官府命令，外商是不敢不遵依的，所以就繳出二十多萬箱鴉片，共值現金六百多萬元。林則徐就派人把鴉片推到虎門海口去銷燬，從六月三日(按：近年來我政府規定的禁煙節就是「六三」)起，花費了好多天的工夫才把它銷燬完畢。林則徐知道英國人不服氣，會要動刀兵，又在廣東沿海設備

炮台，佈置防軍，準備對敵



果然英商寫信回國請兵，英兵在道光二十年（一八四○年）到了廣東海面，開始進攻。但因爲廣東防務嚴密，竟不能攻進。英軍沒有辦法，只得把兵艦開到福建浙江的沿海去進攻。那時滿清政府，朝中並無明白世界大勢的人，一般封建貴族，地方官僚，大概都輕視外國，以爲世界上只有中國強大，因此毫不防備，像林則徐那樣胆大心細的人是少得很。於是英軍就打進了浙江地界。又把兵艦開往天津的海口，把一個駐在天津的直隸省總督琦善嚇得屁滾尿流。琦善連忙上奏給道光皇帝，埋怨林則徐惹出禍事，主張同英國人講和。滿清政府根本無所謂國策，這時就聽了主和派的話，把林則徐撤職，流配到新疆，派了主和的琦善到廣東去。琦善一到廣東，就把防務撤了，答應賠款七百萬元給英人。英國方面趁勢又要求我國割讓香港。同時英國海軍統帥伯麥爲人狡猾，一面講和，一面又乘廣東沒有防備，調兵進攻虎門，佔了兩座炮台。清政府聽了這個消息，悔不該聽信琦善的主意，以致上了洋人的當，於是撤了琦善的職，派奕山代替他，仍舊對英作戰。

原來琦善聽說英軍攻佔了虎門外面的兩座炮台，當夜就通知英方，承認割讓香港，英國人也就不客氣，馬上在香港就蓋起房子，修起碼頭來了。後來清政府決定再戰，琦

善就沒有再向英方提起條件的事情，英方因爲正式條約沒有成立，認爲是琦善的緩兵之計，就令臥烏古少將等從印度率部增援，直入珠江口，佔了許多據點。各國商人正在進行調停，而清政府聽到英人已經佔據香港的消息，正在大怒之下，一面命將琦善用囚車解囘北京，一面促弈山大軍兼程前進，調停就不成了。弈山率兵數萬，抵廣州，和英軍接觸，大敗，弈山及各主要將官嚇慌了，準備裝做士兵逃走，臬司（按察使司）王廷蘭說：「我們有十倍於英方的兵力，爲什麼就棄城逃走？請你把兵權交我，我誓死收囘失去了的炮台。」弈山不許，命商人伍榮韶和廣州知府余寶純到英國兵營，向臥烏古行九叩首禮，呈遞弈山請和的文書，於是簽訂休戰條約，限五日內先償付英軍軍費六百萬元，其餘的事以後再談。弈山認爲這六百萬是廣州人民生命財產的代價，除由官庫支出四百萬外，其餘兩百萬應歸廣州市民担負，就向商民進行搜括。同時英國兵在廣州街上耀武揚威，姦淫搶刼，惹得一般民衆心頭火起。道光三十一年（一八四一年）陰歷四月初十日，廣州三元里民衆萬餘，舉起「平英團」的旗幟，襲擊英軍。英將義律陷入重圍，正危急間，知府余寶純來到，傳弈山將軍令，叫民衆放出，那時候民衆對於官廳命令是肯服從的，所以就把義律放走了。後來民間有一種俗話說：「老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老百姓。」這眞是簡捷地說明了中國的整個大勢。

英軍依照休戰條約退出廣州，弈山以爲平安無事，關於英方要求賠償煙價及割讓香港的條件，旣不向北京報告，也不向英方表示，英方催問起來，他就推說皇帝不答允。英國人大怒，就調軍艦北上，沿海進攻。英軍一連攻佔廈門、舟山羣島、鎭海、寧波等處，勢如破竹，清政府命弈經率領大軍收復浙東，又被英軍打敗。英軍進攻乍浦，乍浦的砲臺是清政府特聘俄國築城家監修的，很堅牢，但砲兵看見兵艦，就心慌手亂，發砲不能命中，有少數軍隊堅強抵抗，終於失敗。英軍於是佔領乍浦。臥烏古正在犒賞士卒，忽接到印度總督命令，叫他進攻長江。英艦隊到吳淞，守兵聞風逃散。英軍直進長江及黃浦江，先後佔領上海、鎭江及南京，在上海鎭江曾遇到激烈的抵抗。

南京條約

英軍將攻南京的時候，清政府嚇慌了，主和的空氣又濃厚起來，於是派耆英、伊里布、牛鑑爲媾和全權大臣，到南京議和。三全權與英國大使璞鼎查談判三天，議定了南京條約。條約的主要內容是：

(一)中國政府納賠償銀二千一百萬元與英國政府（包括軍費，鴉片損失費等）；

(二)中國政府以香港全島永遠割讓與英國；

(三)中國政府將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處開爲通商口岸，准英國派領事

住居，並准英商帶家屬自由來往；

(四)英商貨物照例繳納進口稅（稅則須秉公議定）後，准由中國商人販運進內地各處，所過稅關，不得加重課稅。

這次條約是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年）七月議定的，二十三年，清政府派耆英爲欽差大臣，與英使璞鼎查交換批准了的條約，並另訂中英通商條約十七條，規定關稅等等，於是五個商埠的開放，逐漸實施起來。

從前中外通商，限於廣州一處，又限定只有政府特許的十三商行可與外國人通商，自從南京條約成立，通商口岸增加了，一般商人和外國人通商也沒有限制了。南京條約是打開中國大門的鑰匙。歐美各國看了南京條約，皆大歡喜，紛紛派領事或公使到中國來。美國和法國，都派了全權大使和我國訂通商條約。從此以後，外國貨大量地向中國輸入，進口時僅納少量的關稅，而且在內地通行的時候，不納釐金關稅，比土貨佔便宜，所以價錢不貴。洋貨價廉物美，人人愛用，土貨被其打倒，漸漸滯銷，國內手工業因此漸漸破產，農民副業漸漸消滅，農工生計逐漸艱難。

英國自從南京條約成立，佔領香港這個據點，努力經營，不久就使它成爲支配南中國經濟的大本營。上海開埠，又劃定租界（租界就是給洋商居住的範圍，在這範圍內，

清政府又允許洋商有行政權），於是英國又拿它做支配長江流域經濟的根據地。因此這位首先打開我國門戶的霸王，一百年來，把我國的經濟命脈大部分掌握起來了。這是腐敗而專制的滿清政府對外軍事外交失敗的結果。

第二次鴉片戰爭的發生

鴉片戰爭結束了十五年之後，英國又和法國組織聯軍進攻中國，歷史家稱為「英法聯軍之役」，又叫做「第二次鴉片戰爭」。這次戰爭的起因，是因為廣東民衆不肯對英屈服，英國想借此為由，用武力再壓迫滿清訂一個不平等條約，多獲得一些特殊利益，他邀請美法俄共同參加，美法無意攻打中國，只法國國王拿破崙第三羡慕英國鴉片戰爭的獲利，又想在國外建立威名來向本國人誇耀，所以參加了。

廣東民衆的反英態度，從三元里平英團那次行動開始表現，後來南京條約成立，廣州要開放通商了，廣州人民却堅持不許英國人進城，那時耆英在廣東主持外交，於一八四六年向英國香港總督說明廣東人民強悍的情形，請求延期二年開放廣州，香港總督要求以「舟山羣島永遠不割讓與他國」為交換條件，耆英答允，和英人訂了舟山不割讓給他國的條約，然後英國把鴉片戰爭中留駐舟山一帶的最後一批英兵也撤退了，廣州延至一八四九年開放。耆英知道英國人和廣東人都是強硬難惹的，把事情延緩以後，隨卽還

動調差。一八四七年，耆英果然調走，徐廣縉繼任兩廣總督。徐廣縉知道利用民衆做外交的後盾，當香港總督用兵艦示威，強迫實行條約時，徐氏親自到英國兵艦說明廣東民衆強悍，不能承認英國人入城的要求，英方想扣留徐氏，兩岸民兵十餘萬，喊聲震天，英方不敢扣留，後來徐氏和港督議定廣東通商專約，終於把「嚴禁入城」一點規定在約裏面了。從此廣東平靜無事了好幾年。到咸豐二年（一八五二年），徐廣縉調任湖廣總督，葉名琛繼徐氏的任，葉氏是一個好說大話，不務實際的人，對外國人的態度很傲慢，而不設置防務，準備萬一的事變。英國新任港督寶林及駐廣州領事巴夏禮決定找一個題目發動戰爭。

咸豐六年（一八五六年），那時正是太平天國起義以後，英國人乘中國內戰的機會，利用中國奸商，擴張香港的生意，有一中國船名亞羅號，插英國旗，由廈門開廣東，巡河水師探知係奸商假冒英籍，上船檢查，將英國旗拔下，拋置甲板上，逮捕船員中國人十三名。巴夏禮聽見，大發雷霆，說按照一八四三年南京增補條約（即中英通商條約），犯法華民逃避，在香港或英國船上的，中國官廳只能照會英國官吏引渡，不能自行逮捕，至於侮辱國旗，尤其豈有此理；因此要求葉名琛道歉，並且送還所捕的人。葉名琛不肯，港督派兵攻廣州，名琛逃避。英兵在廣州燒了總督衙門及官吏住宅，因人數不到

一千，怕受民衆襲擊，不久退去。民衆乘機暴動，將英美法各國洋行通通燒燬了。英軍向本國請求增援。

一八五七年耶誕節日，英法聯軍以最後通牒給葉名琛，限他四十八小時投降。葉名琛不理，同城各官逼着他準備防禦，他大聲答道：「你們放心，過十五天就沒事了！」因爲他是以扶乩來決定軍機的，乩筆批了「過十五日必無事」，所以他很安心。那知只過四五天後，英法軍就打進了廣州城。名琛躲在小商店裏，終於被英兵擄去，兩年後死在印度。

聯軍又北上攻天津，佔領大沽口。清政府害怕，派桂良及花沙納到天津議和，英法各提出條約草案全文數十條，要求中國代表全部承認，兩全權向北京請示，清政府雖然憤恨，只得答允，於是兩全權不經過什麼談判，就照英法方面所擬的條文簽了字，這叫天津條約。

天津條約

天津條約分中英、中法兩約。中英天津條約的要點是：

(一)中英兩國得互派公使；

(二)英使見中國皇帝不行拜跪禮，兩國官吏辦交涉，按品級用平等禮式：

(三)允英國教士自由傳教，准英人遊歷內地；

(四)增開牛莊、登州、臺灣、潮州、瓊州五商港，又長江一帶，等內戰平息後，開放三個口岸（後來開放了鎮江、九江及漢口）

(五)英民犯罪由英領事懲辦，中國人民欺害英民，由中國地方官懲辦，兩國人民爭訟事件，由中國地方官與英領事會同審辦；

(六)南京條約後，輸出入貨品，課從價值百抽五之稅，今因物品之價格下落，課稅也要減輕，由兩國派員另定新稅則，經此次協定稅則後，凡關於通商條款，每十年酌量修改；

(七)賠償軍費及商人損失費共四百萬兩。

中法天津條約，和中英的差不多，但(一)增開瓊州、潮州、臺灣、淡水、登州、江寧六處商埠；(二)各通商口岸准法國派兵船停泊以資彈壓；(三)以後中國對他國許與特惠曠典，法國享最惠國之例；(四)賠償三百萬兩。這幾點是比較不同而又重要的。

這兩個條約的最重要處，合計四點：(一)領事裁判權的承認；——凡屬有完全主權的國家，外人在他的領土以內，必須服從他的法律。我國允許外國領事有裁判權，外國人在我國領土內，就不服從我國法律了。這是損害我國主權的。(二)協定稅則的確定；

——凡屬獨立國家，關稅稅則是完全由自己規定的，外國商人只能服從，不能干涉，現在我國經過南京及天津兩次條約，中外協定稅則的制度已經確立，外國人居然參加我國關稅的制定，就是侵犯我國的主權，而且這種協定關稅，不是雙方互惠的，他們可以協定我國的，我國不能協定他們的，所以我國吃虧很大，財政上收入受了限制，經濟上不能用關稅限制貨物的進出口，保護本國的工業（防止外國貨對我某種貨物的競爭，防止本國需用原料的流出），但稅則協定還是關稅權喪失的一部分，後來稅關的行政權也被外人拿去，關稅的稅款因爲做了賠款的抵押品，須全部存放外國銀行，那才更厲害哩！（三）內河航行權的讓與；——獨立國領土內的河道，對外國是不開放的，鎮江、江寧、九江、漢口既開放做商埠，便是將內河開放，聽任外國輪船航行，尤其准許法國兵艦停泊，後來各國根據最惠國條款，都可將兵艦開入我國內河，這使得我國主權的損失更大了。（四）最惠國條款的開端；——我國許給法國的最惠國待遇是片面的，不是相互的，我國以後有特殊權利給其他國家，同時就應照樣給予法國，可是法國如果把什麼特惠給予別國，並不照樣給予中國的。這是何等地不平呢！後來各國援這個例，都向我國要求受最惠國待遇，於是許給任何一國的特權，都變成各國大家享受的了，這個虧眞吃得不

北京條約及中俄事件

天津條約締結之後，又生了一次波折。咸豐九年（一八五九年）英法公使到北京來交換批准的條約，清政府不許公使乘兵艦駛入內河，於是再度開戰。一八六〇年，聯軍佔領天津及北京，咸豐帝逃到熱河，清室最富麗的圓明園被聯軍燒掉。俄國公使出面調停，訂立北京條約。除載明天津條約繼續有效外，又加開天津爲商埠，割讓九龍的一半給英國，賠款給英法各加至八百萬兩。

俄國借口調停的功勞，強迫清政府訂立中俄北京條約，將烏蘇里江以東地方割讓俄國。同時在英法進兵時，乘機佔領黑龍江以北的中國領土，也強迫清政府訂愛琿條約，加以承認。

經過第一二次鴉片戰爭以後，外國的經濟侵略長驅直入，中國的國力一天天削弱起來。但另一方面，被侵略的中國人民卻開始了反帝國主義及反封建勢力的革命鬥爭。反帝國主義就是反對外國資本家的侵略。反封建勢力就是反對本國專制政府和大地主土豪劣紳的剝削與壓迫。

第二講　太平天國革命運動

鴉片戰爭以後，英法聯軍之役以前，一個巨大的農民戰爭在南中國爆發起來了。這就是太平天國革命運動。這個運動表示了中國人的覺醒。

空前進步的農民戰爭

中國自秦朝以來，發生過多次巨大的農民戰爭，如漢朝有赤眉、銅馬、黃巾等戰爭，唐末有黃巢之亂，元末有韓林兒等的起義，明末有李自成、張獻忠所倡率的暴動，就是清朝，在太平革命以前，也發生過回民及苗民叛變，白蓮教、天理教及天地會的暴動等。這些農民戰爭的起因，都是由於天災人禍（人禍如苛捐雜稅的加重，貪污豪劣的橫行等）所匯合造成的大飢荒，使農民不能維持生存，不得不「挺而走險」。這些農民戰爭的特點是只有暫時破壞封建政治的作用，沒有直接建設民主政治的作用——我們不能否認歷代農民戰爭之進步的作用，但它還是不能建立農民的政權，因為農民是散漫無組織的。農民戰爭的領袖，都利用宗教迷信做號召羣衆的工具。如果拿近代法國革命及俄國革命時期的農民戰爭來比較，那末就得叫我國歷史上的農民戰爭為原始性的，因為他們那些農民戰爭不但能破壞封建的舊秩序，而且能建設民

主的新秩序——共和政治，耕者有其田等等。他們那些農民戰爭所以能夠成功的原因，是因爲城市的商工業者或勞動羣衆已有相當的勢力，他們與農民合作，並且領導農民的緣故。太平天國革命運動發生在鴉片戰爭以後，歐美民主思想多少有些影響到中國，所以它的性質和我國從前的農民戰爭不大相同，多少帶點近代民主革命的色彩，但是由於中國經濟發展的落後，像法國革命前夜那樣的第三等級（新興市民及勞動者）還沒有產生，太平天國依然不能夠擺脫原始農民戰爭的窠臼，而走上成功的道路。

太平天國起義的時期，在清朝全盛期過去以後，經濟上因封建剝削增加到農民不能忍受的地步，再加以外國資本主義的侵入，農工生活更爲困苦，政治上則統治力削弱，官僚腐敗，軍隊不能打仗，經過外國砲火的打擊，政府威信更墮落下去，因之我國歷史上每隔二三百年，必有週期性大飢荒，這種飢荒在鴉片戰後也發生了，而農民騷亂與暴動便隨地爆發，不可收拾。有些能力的人加以組織與領導，便形成大規模的運動。

太平天國起義的地點在廣西，領導者是兩廣人，這由於南方首先接觸外國資本主義，社會首先動盪，對腐敗政府很是仇恨，比較有知識的人對民治精神有模糊仰慕的緣故。太平天國的號召也採用宗教形式，但所用的是基督教，頗有些平等博愛自由的理想，這很明顯地和封建時代的舊禮教相衝突，我們看他破除社會身分，認萬民都是兄弟

的宣傳，以及提倡男女平等的政策，尤其可以證明；所以曾國藩征討太平軍檄文所拿的題目，是太平軍破壞名教，爲千古倫常之變。由於曾國藩這一強調，我們更能證明太平天國戰爭有幾分民主革命意味，是中國現代民主革命的先導，決不是過去的農民戰爭所能比擬。這一意義，是不能因其失敗而加以埋沒的。

太平天國的興盛期

太平革命的領導者洪秀全是廣東人，他和同鄉馮雲山曾加入朱九疇所倡導的上帝會；那個會的宗旨是反清復明，後來九疇死了，秀全被會衆推爲教主，他於一八四四年到廣西，以教學爲名，進行上帝會的組織，窮苦農工加入的很多，到一八五〇年（道光三十年），上帝會會衆中的桂平燒炭工人，因反抗官吏勒索，發生暴動，於是上帝會和官廳成了你死我活的形勢，洪秀全與楊秀清等便在桂平金田村起義。義軍屢次打敗了清軍，一八五一年佔領永安州，建國號叫太平天國，洪秀全稱天王，其他領袖：楊秀清封東王，蕭朝貴西王，馮雲山南王，韋昌輝北王，石達開翼王，秦日綱、胡以晃任丞相軍師等職。於是在一八五二年開始北進，經過桂林、興安、全州，直入湖南，攻破道州、江華、寧遠、嘉禾、桂陽、郴州等處，清軍遇着就崩潰。太平軍攻長沙，不得手，改攻岳州，佔領岳州之後，沿着長江東下，佔領漢陽武昌，又佔九江、安慶，一八五三年佔領金陵（南京），就在那兒建都，

叫天京。這時太平軍由數千人擴大到兩百萬人了。滿清軍隊在南京城東面設江南大營，在揚州設江北大營，和天京對抗，被太平軍於一八五五及一八五六兩年先後摧毀。太平軍又派李開芳、林鳳翔統兵兩路北伐。另派胡以晃西征，爭取長江上游。胡部西征，連破安慶、南昌、九江、武昌、漢陽。後來曾國藩的湘軍反攻湖北，一度收回武漢，而太平軍石達開部又大破湘軍，第三次攻取武昌漢陽。但北伐軍渡過黃河後，因兵力單薄，孤軍深入，和後方隔絕，被清軍消滅了。這是太平天國全盛時期的軍事形勢：雖然把握了長江上下游，但北伐則受一大打擊。

太平天國的政策和理想

太平軍由廣西出湖南，沿長江東下的時候，有兩件事號召羣衆非常得力：一件是反滿，所散發的檄文很痛切地揭發滿清壓迫漢族的罪狀，使兩百年來積怨很深的民衆多被激發；太平軍蓄髮盤於頭頂，不結辮子，也是反對滿清，恢復漢族自由的表示。一件是濟貧，行軍時到處焚毀田契與借劵，表示將實行計口授田的新辦法，貧民欠租欠債不要還；軍餉缺乏，須向民間籌餉時，只偶爾刼掠達官富紳，對普通人民絲毫無擾，並且時常將搶得的衣物散發給貧民，又聲言將來戰事平定，概免租稅三年。因此兩點，所以加入的很多，並且擴大得非常的迅速。

在定都金陵以後，又於一八五三年頒行「天朝田畝制度」，分田地為九等，不分男婦，十六歲以上受田，十五歲以下減半，各家除按人口多少分配外，又按田地等級分配，好醜各一半。他們的理想是「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因此有一種村落共產的計劃：以二十五家作為一個單位，設國庫一所，禮拜堂一所，兩司馬居之；司馬是鄉官，相當地採用選舉方法產出；國庫是村中公產機關，每當收成時，兩司馬督伍長除足二十五家每人所食可接新穀外，餘則歸國庫；凡二十五家中所有婚娶彌月喜事，俱用國庫，但有限制，不得多用一錢；凡二十五家中陶冶木石等匠，俱用伍長及伍卒充當，在農事的餘暇工作；小孩子要在禮拜堂受兩司馬的教育，讀聖書；一般男女在禮拜日要到禮拜堂分別聽講道理。

這個計劃在太平軍的軍制上已經試行。凡衆兵將殺敵取城所得金寶、綢帛、寶物等項，不得私藏，盡繳歸天朝聖庫——在軍隊中設有聖庫。官長也沒有薪俸。又設立「諸匠營」，集合各種工匠參加工作。至於講道理一事，太平軍所到之處也已經實行，他們常常以鳴鑼召集兵衆或百姓，於某日某時到某處聽講。

除在軍隊外，太平天國的均富共財理想，是不能實行的空想，因為叫農民將私有的多餘財物交歸國庫，是大家所不願意的；土地即使可歸國有，照天朝制度分配以後，糧

食生產還不是集體的，私有界限分明，誰肯拿出歸公呢？

太平天國這種理想的來源有兩方面：一方面是我國傳統的村落公社井田制的回憶，另方面是民主主義及基督教原始教義（基督教最早時候也有均富思想）的影響。

太平天國還有幾點民主意味的政治設施，如提倡男女平權，女子得分配土地，參與考試，參與行政，參加作戰，禁止買賣婚姻、纏足、蓄奴婢、納妾、吃鴉片等不良的風俗，革除司法機關的酷刑與賄賂等弊病。

太平天國的沒落期

一八五六年是太平天國興盛時期的最高峯，自從這年七月發生楊韋事變以後，就一天天沒落下來了。

楊韋事變的起因是因為金陵建都以後，各領袖脫離羣衆，生活腐化，忘記了大敵當前仍舊是共患難的時期，却以為可以偏安一隅，享受富貴榮華，所以彼此為了權利，明爭暗鬥，演成自相殘殺的慘劇。革命情緒低落是團結鬆散的起點，而金陵建都則為革命情緒低落的造因，所以推究太平失敗的根由，還是從南京建都開始。

南京建都後，洪秀全為減輕工作，將軍政大權交付東王楊秀清。楊氏威權膨脹，對天王態度就不恭起來，對同僚當然更傲慢。洪氏很猜忌他，暗示北王韋昌輝，謀殺了秀

清全家及其徒黨。因殘殺太多，翼王石達開從安徽還都，表示不滿。昌輝又謀殺達開，達開逃去，家屬竟被昌輝殺了。達開率兵要回京靖難，秀全只得又把昌輝殺了。達開到京，秀全又猜忌他，達開於是脫離南京，率兵西進，作獨立的行動去了。自此以後，太平內部人心渙散，幹部大多灰心，雖然有英王陳玉成及忠王李秀成兩個智勇兼全的領導人材，繼起奮鬥，也不曾挽回整個沒落的形勢。

緊接着南京的內變，長江上游的軍事形勢就逆轉了。原來清軍和太平軍只是敵我相持形勢，自從一八五六年十一月起，就轉變到清軍反攻的時期了。

清軍的主要力量是曾國藩所領導的湘軍，其次是李鴻章所領導的淮軍以及英美人所領導的「常勝軍」，都是在戰爭發生以後編練的新軍，因爲從前的官軍，完全不能作戰。湘軍產生於一八五二年，是以湘鄉團丁做基礎的（曾國藩是湖南湘鄉縣人），本來團練是由地方紳士挑選當地壯丁組織的，意識上是堅決保衞地方原有秩序，反對革命行動的，所以作戰比較官軍是可靠而勇敢。淮軍也是仿照湘軍組織的，但其背景還有富裕商人。常勝軍又名洋槍隊，是清蘇淞道道臺招募的軍隊，請美國人教練統率，後來又由英國人統率，這英國人就是戈登將軍。這時候英法聯軍之役已經結束，英法與滿清議了和，列強都願意扶助滿清政府，消滅革命運動，所以參加軍事行動。一八六二年李鴻章

帶淮軍到上海時，把常勝軍的組織更加以擴大，以後就參加江浙一帶的戰事，建功不少。

一八五六年清軍開始反攻以後，湘軍就克復了武漢，一八五八年克復九江，於是兩湖江西都到了湘軍手裏，太平軍只在長江下游還能保持優勢。一八六一年湘軍克復安徽，太平軍勇將陳玉成戰死。曾國藩於是派曾國荃攻南京，左宗棠攻浙江，李鴻章攻蘇州吳淞，三路並進。到一八六四年，江浙各地方都被清軍收復。南京早已被圍，李秀成軍戰敗，洪秀全自殺，湘軍於一八六四年六月打進南京，發生巷戰，太平軍十餘萬人都戰死。李秀成在鄉村中被擒，不肯屈服，這個最忠勇的太平軍幹部於是壯烈犧牲了。另有兩部分太平軍在福建廣東一帶，於一八六五年（同治四年）被清軍消滅。太平天國歷史於是完結。

太平天國的勢力曾經達到了十七省，並且支持十五年之久，如果不是內部發生變化，或者沒有湘淮軍常勝軍的合力反攻，他一定能把滿清政府推倒的。無奈洪楊韋石諸人沒有遠大的眼光、堅強的意志與寬宏的器量，不能堅持團結，和衷共濟，而缺乏民族思想的士大夫曾國藩等又不明攘夷大義，甘願扶助滿清，所以一場轟轟烈烈的反滿革命，終於失敗了。

太平革命的教訓

我們從太平天國的興亡，可以獲得許多的教訓。第一，我們從此知道革命是有社會條件的，當社會發展還沒有達到相當階段的時候，社會上缺乏強有力的領導階層，革命是不容易成功的，特別是民主革命，如果沒有富於組織能力的階層來領導，就不可能完成建設的任務。第二，我們從此知道，革命的戰略是應當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腕，「一鼓作氣」地摧毀反革命的中心，太平軍的失敗就是由於把主力留在東南，保衛首都，僅派少數部隊北伐，以致不能迅速攻破北京，反而被清軍打敗。反革命既然始終有北京那個中樞來號召，人心就很鎮定，力量就容易集結起來。假使太平軍不在南京建都，只留少部分軍力駐在南京一帶，而指揮大軍，迅速北上，發動北方民衆參加，聲勢必然更大，當時湘淮諸軍還沒有成長，北方的官軍尤其缺乏戰鬥力，太平軍直搗北京，和摧毀枯樹一樣，滿清決沒有僥倖存在的可能。清政府一倒，曾國藩李鴻章就失掉了頭腦，不容易組織反革命的武力。第三，我們從此知道革命陣營的內部必須團結一致，才能取得勝利。世間再沒有比內部瓦解更危險的事，縱然有雄兵百萬，猛將千員，只要內部不和，馬上就會失敗。如果內部始終團結，敵人雖強，也不難對付。第四，我們從此知道領袖必須始終和羣衆共甘苦，不離開羣衆去圖個人享樂，才能夠保持革命情緒，保持內部團結，保持羣衆對領袖的信

仰及對革命的信心。第五，我們從此知道，革命必須發動廣大羣衆參加，太平軍前一時期能夠相當發動南方的羣衆，所以節節勝利，後來沒有繼續發動北方的羣衆，所以不能改變北方的局面，同時他又沒有把北方的捻子及南方的三合會羣衆，好好地聯絡起來，結成一道反滿革命的聯陣合線，這尤其是「失策」。我們讀歷史，看到太平天國滅亡以後，北方捻子非常活躍的情形，就可以明白當時北方農民反滿鬥爭的爆發，是必然之勢，假使太平軍能夠早些兒去發動，是一定可以領導起來的，可是太平軍領導人物的革命情緒早已低落，都顧不到這個，這是很可惋惜的。

另一方面，我們從太平天國的革命，可以看出農民的偉大力量。這百把年中國反帝國主義侵略和反封建枷鎖的鬥爭，始終以農民爲主要力量之一，而太平天國正是這一長期鬥爭的先驅，它留下了民主革命的光榮傳統，鼓勵了後來繼起的革命運動。

第三講　中日甲午之戰

太平革命失敗以後的外患

太平天國革命失敗以後，舊勢力重新抬頭，一班封建貴族官僚，剝削民脂民膏，但知豪華奢侈，過快活日子，卻不管國際上的風雲變幻；外國資本主義的侵略，好似排山倒海一樣，越來越厲害了。試問一個落後的封建國家，又貧窮，又沒有組織，物質上的設備尤其可憐得很，怎麼能夠抵當得新興資本國呢？鴉片戰爭，英法聯軍，幾次的打擊不能轉變中國的封建體制，自然只有繼續吃虧。果不其然，在太平天國革命失敗（一八六四年）後二十年（一八八四年），法國為了侵略安南，打通侵略我國西南的路，又和我國開戰。結果，雖然我國的陸軍打敗了法國，但因為滿清政府不會辦外交，在訂條約的時候還是吃了大虧。一八八五年（光緒十一年）中法在天津議和，中國竟承認安南做法國的保護國，保護國者就是屬國之謂，也就是殖民地也。安南既然做了法國的殖民地，我國的西南各省也就門戶洞開，讓帝國主義的勢力可以長驅直入了。一八八五年訂約的時候，中國方面已經答應了如果南方各省修鐵路的話，一定聘用法國人做工程師，這不是明明的引狼入室嗎？後來法國

在廣東的廣州灣取得租借權，又在雲南修鐵路通安南，都是以一八八五年的條約做張本。

不但法國，和法國向來打夥謀財的英國，也在這時候乘機在中國西南布置侵略的道路。一八八六年，英國將緬甸完全滅了，併入印度。那緬甸正同安南一樣，和我國雲南相連，是我國西南的屏藩（安南、緬甸的國王原來都是對中國皇帝稱臣納貢的），英國的殖民地印度本來和我國的西藏相鄰，如今又滅了緬甸，和雲南相接，侵略的道路更多了一條，而且和長江珠江的上游都容易打通，豈不好得很嗎？好在中國容易說話，既然法國有例在前，一八八六年中英訂約，就很慷慨地承認英國對緬甸有最高宗主權了。宗主權是什麽？就是殖民國對殖民地的權。我國既然承認英國對緬甸有這個權，就是承認緬甸做英國殖民地了。

不過這樣一來，英法兩國猶如兩狗共爭一塊骨頭，不免互相衝突，後來在倫敦開會，雙方把勢力劃分清楚，對於我雲南四川二省的權利，約定共同享受，才算告一段落。我們現在不必多費工夫研究，總之一句話，安南緬甸到了法國英國手中以後，我們的西南是門戶大開了。——直到抗日戰爭初期，我們所謂西南兩大國際路線，猶如兩張大門，都握在我們友邦手裏，要開要閉，須隨他們主持，來歷便是如此。

主要的外患從東北來

因爲西南各省的交通不便，帝國主義的侵略大半是從東北東南沿海一帶的地方擴張起來，所以東方門戶洞開，意義比西南更爲重大。東方門戶從什麼時候打開的呢？大家都知道，是從鴉片戰爭時候起；香港和上海是英國侵華的兩大據點，也就是我國東南的兩道大門。但在東北來侵略我國的強盜卻比從東南來的還兇，那就是東洋強盜日本。日本原來也是中國式的封建國家，吃過西洋強盜的虧，但他在吃虧之中反而學會了強盜本領，自從明治維新（一八六八年）以後，居然想從海島上跳到大陸上來（大陸政策）。首先滅了琉球國（一八七九年），又曾向臺灣打主意，爲了臺灣，差點兒沒有和中國打起仗來，英國調停方才和平解決。尤其對於朝鮮進攻得厲害，因爲他看清楚朝鮮與我國的東三省相連，得了朝鮮就可以進取東三省和蒙古。那時朝鮮是中國的屬國——雖然封建時代的屬國不如資本主義時代的那様子依賴宗主國，但多少是有些聯繫的，所以日本要佔朝鮮，第一步就要排除中國在朝鮮的勢力，使朝鮮完全脫離中國的聯繫，名義上獨立起來，然後進一步去滅亡它。

甲午戰爭的發生

日本開始向朝鮮侵略的時候，糊塗的滿清政府還不大注意，甚至在辦外交的時候要上他的當。比方日本和朝鮮訂立江華條約，承認朝鮮爲獨立自主國，滿清政府不知道要向日本抗議，不知道表示不承認。後來一八八

五年（光緒十一年），中日兩國在天津訂約，滿清竟承認了把朝鮮作爲中日的共同的保護國，條文上規定了：一旦朝鮮有內亂，兩國都可以派兵平亂，派兵時要互相關照。這簡直是上了日本的大當。甲午中日戰爭便由這個根源產生出來。

甲午，即一八九四年（光緒二十年），當時朝鮮起了內亂，朝鮮政府向中國請求援助，中國派兵，日本也派兵，他是照條約行事，中國也莫奈他何。可是我們也不要迷信條約的萬能。條約上沒有規定的事情，人家也可以假借別的理由來做的，即如中日兩國到朝鮮以後，朝鮮內亂恰好在結束了，中國軍隊將要回國，通知日本軍隊，叫他同時撤退回去，日本軍隊接到通知，不但不肯同時撤兵，而且反說大家應把軍隊留在朝鮮，共同改革朝鮮的內政：原來派兵的理由是幫助朝鮮平定內亂，但現在改變到改革內政去了。當時美、英、法、俄各國都有代表駐在朝鮮，他們聯合通知中日兩國，請求同時撤兵，中國當然承認，但日本則不允許。於是朝鮮的形勢非常緊張，中日兩軍隨時可以發生衝突，大戰即將來到。可是戰爭在日本方面是早已有決心的，而中國方面則始終祇有幻想和平，沒有準備於萬不得已時和日本一決雌雄，李鴻章的全部國策便是希望列強做和事老，居中調停。那次中日戰爭，中國既沒有打擊侵略者的決心，完全處於被動的地位，是在根本國策上早已含着失敗的因素。

在一八九四年八月一日（陰歷七月一日）中日正式開戰之前，日本軍就早已發動攻勢，襲擊駐在牙山的中國軍葉志超部隊。中國軍隊在和平幻想的籠罩下，沒有什麼戒備，竟被日軍消滅一部分實力，把牙山丟了，於是自漢城以南的整個朝鮮，到了日軍手中。正式開戰以後，陸軍在成歡及

戰爭勝敗的檢討

平壤大戰兩次，我方都大敗，只得收集殘餘部隊退出朝鮮境界，其後在遼東半島還打了幾次仗，連次戰敗，軍心不能再振作起來了。海軍方面，首先在豐島一戰，是我方兵艦載兵援助牙山陸軍，中途被日艦截擊，結果我方吃了點小虧，後來在黃海一場大戰，簡直把我艦隊打得全軍覆沒，海軍提督丁汝昌都氣得服毒自殺了。從軍事上看，中國的海軍規模當時要大過日本，不過作戰能力不見得強，因為兵艦的速度比較小，艦員砲術不精，不能命中，種種素質都落後。最大缺點是封建官僚腐敗氣習，浸透了整個海陸軍，無論在器械的設備上，在技術的訓練上，在精神的教育上，都是敷衍塞責，有名無實的，許多不懂得近代軍事的人，平日在陸海軍裏面混飯吃，揩油水，只知道尅扣軍餉，偷工減料，一旦有事，便你推我，我推你，祇想逃避責任。試問這樣軍隊怎麼會知道打仗？下級將士又怎麼肯拚命作戰呢？除軍事以外，政治經濟兩方面又是完全沒有動員以配合軍事的。甚至南方各省可以說完全沒有參與這次戰爭，更不要講全民動員了。所

以，拿封建體制的腐敗組織去和近代資本主義的國家作戰，等於以卵投石。

戰爭是政治的繼續，政治的強弱可以決定戰爭的勝負，所以我們評論甲午中日戰爭的勝敗，如果單從軍事上看，還是捨本逐末的看法。我們如果對當時中國的官僚政治與日本的維新政治作一個比較的研究，便可以明白。

中日馬關條約

這次戰爭的結果產生了一個馬關條約，這是著名的不平等條約之一。馬關是日本的一個地方，條約是由李鴻章和日本的伊藤博文簽訂的，時間是一八九五年（光緒二十一年）四月十五日。條約內容，大致是：

(一)中國承認朝鮮爲完全無缺的獨立國，並廢除朝貢；
(二)中國割讓遼東半島、臺灣全島及澎湖羣島給日本；
(三)中國賠償日本兵費庫平銀二萬萬兩；
(四)中國開沙市、重慶、蘇州、杭州爲商埠，並允許日本設立領事；
(五)允許日本臣民得在各通商口岸自由從事工藝製造。

上述的第五點，對於列強在華的經濟侵略，關係很大。因爲允許外國人來開設工廠，就是從這裏起。工廠移植是資本輸出的一種方式，是帝國主義吸取殖民地膏血的一個辦法，用這個辦法，可以利用廉價原料與廉價人工，榨取高度的額外利潤，而且仗着

領事裁判權等等特殊權利，可以打擊剛剛萌芽的民族工業，使沒有存在的餘地（因爲外國人享有領事裁判權，不受中國法律管轄，則許多納稅義務爲條約所不載者都可不遵守）。

馬關條約割讓遼東半島一點，最使帝俄政府吃驚，因爲沙皇的俄國是有佔領東三省海口以出太平洋的雄心的，怎麼能容日本先佔了去呢？所以馬關條約簽訂以後，帝俄便聯合德法兩國，壓迫日本退還遼東半島。不過中國還是吃虧，要增加三千萬兩銀子的賠款作爲交換條件，而且事後俄國索取報酬，中國又將南北滿種種權利，如東清鐵路（即後來叫做中東路的）的修築，旅順及大連的租借等，先後讓給俄國，這等於前門拒虎後門進狼。——這裏補說一點，所謂遼東半島，並不是整個的遼寧省，祇是遼寧省的南部各縣。——德法兩國爲什麼也參加退還遼東的干涉呢？當然都是妒忌日本勢力的驟然膨脹，而且法國和俄國有同盟關係，德國也想拉攏俄國以便乘機拆散俄法的聯繫，所以都願意幫俄國一手。俄國既在外交上取得德法的幫助，又調動海陸軍作軍事上的布置，當時經過大戰後的日本，力量大大減損，自然不敢違拗，只好忍氣吞聲接受三國的調停。

遼東半島雖然交還，日本憑馬關條約所得的東西還是一筆橫財。一則得了二萬萬兩銀子的賠款，用來獎勵和補助新興工業的發展，使日本資本主義迅速長起來。二則得

了臺灣澎湖的廣大殖民地，對於資本主義的發展也有莫大的幫助，同時也建立了「南進」的基礎。三則獲得通商的諸種特權。除前述之設置工廠權外，還有內河航行權的取得，並且規定了「即訂通商行船條約及陸路通商章程，其新訂約章，應以中國與泰西各國現在約章爲本」。在馬關條約簽訂不久，中日通商條約的談判就開始了，到光緒二十二年，該約成立，其中要點除內地設廠，內河航行權外，還有日貨輸入以最惠國待遇，運銷內地免納釐金等稅；日本商人在中國內地收買土貨，一律免納子口稅，內地各項徵稅，一概免除，日本在中國的人民及財物，歸日本官員管轄，凡日人控告日人或被別國人控告，均歸日本官員審訊裁判……等項。這些條款是關於納稅及領事裁判權的，這種特權都是特別對經濟侵略有幫助的。鴉片戰爭以後，我國訂立吃虧最大的不平等條約，馬關條約是第一次。

甲午戰爭與遼東時局

甲午中日戰爭是遠東時局轉變的關鍵。第一件事情是把中國造成了列強瓜分的對象。第二件事情是造成了日俄戰爭。

先說說列強瓜分中國的情形。首先就是帝俄分得了東三省許多權利，從修鐵路開始。這是李鴻章聯俄對日政策的結果（李氏和帝俄訂了密約，許給俄方一些權利，但要俄方以實力援華制日）。自從俄國取得了滿洲鐵路修築權以

後，德國照樣租借我山東的膠州灣（青島），取得膠濟鐵路（由青島到濟南）修築權；俄國再照德國的例租借旅順口和大連灣（兩地都在遼東半島）；法國照樣取得了雲南的鐵路權，又租借廣州灣；英國照樣租借了威海衛（在山東省）和九龍（香港對岸，英法聯軍之役已經割讓了一部分，這次租借把地盤更擴大了）。一八九九年，英俄兩國相互商量，又劃定長城以北爲俄國勢力範圍，長城以南英國得自由支配。一八九八年，英國要求中國允許長江沿岸不得租與他國，（祇可以租給英國），這是明明白白劃定長江流域爲勢力範圍，但他同時又北取威海衛，南取九龍，那麼他的勢力範圍又似乎不以長江流域爲限。日本看了列強劃定勢力範圍，眼紅起來，也在一八九八年要求中國允許福建永遠不得割讓與他國（那時候日本爲什麼不要求把滿蒙做他的勢力範圍？爲什麼單單選了福建？請讀者注意）。這種勢力範圍的劃定，便是瓜分政策的初步實現，再繼續發展下去，便可以正式瓜分，將劃定的區域各自收歸自己的版圖了。幸虧中國革命運動抬頭，列強又彼此利害衝突，因而瓜分政策沒有繼續發展。

當時祇有美國不贊成瓜分。他在一八九九年向各國宣言，主張「保全中國領土的完整」，「開放門戶」，「機會均等」，換句話說，就是要撤消已經劃定的勢力範圍，使各國在中國的任何角落裏，都獲有平等發展的機會，這種共同的機會，自然只限於通商

或投資開發富源，不能佔據領土，如果列強爲避免彼此競爭的損失，儘可以相互約定合作的辦法，例如辛亥革命前後有各國銀行團共同對中國貸款的事實，便是列強合作的成功，這種合作方式如果順利發展，便可以形成另一種局面，卽「國際共管」。過去滿淸政府及北洋軍閥政府，常常受北京各國公使團的干涉，或仰承公使團的意旨而行動，可說是具備了國際共管的雛形。共管的政策雖然比瓜分政策來得溫和，其把中國當作俎上肉來處理的態度，卻沒有兩樣。但因中國民族革命潮的上漲，以及列強利害矛盾的不易協調，共管政策也很難貫澈。

再談到日俄戰爭。這是日本與帝俄兩個帝國主義不可避免的衝突。一個問題是朝鮮，自從甲午戰爭以後，朝鮮名義上是獨立了，實際上是落到了日本鎖鍊裏去了。這在帝俄是感覺威脅而必須設法對付的。一個問題是滿洲（東三省），這時候，俄國勢力在滿洲，隨着中國的遠交近攻政策而伸張，又使得日本怕上加恨，非堅決對俄不可。偏偏這個時候，英國爲了對付野心勃勃的帝俄，也需要在遠東找一個幫手，這恰好合了日本的願望；日本覺得眼前的大敵是俄，但如不取得與國共同行動或暗中幫忙，又不敢單獨對付他，現在旣有聯英的可能，當然水到渠成，英日同盟卽於一九〇二年實現。在這個形勢下，日本便於一九〇四年與帝俄一決雌雄。戰爭打到第二年，日本大獲勝利，連俄

國從歐洲調來的波羅的海艦隊，也在五月二十五日打得落花流水。俄國祇得同日本講和，將南滿洲的利權轉送日本。日本自從日俄戰後，聲勢更大，又得了許多利權，所以資本主義經濟又向前大進一步。可憐滿清治下的中國，當日俄衝突時，旣不能收回失去的權利，反而犧牲東三省一大片土地給日俄作戰場，損失生命財產無數，事後還得承認日本的繼承俄方權利。日本的鐵蹄從朝鮮進入南滿，中國人不能安枕而睡了。這段詳情，第五講再說。

第四講　戊戌維新運動

我們上章講述甲午年中日戰爭，中國失敗，和列強向中國要求租借港口，並劃定勢力範圍的種種情形。現在要說一說，在那種危急存亡的時候，全國同胞起了什麼反應。

甲午以後的社會動態

諸君要知道：帝國主義的侵略，這在中國歷史上是曠古以來的空前世變，如果沒有研究過世界歷史，沒有遠大的世界眼光，單憑中國歷史上的舊經驗來應付這種世變，是萬萬不夠的。在十九世紀末年，我國人能夠瞭解國際情形，說出中外大勢的，祇有極少數，這些人，或則是留學外國，或則是和來華的一部分外國人接近，並且合作做文化事業的，或則是在南洋一帶經商和外國人首先接觸的。同時在朝士大夫有許多受了時局的刺激，因而留心研究時務，從留學生及一般熟悉外情的人得到一些材料，於是形成了上層的洋務人材。上面這幾種人，對於世界大勢瞭解的深淺是不相同的，不過他們對於現狀多是不滿，多少想要改革一下，而這個改革的方式，大多數是主張自上而下的改良，僅僅少數知識分子和華僑主張推翻滿清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國的革命運

動。除這些人以外，大多數的同胞，即一般下層羣衆或農工生產分子，他們對於帝國主義侵略的反應更是非常強烈，他們自從洋人侵入中國以後，失業破產的一天天增多，物價一天天高漲——因精製工業品與農產品價格的「剪刀差」及金銀價格對比的緣故——生活一天天窮困，而一般來華的外國人，又儼然拿出主人對付奴隸的神氣來欺負中國人，許多依附外國人生活的中國人，如買辦及吃教的教民，又多是「狗仗人勢」「狐假虎威」，欺壓無勢力的平民，諂媚洋人的昏庸政府和大小官僚，又祇是袒護外國人或依附洋人的中國人，在這種情形之下，他們被欺負的大衆，怎麼不強烈地反對外國人和教民買辦呢？不過這些羣衆多是文盲，比較上層中國人更不了解國際情形、世界大勢，他們簡簡單單祇知道「排外」，不知道什麼外交手段、軍事準備、政治改革等等。這上下兩層的各不相連，一天天擴展，在十九世紀末，都曾幹出轟天動地的大事來。我現在先從上層的說起，下回再說下層的。

上層革新運動的發展

在鴉片戰爭以後，外國人的軍事技術震動了每個中國人的頭腦，太平革命失敗以後，一般士大夫如曾國藩李鴻章等，看到常勝軍在消滅革命中的功績，更感到洋人軍事技術的偉大，必須加緊學習，改進軍事，以爲防止革命騷亂之用。他們當時提倡所謂「洋務」，實際上只是籌辦新式的軍

器製造，並且派人到外國去學習這些本領。在這一認識之下，於是在安慶創設軍械所（一八六二年），在上海、蘇州創設製炮局（同年），在南京創設金陵兵工廠（一八六四年），在上海創設江南製造總局（一八六五年），在福建設立造船的船政局（一八六六年），在四川設立機器廠（一八七六年），在金陵設火藥局（一八八二年）等。在文化方面呢？一八六二年設立了同文館，學習外國語文，其後改爲專門學堂，講授科學，如天文、數學、理化、國際法等，一八七一年派第一批學生留學美國，一八七六年派軍官留德國學軍事，在上海的製造局還翻譯了很多外國書，包括數學、物理、化學、醫學等部門。當時譯書的人才如李善蘭、華蘅芳、趙仲函、容宏等，都是直接受過西方教育的，總而言之，他們一方面努力於軍備的建設，一方面進行新的文化運動。不過他們的主見祇是學西洋的技術，而且祇限於軍事工業方面。這就是一般人所謂「洋務」運動。

當時贊助這種革新運動的還有一部分外國人，他們在一八八八年發起組織「廣學會」，參加的多是居住在上海的英美教士、學者和領事，會的宗旨是贊助中國的新文化運動，工作先從譯書、發行刊物做起，當時中國文程度頗高的李佳白博士，便是會中的主要人物。這個會後來影響了中國當時一般進步的官僚和紳士，如文廷式、張之洞、陳寶箴、黃遵憲、康有爲、岑春煊、張謇等，他們也組織了一個團體，叫做「強學會」，

會的宗旨是講究西方學術，並策動維新運動。他們的認識大半還不脫曾國藩時代的傳統，不過系統化地提出「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主張，而西學的用處也不以爲祇是在軍器製造上，卽一般工業也列入課題。並且其中小部分人，已漸漸感到風俗、政治方面也有革新的必要了。

作爲這一思想動向的背景者，乃是民族工業的萌芽，卽當時軍事工業，漸漸影響到其他工業部門，而有一般工業現代化的嘗試，如設立輪船招商局（一八七二年），設開平鑛務局及築開平唐山間的鐵路（一八七八年），設立廣東繅絲局（一八八六年），創辦漢陽鐵政局（一八九〇年），湖北紡紗、織布、製蔴、繅絲四局（一八九三年），這些都是官辦的，此外還有商人創辦的源昌機器五金工廠（一八八三年），官商合辦的紡織新局（一八九〇年在上海）、機器紡織局（一八九一年在上海）等等。這種事實，說明了帝國主義侵略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一般的規律，一面促使其農村破產，財源枯竭，另方面又輸入資本主義生產方法，使殖民地也產生民族工業，不過這種民族工業繼續發展下去，終於要受帝國主義的妨礙、阻止罷了。

國內旣有民族工業的萌芽，當然比較進步的知識分子就希望把中國照現代工業國家一樣改造起來，而這部分萌芽的新勢力，便是這種資本主義運動的支持者。同時我們當

知民族工業運動的初期和帝國主義還不發生明顯的利害衝突，所以有些外國在華人士還贊助這一運動，如前面所說，廣學會便是這一中外聯合戰線的表現。廣學會所引起的強學會，到後來被滿清政府查禁了，可是革新運動並不因此而停止。特別是中日戰爭以後，一般青年知識分子，看到曾李洋務運動的成果——鐵船、大砲——應付不了外患，有點兒了解到根本問題是在改革政治，革新文化上面。所以強學會封閉以後，還有很多的團體繼續產生，如廣東的粵學會，湖南的湘學會、南學會，蘇州的蘇學會，北京的集學會、格致學會，陝西的關學會，湖北的質學會等，此外還有農務會、天足會、不纏足會、禁烟會等。強學會封閉以後，上海的會員所辦的時務報却風行海內，主筆是康有爲的學生梁啓超，是一個文字很帶煽動性的言論家。強學會中的急進分子，以康、梁爲領袖，又直接領導桂學會，後來又在北京組織保國會，提出保國、保教（指孔教）、保種的口號，並有具體的政治革新綱領。這個保國會是全國各進步知識分子集團的中心團體，是推動戊戌維新運動的主力軍。

戊戌維新的重要角色

戊戌維新運動產生於一八九八年，領導人物主要的是康有爲。康是廣東南海縣人，因爲生在首先接觸西方文明及帝國主義首先侵略的地方，所以在士大夫中思想最急進。他在中國學術界是講「公羊之學」，即研究春

秋公羊傳的，他根據公羊傳的春秋三世的學說（由據亂世到昇平世，再到太平世，是合乎進化論的理想的）及禮運大同篇的理想，著「大同書」，表示着他的空想的社會主義思想——其實祇是資本主義的平等自由思想。他又著「孔子改制考」「新學僞經考」，認定孔子是變法的老祖宗，以打破當時人們「祖宗之法不可變」的俗見。他想仿效馬丁路得改革基督教的辦法來改革孔教，創立新儒教，藉教權來推行新政。甲午戰爭後，他和他的弟子梁啓超到北京會考，聽說馬關條約簽定，於是領導所謂「公車上書」（各省舉人進京會攷，稱爲公車），當時簽名的有一千三百餘人，所上萬言書，主張變法維新，其具體方案，祇是自上而下的改良主義的辦法。協辦大學士（好像現今行政院副院長一樣的官）翁同龢看了康有爲的文章，非常贊佩，便把他介紹給光緒皇帝。光緒是一個想學日本明治維新的青年皇帝，而康有爲等新派士大夫，也正希望中國仿效日本的明治維新；以爲日本旣由此而強，中國爲甚麽不可以。這樣，君臣相得而戊戌四月至七月的百日維新，便演出了。

可是，光緒皇帝雖然做了皇帝，並沒有掌握多大的權力，當時政權是操在西太后（即慈禧太后）手中，西太后思想頑固而手腕毒辣，以前她和東太后（慈安太后）都是咸豐皇帝的老婆，而東太后是正宮，咸豐死後，同治皇帝是一個小孩子，兩個太后垂簾

聽政，結果東太后被她（西太后）害死。同治皇帝因爲愛他的正宮皇后，不愛西太后給他討的小老婆，致被西太后干涉，不讓皇后和他接近，把他氣得偷偷地出外嫖娼，染了梅毒，又不敢作聲；結果病死了。西太后爲了要專權，又揀了一個和同治同班輩的小孩子做皇帝，這就是光緒。光緒長到了二十多歲，還是西太后聽政，他自己沒有開始做實在的皇帝，直到甲午戰敗以後，國人輿論責備，西太后不好意思，只好把政權交給光緒，這時正是一八九八年。光緒帝是一個純樸的青年，不懂得政治的道理，一開始就想照自己的主張做，却沒有考慮到可能擁護自己的實力有多少，這些力量是不是已經團結起來。康有爲給光緒帝介紹的幹部如譚嗣同、林旭等，也都是一些純樸的青年，勇敢有餘，策略則非常幼稚。康有爲自己的策略，也不會着眼到用什麼步驟，集結全國新派勢力，給舊派勢力一個有力的打擊；他以爲一方面儘可以讓舊派官僚盤據官位，不去妨害他們，一方面不妨創立新機關，引進新人材，來實行新政；他不知道舊派的組織，既然完全不加以破壞，他們有兵權財權在手，又有西太后做他們的頭腦，對於新政，小則暗中阻撓，大則可以根本推翻的。新派雖然有一個皇帝做中心，並沒有絲毫實力，怎麼是他們舊派的敵手！

現在我們看看新派與舊派鬥爭的結果吧！光緒二十四年（戊戌）四月，光緒帝下口

論，斥責守舊派的誤國之罪，主張變法圖強。思想進步的新派人物譚嗣同、林旭、劉光第等被引用到中央了！施行新政的命令如連珠般發出來：廢八股；改科舉；興學堂；裁閒員；徵求國人上意見書；由各地長官保薦專門人材；興辦銀行；設立鐵路局、鑛務局；改一部寺廟為學堂；裁去老弱無用的兵額；等等。在表面上確有一番新氣象，可是各省官吏，除湖南有不少的新派人物，最能夠擁護新政，實行命令外，其餘都是敷衍塞責，甚至陽奉陰違，或故意阻撓。尤其是中樞所在的北京天津一帶，舊派勢力集結，隨時可以消滅新派，其具體辦法是擬於九月在天津舉行閱兵，驅光緒到天津，廢掉他，另立新帝。這幕劇終於在戊戌八月，經過袁世凱的賣友求榮而以另一方式演出。

這段故事在袁世凱的日記中記載過。據說譚嗣同曾和他密商，叫他殺舊派大臣榮祿，圍西太后所住的頤和園，並以兵力衛護皇宮。當時袁世凱卽拒絕不肯接受。這事發生於八月初三，到八月初六，舊派就擁西太后恢復聽政，將光緒帝囚禁在南海內瀛台（湖中央的房舍），大殺新黨，最重要的是譚嗣同、劉光弟、林旭、楊銳、楊深秀、康廣仁等六人，當時稱為「六君子」。還有光緒帝的六個親信太監，因為設計引光緒脫逃，事機洩漏，也被一同處斬。此外被監禁或殺戮的新派人物，不計其數。這都是袁世凱向

榮祿告密的結果。這就是所謂「戊戌政變」或「八月政變」。後來袁世凱做生日，有人送對聯一首云：「戊戌八月，戊申八月（這是袁的生期）；我華萬年，我公萬年！」便是暗指此事。自政變後，清廷連下上諭：恢復八股考試；停辦學堂；查禁報館；禁立會社；禁士民上書；……將全部新政完全取消。康梁二人，得光緒密詔逃亡，到海外依舊宣傳君主立憲，擁護光緒。但大多數知識分子，從八月政變後，都失望於自上而下的改良運動，一致傾向於國父孫中山先生的推倒清廷，建立民國的革命主張了。

與日本維新的比較

戊戌維新為什麼失敗？為什麼不能像日本明治維新一樣成功？這在客觀上有內外兩方面的原因。就國內說，日本維新以前，資本主義條件已經成熟，如工廠手工業的普遍，封建藩閥本身的資本主義化等，所以水到渠成，阻礙很少；中國當維新時雖然也有民族工業的萌芽，但祇是少數官僚資本，在一般工業界，仍然是拘守家庭手工業，連工廠手工業都不多見；大多數地主貴族們，並沒有企圖使自己變成資本家；因此維新運動的阻礙很大。就國際說，日本維新時，西方列強還是在工業資本主義的階段，以輸出商品為主，中國維新時，列強已經發達到金融資本階段，帝國主義汲汲於經營殖民地，正在紛紛劃定勢力範圍，加緊掠奪，當然要阻住中國的自強運動。加之日本在地理上是遠東航路的終點，富源又不及中國

多，列強忙於搶中國這塊肥肉，自然把日本放鬆了。因爲有這幾點原因，所以日本成功而中國失敗，不過中國失敗較主要的原因還是國內的客觀條件不夠。

在主觀方面，戊戌維新也有他的必然失敗的原因。最主要的一點就是沒有廣大的羣衆運動做基礎。當時各省雖然有許多學會，但他們並沒有深入羣衆，把維新思想灌輸到農工士兵羣衆中去——甚至還沒有灌輸到下層知識分子中間去，並把他們組織在維新幹部的周圍。維新政綱中，雖然有扶植農工生產，減輕人民負担的主張，但並沒有傳達到下層羣衆中去，因此得不到廣大羣衆的支持。其次在上層的鬥爭也陷於錯誤的道路中，第一步沒有利用光緒親政的時機，迅速調整中央政治機構及軍事布置以樹立維新政權，並鞏固這一政權，反而讓舊派文武大臣依然盤據京畿重地，掌握中樞要職；到了舊派政變陰謀成熟的時候，方才慌慌忙忙和榮祿部下一個不可靠的袁世凱來陰謀幹掉榮祿，這不是危險萬分的事嗎？康有爲領導維新運動的策略，犯了種種錯誤，所以失敗是當然的結果。

戊戌維新的歷史意義

不過，我們對於戊戌維新運動之歷史的意義，却不可因其失敗而加以忽視。戊戌維新是幾十年來中國民主革命的先聲，他們目的和整個民主革命一致，不過方法上是自上而下的改良主義，這次維新的失敗，使國人了

解於改良主義的「此路不通」，所以客觀上幫助了革命運動的開展。另一方面，戊戌維新又是初期的新文化運動，當時各地學會介紹西方學術，評判傳統文化，不遺餘力，康有爲本人對傳統文化，就是以批判精神來接受來運用的，梁啓超的雜誌論文之對新思想傳播，尤其有廣大的影響。梁啓超的文體，黃遵憲的詩體，對於舊文學亦是一種解放的嘗試，爲五四白話文運動樹立了根基。譚嗣同的「仁學」一書對於衝破傳統思想束縛這一點，也起了不少的作用。再從各地的婦女放脚運動，反八股運動的實際行動看，也可見當時啓蒙運動的相當蓬勃。這在我國整個的現代文化運動史上，確實是不可磨滅的一頁。

第五講　八國聯軍之役

滿清舊派的排外

戊戌變法失敗以後，國內政治逆轉，貪汚腐敗的舊官僚，重新把持中央的政權，以西太后那拉氏爲首，儘量壓迫新派人物，出名的旣已屠殺盡禁，未出名的愛國青年也受種種防閑和限制，不被指爲希圖不軌，卽被斥爲趨向不端，便是位居九五之尊的德宗光緒皇帝，也因爲思想太新，都覺得僅僅被囚於瀛台還不夠，必須要廢除他的皇位，另換一個聽話的小孩子才好。換誰呢？當時西太后看中了端王載漪的兒子溥儁。但是不敢馬上就換，恐怕外國駐華公使出頭說話。於是第一步先立溥儁爲大阿哥（清朝不立太子，皇帝的兒子都叫阿哥，立大阿哥就是替光緒帝承繼一個大兒子）。立大阿哥時，暗中派人勸各國公使道賀。各國公使却擺他們的架子，竟不道賀。載漪老羞成怒，因此恨了洋人。就是軍機處的幾位大臣，剛毅、徐桐、榮祿等，也都是舊派人物，贊成換皇帝的，所以對載漪表同情。督撫中間的舊派，有個革了職的山東巡撫毓賢，他的革職是因爲外國教會的案子在山東發生，外國人提出抗議，政府便將他革職，所以他也深恨洋人。後來義和團的暴動發生，滿清朝

廷恐怕反清運動再起，造成第二個太平天國，正在驚慌，但同時又聽說義和團是反對洋人的，不覺大喜，認為義和團可供利用。首先是毓賢寫信給中央各大員，大吹義和團的本領和忠勇精神。載漪連忙報告西太后，太后也想利用義和團來消滅洋人，於是派定大臣剛毅出京迎接義和團。

義和團暴動的發展

原來義和團是一種迷信的農民的組織，據說是元明以來白蓮教的支派，在清朝白蓮教黨徒原有「反清復明」的思想，曾發生過暴動，蔓延於華西各省，後來白蓮教因暴動失敗而解散，又分成八卦、天理兩教，義和團便是八卦教分支。加入義和團多是一些破產的貧農。入教後即由教首教練拳術等武藝以及降神驅魔的法術，其神係從封神榜、西遊記、三國演義、說唐、七俠五義等書採取湊合起來的，如鴻鈞老祖、孫悟空、關羽、尉遲恭、黃天霸等，他們說請了神之後，便可用神力抵禦槍砲，他們有此信仰，所以作戰十分勇敢。義和團既多是貧農分子，所以常常有刼殺豪富的行為。當然對官廳也是反對的。不過因為帝國主義勢力侵入，外國來的商人官吏教士，都是彼此配合着來榨取中國人血汗的，一般農民非常地恨他們，於是義和團的情緒傾向於排外，特別是排教（基督教），因為信教的中國人假借洋人勢力欺壓同胞，外國教士及中國官吏又從而袒護，使得被害者無處伸冤的事常常

有之。義和團是在山東起事的，而山東則是有名的曹州教案產生地。曹州是山東的一個地方，有德國教士在該地欺壓平民，被羣衆打死，這件事就是曹州教案。德國借曹州教案爲由，竟出兵佔領山東（光緒二十三年事），而清政府也竟屈服，把膠州灣海港及膠濟鐵路權利讓給他，所以洋人與教民的氣餘越來越高，有些教堂公然強佔民地，挖掘農民的墳墓，搗毀農民信仰的寺廟，這樣更造成農民仇恨外國侵略者的心理。加以滿清政府恐怕義和團反對賣國政府，故意鼓勵義和團的仇外行爲，使它的情緒偏向於對外一面，而義和團的「滅洋」口號，就由是產生，而且更演進爲「扶清滅洋」。義和團在清政府慫恿之下，不但以洋人爲敵，對信洋教及學洋人氣派的中國人一律反對，連外國輸入的新事物，如鐵路、電線、洋畫、洋書等都是仇恨的，所以這些都成了他們攻擊的對象。

很明顯地，義和團是原始的農民組織，他沒有正確的政治領導，情緒一經被利用而偏向，便祇知盲目地排外，而不知吸收外來文化，去打擊帝國主義，也不知道滿清政府昏庸腐敗，正是招致帝國主義侵略的主因，必須反滿然後才能達到反帝的目的，同時這一散漫的農民團體，也沒有很嚴密的組織。所以義和團的反帝運動，沒有步驟沒有力量，做了許多的錯誤。本來當時滿清政府大員對於義和團也有主張剿滅的，如榮祿就

是，但多數有力的大臣及慈禧太后都主張利用，因此決定了。當時袁世凱做山東巡撫，用武力對付義和團，迫使義和團往直隸省（即今河北省）境內發展；而受到中央派的歡迎。於是義和團便爲這些昏庸貴族所利用。這些昏庸貴族的知識也並不比落後的農民高些，他們僅知道洋人來了，就要把他們向來所享的「福」分掉一部分去，所以不妨排外；至於義和團暴動，聲勢洶洶，逼近首都，他們更是很害怕的，如今獎勵義和團滅洋，刀鋒向外，便不至於反清了；因「滅洋」而弄到盲目毀滅外來文化，自然正是這些昏庸貴族所高興的。

拳民得了獎勵，數萬人長驅入北京，沿途實行「滅洋」，毀了不少的電線、教堂，殺了不少的洋人及教民等。入京以後，到處設立神壇，扶乩降神，並勒令居民焚香點燭，弄得滿城烏煙瘴氣，於是與提督董福祥的部隊共同担負「滅洋」的任務，放火焚燒城內外教堂及繁盛街市，圍攻東交民巷的外國使館。董福祥部並將日本公使館書記杉山彬、德國公使克林德殺了。毓賢又以禁衞軍的任務給義和團，賜以鋼刀，鼓勵他們滅洋。在不久的時日內，黃河流域及長城內外，所殺外國教士及本國教民，大約有數千之多。

各帝國主義國家看見中國人民居然反抗他們的侵略了，這還了得，他們決定用強暴

手段來鎮壓，自義和團入京與董福祥協同實行恐怖政策，圍攻公使館以後，各國覺得有辭可借，便組織了八國聯合軍進攻了，八國是英、法、德、俄、美、日、奧、意。聯軍攻破大沽炮台，佔領天津，滿清政府倉皇應戰，僅憑藉義和團的武力，各省並不曾動員。義和團的符咒畢竟抵不過

八國聯軍入北京

砲火的威力，聯軍長驅直搗北京——這次德國軍隊藉口懲罰野蠻人民，還用了國際法所不許用的毒氣來施行屠殺呢。慈禧太后、光緒帝於北京將破時慌忙逃奔西安，各國軍隊盤據北京城，大搶大殺，姦淫婦女，皇宮中的珍寶古玩，圖書儀器，不知被刼去了多少。其中以日本軍所得最多，戶部（相當於今之財政部）存銀全部被他刼去。

當清政府宣布開戰的時候，山東巡撫袁世凱以及東南各省的總督劉坤

南方的中立

一、李鴻章、張之洞等都不接受命令，他們宣言保境安民，保護外僑，儼然是中立的第三國一樣。所以帝國主義聯軍不費吹灰之力，竟壓平了中國的反抗。袁世凱、李鴻章等事前既不能阻止政府的盲目排外，戰端既開，因爲恐怕農民大衆奪了貴族地主的政權，又不能站在保衛民族抵禦侵略的立場上一致對外，反而和帝國主義作局部妥協，他們誤國之罪，實在和載漪、剛毅等不相上下。

帝國主義軍隊佔了北京以後，就準備瓜分中國，但是各國利害衝突，意見不齊，

如帝俄首先以大兵佔領了東三省，英國卽聯合德國派兵到山海關防俄軍南下，英國的揚子江艦隊也調到了大沽，日本也急派軍隊到朝鮮防俄，彼此衝突，形勢緊張，怎麼談得妥瓜分的條件呢？原來列強是想依照他們在中國固有的勢力範圍來定瓜分方案的，可是英國既不願俄國佔了滿蒙，又不願法國分了雲貴兩廣，恐怕妨害他自己的發展；日本不願俄國佔滿蒙、德國佔山東，恐怕妨害其大陸政策；各國對英國的獨佔長江也十分眼紅；而根本沒有勢力範圍的美國呢，更根本反對瓜分，主張「領土保全，門戶開放」；因此瓜分的方案無從定妥，瓜分的事實便沒有發生，於是各國便共同逼迫清政府簽訂了一個極端苛刻的辛丑條約。

瓜分計劃未成

辛丑和約簽訂

慈禧太后在辛苦的逃難中聽到義和團的失敗情形，只覺得洋人可怕，非屈服不可，她知道李鴻章比較熟悉洋務，便命慶親王奕劻會同李鴻章共同辦理和議。李鴻章看出當時各國的矛盾，知道聯軍不會一致地繼續進攻，於是拉攏俄美二國，使和議終於弄成功了。和約是一九〇一年（辛丑年）九月七日簽定的，內容要點是：

(一)懲辦禍首，撫卹德國公使克林德、日本書記杉山彬（結果，因懲凶而殺死或革職的計百餘人，北京城內還建了克林德紀念碑，永遠保留着國恥）；

(二)清帝派遣專使到德日兩國賠罪；

(三)賠軍費四萬五千萬兩銀子(這次賠款用關稅鹽稅作抵押品，本利合計十萬萬兩左右。以後每年關稅鹽稅儘先撥還賠款，存外國銀行，分四十年攤還，弄得民窮財盡，國庫空虛)；

(四)毀滅大沽口及由北京到海濱的各要塞炮台，永遠不許修復；

(五)各國得在北京到天津間的城鎮埠頭駐紮軍隊；

(六)推廣公使館界線，由各國自由派兵保護，界內不許中國人居住(這就是北京的東交民巷，他們後來架置砲位，砲口對着皇宮)；

(七)張貼永禁排外的詔諭，切實保護外國僑民，曾經亂殺過外人的各省，停止考試五年(這是給當時的知識青年一種懲罰，使得他們了解帝國主義的威風，養成懼外心理)；

(八)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改爲外交部，位在六部之上(六部是照周禮定的官名，即吏、戶、禮、兵、刑、工六部)。

這次和約是空前的不平等條約，在物質上使我國經濟財政破產，在精神上將清政府完全打成了馴羊，向來排外心理一變而爲媚外，只配做帝國主義走狗——担負壓迫民衆

反帝運動的任務。

辛丑以後的遠東形勢

和約成立以後，佔據東三省的俄帝國軍隊仍不肯撤兵，於是一方面引起英日同盟（一九〇二年），另一方面引起了日俄大戰（一九〇四至一九〇五年）。日本因爲有英日同盟的幫助，大獲全勝，日俄經美國調停，訂立了朴資茅斯（美國地名）和約，俄帝國承認日本在朝鮮的特權，割庫頁島南部給日本，並將旅順口大連灣的租借權、長春到大連的鐵路（所謂南滿路）轉送給日本（這些權利都是從中國手裏拿去的，祇算是慷他人之慨）。事後中日又訂約承認了這件事，中國更加送了安東鐵路建築權等禮物與日本。又過幾年，日本宣布日韓合併（一九一〇年）。從此日本帝國主義在遠東的勢力，突然膨脹起來，而成爲中華民族最危險的禍患。而俄帝國的勢力退到北滿洲去，仍把握了中東鐵路等等。英日兩國爲聯合對俄，在一九〇五年又訂立二次同盟。日本經英國的培養，逐漸走上遠東霸主的地位，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迅速，不是偶然的。

辛丑以後的國內趨勢

我們從義和團運動而看出中國民衆反抗帝國主義的英勇精神和偉大力量，但也看到落後農民對政治的無知、組織散漫、重迷信、反科學等等缺點，我們不能埋沒義和團的革命意義而指爲尋常的土匪，也不能掩飾他的

落後性。我們從滿清朝的利用義和團以及其後對外求和獻媚的態度，又看出清政府統治力的薄弱。所以辛丑以後清政府威信一落千丈，革命潮流上漲，清政府不得不求帝國主義保護，幫忙鎮壓革命黨，於是「甯贈友邦，不與家奴」的有名口號便產生了。

辛丑以後，國父孫中山先生所領導的革命運動，逐漸爲多數國人所擁護，改良派康有爲梁啓超等的保皇立憲主張逐漸爲國人所厭棄。清政府看此形勢不好，也不得不把戊戌政變所摧毀過的新政，又一件一件地重新施行，如廢科舉、立學校、派遣留學生等。特別是日俄戰後，更怕起來，居然談到預備立憲了。這是事到臨頭方才曉得改良派主張有和緩革命的妙用。不過並無誠意的所謂立憲運動，畢竟不能挽回已去的人心，所以反清的辛亥革命終於爆發了。

第六講　辛亥革命

列強侵略加深

義和團戰爭的結果，雖然沒有由列強正式瓜分中國，但列強對我國的經濟侵略是加深了。同時中國自己的資本主義生產也有初步的進展。然而因爲外國投資的巨大，列強早已在鐵路、航業、鑛業、工業、金融各方面，佔着很大的優勢，加以不平等條約的束縛，我國微弱的新興產業就遭了非常難以克服的障礙。

在辛亥以前，俄、德、法、英直接投資在中國建築的鐵路有兩千多英里，借款給中國修築的鐵路也將近三千英里——此項借款即以鐵路爲抵押品，——而用中國資本修築的鐵路不過八百多英里。英、日、德在中國航行的輪船有十六萬噸之多，中國招商局等公司的輪船共計不過五萬噸。英、法、美、俄、德、日、比、荷各國在華開設的銀行有十幾家，資本都很雄厚（例如匯豐有二千萬美金），中國自設的銀行不過六七家，資本在一千萬兩銀子以上的不過兩家。

辛亥以前，我國重要產業如漢冶萍公司（資本二千萬兩）中興煤鑛公司（在山東，

資本八十萬兩）揚子機器公司（漢口）南洋兄弟煙草公司等都已經成立，但不過寥寥數家而已，此外還有紗廠麵粉廠數家，資本總計只數百萬元。這一點兒工業，總算是中國的新氣象，它指示中國發展的前途，它發見了這一前途的障礙，它需要政治的革新和國力的強盛，它迫切地盼望維新或革命的勝利。

立憲運動破產

八國聯軍掃光了滿清政府的威信，巨大賠款更加重了官僚對人民的搜刮，因此各地抗捐抗稅的騷動及大都市民衆為外交或內政的抗議示威（例如一九〇三年上海各界為俄國軍隊在東三省久不撤退，舉行拒俄大會。又，為兩廣當局擬借外兵平內亂，開會反對）時常發生；同盟會的革命宣傳，也進展很快。官紳中稍有見識的人都覺得：只有由政府恢復維新政治，實行立憲，才能夠抑平民衆的憤怒，挽救危局。在日俄戰爭以後，這些官紳又指出日本打敗俄國，是立憲打敗了專制。守舊的滿清貴族無可奈何，只得勉強答應立憲，就由清政府派五個大臣出洋考察憲政，又在一九〇六年（光緒三十二年）宣布預備立憲。但是那上諭裏還說了「大權統之朝廷，庶政公之輿論」的話，分明還是不願意人民有大權。到一九〇八年（光緒三十四年），才公布一個欽定的憲法大綱，並且規定預備期限為九年。所謂預備，就是一方面考察各國憲政，研究憲法，一方面辦理地方自治，設立練習式的各級民

意機關（雖能議事，却沒有實權）如各省的諮議局，中央的資政院等。當時列強宰割中國的陰謀，着着進逼，滿清還是那麽冥頑不靈，各省紳商很盼望立憲提早兌現，不耐煩等待九年之久，就於一九〇八年（光緒三十四年）由各省諮議局聯合請願，要求提早召開國會。清政府毫無覺悟，反而將請願代表申斥一頓，數月後才宣布將預備期限縮短三年，即四年後召集國會，這當然使全國大失所望。保皇黨梁啓超等聽到清政府預備立憲，以爲他們君主立憲主張會要成功，於是派人回國在各省組織各種憲政促進團體。那知清朝貴族把政權抓得緊緊地，到一九一一年（宣統三年）答應設立責任內閣（以代替神聖不可侵犯的君主負責，將來國會成立，國會有權彈劾他，這是責任內閣的好處，也是憲政的一個要點），還要揀了守舊皇族慶親王弈劻做總理大臣。因此各省諮議局又聯合反對。這次運動遭了清政府的嚴厲申斥，說任免大臣是皇上的特權，臣民何得妄加干涉？直到革命的義旗高舉以後，方才決定皇族不得充任閣員，而起用閒居洹水的袁世凱代替慶親王。滿清的立憲既是一張空頭支票，保皇派的運動就不會有什麽效用，徒然暴露當局的虛僞與保皇派的無知識，使羣衆革命化而已。

革命同盟會成立

中國的革命運動，是甲午戰爭以後才開展的，經過戊戌政變、八國聯軍及日俄戰爭等幾次大的事變，革命潮流一天漲似一天。作爲革命領腦的

革命同盟會，是於一九〇五年（光緒三十一年）成立的。先是，國父在乙酉中法戰爭之年（一八八五年），就有推翻滿清，建立民國的意思，但當時很難得到同志，後來組織興中會，才團結了許多革命青年，到二十世紀初頭，革命思想已經普及到通商大埠及留洋的知識分子羣，以及下層民衆的祕密會社，很有成立一聯合組織的必要，於是在國父領導之下，興中會便與章太炎所領導的光復會，黃興所領導的華興會，聯合起來成立革命同盟會，至於長江一帶的哥老會，南方的三點會（卽天地會，又名三合會）等團體，素來在興中會影響之下的，這時也接受了同盟會的指導。

同盟會的口號是「驅除韃虜」（韃虜指滿清），「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其建立民國之綱領是「由平民革命以建國民政府，凡爲國民，皆平等，以有參政權。大總統由國民共選，議會由國民公舉之議員構成之，制定中華民國憲法，人人共守」。同盟會成立的第二年，革命機關報紙「民報」出版，國父在創刊辭裏面提出了三民主義的主張，以民族主義建獨立國家，民權主義爭取立憲政治，民生主義預防經濟上的不平等。

革命鬥爭的發展

革命同盟會所領導革命的鬥爭，包括：（一）理論鬥爭；（二）軍事起義及（三）革命的恐怖行動。

當時最重要的理論鬥爭就是駁斥保皇派的君主立憲論。保皇派梁啓超主編的「新民叢報」也於一九〇六年創刊，他對同盟會的「革命」及「民主共和」的兩大主張，常常攻擊，所持理由是：革命足以引起瓜分；君主立憲是達到民主共和的過渡階段。國父則認爲列強要瓜分中國的原因正是因爲腐朽反動的滿清政府可欺，如果人民能推倒這個腐朽政府，列強便不敢瓜分中國。至於說先有君主立憲，而後可成立民主立憲，他說，那好像現在中國修鐵路，不去採用最新式的火車，而去採用英美數十年前的舊式火車，然後漸漸更換新式，到最後才用現今最新式的一樣，豈不太愚！同時痛切指出：不革命就不能立憲，歐美的憲政都是由革命得來的。

除理論鬥爭外，還出版了各種鼓吹民權革命的書籍，如盧騷「民約論」，穆勒「自由原論」等譯本，「浙江潮」「漢聲」等刊物，很多是在日俄戰前二三年內出版的。在內地流傳的通俗小册子也不少，如陳天華的「猛回頭」等。

同盟會發動的軍事起義，最著名的是丙午（一九〇六）萍醴之役（參加者是萍鄉煤鑛工人及瀏陽醴陵一帶的農民），丁未潮惠欽廉之役（四個地方都在廣東）及鎮南關（廣西邊界）之役，戊申的河口（雲南邊界）之役，辛亥三月二十九的廣州之役（卽黃花崗七十二烈士殉難的那一次）等。

革命的恐怖手段就是暗殺滿清大員，最著名的暗殺事件是(一)吳樾暗殺出洋考察憲政的五大臣；(二)徐錫麟暗殺安徽巡撫恩銘等。這種革命方法不能夠把民衆推動，並且組織起來成爲推翻反動統治的巨大力量，只是表現個人的英雄主義，無濟於事，所以在革命過程中不佔重要地位。

革命前夜的民衆

因爲革命同盟會影響擴大，不一定要直接發動民衆，民衆也常常有自發的鬥爭。下層民衆的自發鬥爭，比較幼稚，既沒有組織，也缺乏適當的策略。例如筆者親見的長沙飢民暴動：那次事件發生在辛亥前一年（一九一〇年）三四月間，一天下午由災區逃到長沙郊外的飢民聚集到數千人，大有騷動的趨勢，巡警道賴子沛坐着三人抬的轎子出城彈壓，竟被飢民羣衆包圍，把辮子繫在鰲山廟的楊柳樹上，毒打一頓。飢民乘勢洶湧入城，見警察就打，頃刻間全城警察逃躲一空。飢民衝到巡撫衙門，巡撫岑春煊勸諭無效，恐飢民闖進去給他虧吃，偷偷地打開後牆逃走了。飢民於是放火燒巡撫署，大搶米店，進而焚燒教堂及學校，見外國人或着學生裝的卽毆打，仍然和義和團的舉動一模一樣，據暴動者的宣傳，是這些吃洋教讀洋書的人把米吃貴了。他們張貼的匿名佈告說「官逼民反，衆怒難犯」。可見他們對滿清官吏，怨恨而且不怕。第二天北京電令布政使(藩臺)莊某用武力鎭壓，亂事隨卽

平定，但政府的無能完全暴露，統治力量大見削弱。

比較這個更有意思的是從一部分上層分子的請願轉變出來的羣衆運動，以及大都市中知識分子所領導的宣傳與集會。關於後者，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一些例子，如出版各種書報，進行拒俄運動等，現在且說一說前一種的羣衆運動。我曾說立憲運動中有許多次請願，都受了清政府的斥責，這種請願運動便逐漸變成了革命運動了。那些發起請願的上層分子，本意不是反對滿清，只是希望滿清實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但請願失敗的結果使得他們下面的羣衆失望、憤怒，把反滿的意識激動起來了。例如湖南諮議局代表譚延闓羅傑爲要求提前召開國會事進京請願，臨行前，長沙較前進的知識分子就在各學校中作了一番宣傳鼓動，某教育家在講演激昂的當兒，當場斷指，寫了「請開國會斷指送行」八個字的血書，後來兩代表碰了釘子回來，一般青年都認識了滿政府的眞面目，革命情緒陡然熾烈起來。這時候湖南諮議局及長沙地方自治研究會當中的若干積極分子，覺得非把辦地方自治及開國會等等事情的意義向下層羣衆宣傳不可，於是他們開辦「夜學」，出版改良的歌謠小册子等，脚踏實地做點啓蒙工作；兩年後辛亥革命發生，湖南首先響應武漢的起義！這些做自治運動的積極分子都參加了。譚延闓的登臺做督軍，就是這些轉入革命陣營的立憲派分子擁戴出來的。當時湖北及四川的諮議局，也有同樣情

形。

這種羣衆運動中還有直接代表工商市民利益的，如收回粵漢路運動，收回山西河南煤礦運動，拒絕滬杭甬鐵路借款運動等。特別是一九一一年（宣統三年）的反對鐵路國有運動，竟成了辛亥革命的導火線。當時盛宣懷任清內閣郵傳部尙書（即交通部部長），宣布全國鐵路收歸國有，他的意思是借外資來修築，各省紳商因爲不滿意清內閣，又不贊成借外債，仍主張鐵路商辦，由民間集股經營。所以表示反對，請求清政府收回成命。清政府不允許，各省紳商也不肯放棄自己的主張，特別是四川湖南等省，這運動一天天擴大，有許多學生及市民參加，竟形成了廣大的羣衆鬥爭。這在湖南不過發展到罷課爲止，在四川則發展到武裝衝突的地步，巡撫趙爾豐都被羣衆打死了。據說四川民衆示威集會時，每人頭上戴着萬歲牌位——這個牌位是代表皇帝的——軍警見了行禮不迭，竟不敢下手拿人，這種鬥爭方式很有趣味，也可見羣衆長於創造。四川民變發生後，清政府派端方入川，相機勦撫，端方號稱滿人中有見識有才幹的角色，還沒有到達成都，四川的風潮已發展成爲戰爭，同時武昌的革命也爆發了。

當時的自發鬥爭還蔓延到軍隊裏面。那時軍隊正在開始改造的階段，舊式的巡防軍及新式的常備軍同時存在，新軍採用新法訓練，兵士識字的比較多，常識比較豐富，軍

官也多半是具備時代知識的青年，若干教練人員都是留學生，因此新軍大多數傾向於改革政治運動，或表同情於反滿革命，辛亥前一年，廣東新軍一度譁變。辛亥武昌起義也是新軍幹起來的，軍官學校學生隨即參加。首先響應武昌的湖南起義，也是新軍領導。清政府從前派袁世凱在天津訓練新軍八鎮（八師），之後，又在全國各省訓練新軍合成三十六鎮（三十六師），結果除北洋八鎮外，其餘都異常不穩；在加緊強化武力之中埋下推翻自己的種子，這個矛盾很值得玩味。

由雙十起義到南北統一

革命的爆發是在清宣統三年辛亥八月十九日，即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當時新軍打進武昌城，湖北總督瑞澂逃亡了，新軍即以省諮議局為軍政府，推舉協統（即旅長）黎元洪為都督，黎氏在羣衆擁戴之下，只得勉強就職。之後，革命軍進取漢口漢陽，又推黃興為總司令。革命軍政府對租界外人表示保護，並嚴申軍紀，外國人於是宣稱中立，承認革命軍為交戰團體。清政府看見革命軍佔了武漢，有些恐懼，隨即起用袁世凱為內閣總理，派北洋軍南下。但革命爆發後不久，就得到十七省的響應，有許多省份，就由當地紳士與軍人擁戴原有的督撫宣布獨立，改稱都督，所以來得非常容易，滿清統治的坍臺，眞好像土崩瓦解一樣。上海蘇州浙江為革命軍佔領後（上海都督是陳其美，為同盟會分子，駐蘇州的江蘇都督

則係原來的巡撫），革命軍就進攻南京，打敗了清南洋大臣張勳的軍隊，將南京佔領；但武漢方面革命軍戰事失利，漢口漢陽被馮國璋所部清軍佔領，這時候國父從國外趕到，十七省的代表齊集漢口，商量組織革命政府，舉國父做臨時大總統。袁世凱眼見滿清大勢已去，一面暗示部將段祺瑞等要求清帝退位，一面就派唐紹儀做代表，到南方來議和，並請了外國公使居間調停。一九一二年，即民國元年元旦，國父就任臨時大總統於南京，宣布改用陽歷，用民國紀元（武昌起義時係用黃帝紀元四千六百〇九年），定國名為中華民國，並頒布中華民國臨時約法——那個約法是由十七省代表所組成的臨時參議院議決的，對政府組織係採用責任內閣制，據說那時候大家希望和議成功，不惜把大總統讓給袁世凱做。但在約法上把總統職權規定得小些，以為預防。那些先生們似乎忘記了政權寄托在武力上面，沒有優勢的革命武力，如何能使法律有效呢？其實他們大半是不希望革命徹底發展下去的。到二月十二日，和議就成功了，宣布南北統一。革命成功這樣的快，在淺見者以為是一件幸事，其實正是不幸得很，對於北方腐舊勢力，原封未動，所做到的僅祇清帝退位而已，而民國政府對待這退位的皇帝還得待以外國君主之禮，還得每年送他四百萬元皇室經費，他在皇宮內面還儼然以皇帝自居，接受那些遺老舊臣的朝拜。

上文已經說過，在武昌起義後，各地紛紛獨立聲中，紳士地主們很多只把舊日督撫改頭換面稱爲都督。其他表面革新的，實際也往往是官僚地主舊勢力主持。因此由十七省的代表所組成的臨時參議院，差不多完全落在官僚地主舊勢力的手裏了。這就是革命失敗的開端。在這一形勢之下，孫總統不得不讓位子給袁世凱，而首都也不得不北移了。

二次革命的失敗

且說南北統一的結果，國父辭去臨時大總統職務，臨時參議院改選袁世凱繼任，並請袁氏到南京去就任。袁氏是個狡猾之徒，如何肯離開他的老窠巢？於是暗中叫部下舉行兵變。揚言非由本人坐鎮北京，不能維持北方的秩序。無意堅持原有主張的臨時參議院，只得「抬起衙門就知縣」，允許遷都北京。一個革命的首都只有建立在革命的環境中，有革命的民衆與軍隊羣衞，才能夠執行革命的政策，所以國父在那時候堅持必以南京爲首都。將首都遷到反動的巢穴裏去，這是反革命派的又一勝利。

袁世凱在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以後，就努力想組成一個適合自己意思的內閣（他把第一任內閣唐紹儀提開，換了自己親信的趙秉鈞），努力在議會選舉中培植自己與黨（進步黨）的勢力。但是從同盟會變化出來的一個大黨——國民黨，在國會選舉中獲得

大多數的議席，國民黨有力分子宋教仁準備以議會多數黨的背景出來組閣。這在各立憲國家是很合乎規律的，袁世凱如果是遵守法治原則的，當然祗能承認國民黨登臺執政，自己安心做個法國式的總統，但袁氏擁有龐大武力，又有野心，又絕不在革命勢力包圍的環境下，他肯讓國民黨取得勝利嗎？在民國元年國會還沒有成立的時候，這個鬥爭還沒有表面化，到民國二年國會開會（四月八日開會）的前後，時局就開始緊張，開始轉變。有兩件重要事情：一件是大借款，袁世凱不經國會通過，擅自向英法德日俄五國銀行團借款二千五百萬鎊，叫做善後借款，以辦理革命善後事宜爲名，其實是擴充武力，準備剷除南方勢力，所以上海及南方各省報紙對這件事攻擊得很厲害。還有一件是宋教仁被刺。宋案發生於上海的北火車站，是袁世凱使趙秉鈞暗派心腹收買流氓幹的，該案雖在上海偵查審訊，但是袁氏黨羽佈置周密，重金賄賂，很難做到水落石出，所以國民黨影響下的報紙，揭穿袁氏陰謀，加以攻擊。同時國會開會後，對借款與宋案問題，也提出質問。民國二年的上半年，國內政治形勢異常緊張，袁世凱懂得「先下手爲強」，所以「國民黨第二次革命」的主張還沒有成熟的時候，袁氏就早已佈置軍事，並拉攏了坐鎮武漢的黎副總統元洪，使他守中立，然後一道命令下來，將國民黨三都督（江西都督李烈鈞，廣東都督胡漢民，安徽都督柏文蔚）免職。當國民黨軍人被迫反抗時，湯薌

銘與張勳的海陸部隊即採用主動攻勢，迅速勦平討袁軍了。

袁世凱的獨裁

二次革命失敗以後，袁世凱就下令解散國民黨，取消國民黨籍的議員，並實行白色恐怖，在南方各省大批逮捕及屠殺革命青年。不過對議員的行動是在總統選舉以後，他因爲想要從臨時大總統過渡到正式大總統的地位，所以仍然讓國會稍延壽命，叫國會進行總統的選舉。當選舉時，用軍隊包圍國會，強迫議員投袁氏的票，等到大總統當選人揭曉以後，國會就沒有用處，所以下令取消民黨議員，使國會不足法定人數，之後就索性加以解散。國會解散了，袁世凱的反革命獨裁便形成了。袁氏認定中華民國約法大有缺點，於是找了許多人組織一個約法會議，將它修改，大大地擴張總統權限。之後又修改民國二年國會所通過的大總統選舉法，將五年期限改爲十年，連任並無限制，而且不必再行選舉，由參政院議決大總統連任就是了。所謂參政院的組織法也是約法會議所定的，參政並不由選舉而來，是由總統派定的。袁世凱這樣任意毀法造法，高高興興地做着終身總統，還嫌不夠味。到民國四年末，便大過其皇帝癮。

辛亥革命的成敗

辛亥革命有成功的地方，也有失敗的地方。辛亥革命沒有把封建腐舊勢力肅清，因而不能眞正地建立起民主共和政治，這是顯然的失敗。這種

失敗的原因，最主要的是革命黨人沒有堅持北伐，沒有堅持不遷都，太隨便接受和平條件，讓腐舊勢力得以進行反革命，這又是由於革命黨內部不健全，沒有發展革命陣營內的理論鬥爭，一般同志對於國父的三民主義不了解，以爲清帝退位，革命就成功，不知道還有其他的任務，同時又不服從國父的指導，忽視了國父不與反革命派妥協的主張，因而不能夠繼續把革命推進，貫徹。而且那時候革命政府沒有提出取消不平等條約及實行平均地權等政綱來鼓勵民衆作推進革命的後盾，也沒有強化革命武力（袁世凱命黃興留守南京，專門遣散準備北伐的各省革命聯軍，但他的北洋軍則不曾由革命軍人加以改編或訓練），所以受不住反革命的反攻。

但辛亥革命，確定地摧毀了數千年的君主專制，後來袁世凱的稱帝，宣統的復位運動，都不能成事，可以證明民主勢力已經走上確定勝利的道路，這種意義非常偉大，就是辛亥革命的成功處。成功迅速的主要原因是由於反滿的總目標之下形成了廣大的聯合戰線。

第七講　五四運動

五四運動發生於民國八年，是繼續辛亥革命的一次偉大的民衆運動。這個運動是因日本帝國主義的對華侵略而引起的，現在首先說說日本侵華的情形。

日本乘機侵略

日本自從甲午戰爭、日俄戰爭打了兩大勝仗以後，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很快，對南滿及東部蒙古的經營很積極，美國雖然一度主張開放滿洲門戶，由各國共同投資，但日本隨即和俄國妥協，聯合對付美國，美國終於失敗。民國成立以後，日本看中了我國袁世凱這個寶貝，答應幫助他完成獨裁的政權，藉此取得了滿蒙五條鐵路建築權的交換禮物。一九一四年(民三年)歐洲發生大戰，西方列強顧不到東方，日本就乘此機會進攻我國租與德國的青島(膠洲灣)，以及膠濟鐵路(由青島通濟南)。袁世凱政府宣布中立，並且把租借地以外的許多地方劃作戰場，讓日本去蹂躪。日本佔領了我山東，還想趁機會獨吞中國，他曉得袁世凱想作皇帝，就答應幫他做皇帝，叫他更胆大些賣國。一九一五年(民四年)一月，日本對華提出二十一條件，內容關於山東、南滿洲、

內蒙古、漢冶萍公司（經營大冶鐵鑛、萍鄉煤鑛及漢陽鋼鐵廠，是中國自營的最大重工業），沿海島嶼港灣，以及全國政治軍事的設計，軍警的訓練，軍械的製造等種種權利之讓與。袁世凱胆子不夠大，不敢隨便答應，祕密交涉拖延了四五個月。日本帝國主義生氣，在五月七日提出最後通牒來恐嚇，限四十八小時以內答覆。袁政府沒奈何，在五月九日答覆日本，除關於全國內政的幾點容待日後協商外，其餘各條完全承認。袁世凱死了以後，段祺瑞當權，仍然把日本帝國主義做靠山。我國參加歐戰以後，日本又逼迫我國段政府和他訂立軍事協定，共同防範俄國的革命黨，協定上規定由日本軍官訓練中國的參戰軍，並允許日本軍駐紮滿蒙地方。在北京政府裏面操縱財政金融的人又是日本飼養起來的買辦，如王克敏等，他們在段祺瑞當權期間，經手借日本債款達五萬萬元以上。

中國連年內戰

日本帝國主義扶植北洋軍閥的結果使中國不斷地發生內戰，因為反革命的封建餘孽既因取得外援而囂張，革命的民黨便不得不組織武力的抗爭來保衛辛亥革命的成果，及繼續辛亥革命的任務。這種內戰在袁世凱時代就開始了。袁世凱壓平二次革命，建立獨裁政權以後，便在民國三四年間準備做皇帝的工作，如改變官制，文官稱卿、大夫、士，武官稱將軍，頒給親王、公、

侯、伯、子、男的封爵，又使楊度等組織籌安會，宣傳改變國體與實行君主立憲的必要，之後又製造民意，舉行決定國體的所謂公民投票。到民國五年元旦，就正式登基，改元洪憲。因此蔡鍔李烈鈞於民四年底在雲南起義，稱「護國軍」，高舉討袁旗幟。這次討袁不但國民黨參加，進步黨也參加，如梁啓超就在天津發表反對帝制的論文「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並且南下參與討袁軍事。因此各省紛紛響應。袁軍又在四川戰敗，把袁氏嚇得連忙宣布取銷帝制，因爲又羞又氣，不久就一命嗚呼了。袁死以後，段祺瑞以內閣總理的地位暗中主使督軍團（黎元洪繼任總統時，將各省軍政長官改名督軍，係將南方的都督及北方的將軍各採一字）獨立，壓迫黎元洪解散國會（黎氏開始時不肯解散國會，將段祺瑞總理免職，召張勳入京，張又強迫解散國會，並迫得黎氏逃入外國使館）。張勳又乘機抬出宣統帝復位。北方鬧得這樣烏烟瘴氣，國父孫中山先生於是號召護法運動，護法者保護民國約法，也就是反對解散國會的北洋軍閥之謂。張勳的復辟（辟就是君主，君主復位叫做復辟）雖然終於被段祺瑞用武力打消，國會及總統都還是沒有恢復自由，護法戰爭因此發生。當時國會在廣東重新集會，並組織了護法軍政府，集結湘粵桂三省聯軍北伐。段祺瑞有日本借款支持，很想仿效袁世凱，用武力來統一西南。先後派傅良佐、張敬堯、吳佩孚等，率大軍南下，終於把護法軍打敗，佔領了長

沙、衡陽。但佔領衡陽以後，前鋒吳佩孚部卽按兵不進，這不但是因爲衡陽以上有五嶺的險阻地形，不容易通過，而且是因爲段祺瑞一系的軍人政客（安徽系同時又是安福系，安福是從安福俱樂部那個政團得名）把持北方政權，勢焰薰天，引起直隸系的吳佩孚等的憤恨。這樣一來，北洋軍閥的南征便不能貫澈，而南北對立的形勢便延長了。拿護法戰爭與民國二年二次革命比較：上次北洋軍閥內部矛盾沒有發展，還是統一的，而這次則內部矛盾尖銳化；上次革命軍沒有注意經營廣東作根據地而單純扼守南京一帶，比較地難以持久，這次因有廣東做根據地，北洋軍就不能速戰速決（因爲交通隔絕，北方人又不慣於山地戰）。南方護法軍政府內部雖然有缺點，到底是民主勢力的代表者，所以他的繼續存在，對於全國反對安福系軍閥親日賣國的運動，是一個很有力的鼓勵。

民族工業稍有發展

反對親日賣國要角，是民族工業家、產業工人與小工商業者，這些社會層是城市的民衆，比較鄉村民衆覺悟較早，而且對於日本帝國主義與賣國軍閥的行爲，感知極爲親切。特別是民族工業家與產業工人，迫切希望中國實業的自由發展，所以民族解放的要求很是激烈。這一部分力量，因爲歐戰期間國際資本的壓力較輕，民族資本的企業進行比較方便，而有相當的增漲。歐戰期間我國新增加的企業多屬於輕工業，如紗廠、絲廠及麵粉廠等，銀行也有相當的發

展，這種趨勢到戰後三四年內還是繼續的。如紗廠布廠在民國四年有二十二廠，到十一年增加到六十四廠，這幾年當中紡錠數目從五十四萬加到一百六十萬。麵粉在歐戰期間，輸出國外的數量超過了輸入，可見我國生產的增進。上海的絲廠，在民國元年至十六年間開設的有六十三家之多，自然也是歐戰的影響。銀行在辛亥革命前只有六七家，到民國十二年，就有一百多家了。我國新興實業的進展，首先遭遇的敵人就是日本帝國主義，因爲日本正是乘歐戰機會向中國謀發展的，它的工業也多屬於輕工業。在「五四」前後我國抵制日貨的運動非常激烈，這不是偶然的情感作用，實在具有深刻的意義。

以上是就五四運動的背景大致說說，現在再敍述五四運動的經過情形。

外交失敗 羣情憤激

世界大戰於一九一八年結束，各國代表齊集巴黎議和，我國以參戰國資格，派了代表陸徵祥顧維鈞王正廷等到會，原來想趁此機會廢除不平等條約，收回山東的，但結果大大失敗了。不獨一般的不平等條約談不到廢除，就是二十一條件也不能談及，山東問題呢，和會通過將德國在山東的一切權利讓與日本。要說外交辭令呢，我國代表在和會中的演說比日本代表的話實在動聽得多，可是我國偏偏失敗，日本偏偏勝利，是什麼緣故呢？因爲在大戰期間，日本早已和英法俄義訂了密約，

英法等祕密允許它繼承德國在山東的權利。同時我國的親日派也有承認的文件，事實是這樣的：駐日公使章宗祥代表段政府和日本交涉高徐濟順兩鐵路（都在山東）的借款，日本另外提出七個條件，大意是要中國承認它侵佔山東的既成事實，章宗祥在換文上面終於寫上「欣然同意」幾個字，日本方面於是拿這幾個字作爲承認的證據。

外交失敗的消息傳來，全國羣情憤激，五月四日，北京學生舉行示威大會於天安門，列隊游行，至趙家樓曹汝霖（外交次長，爲承認二十一條件的出力人物）住宅，進去質問，曹氏正和章宗祥談話，聞警慌忙逃走，羣衆即搗毀傢具，焚燒建築物，並且打傷了章宗祥，高呼「內除國賊，外抗強權」的口號，之後軍警趕來逮捕了一些學生。羣情更爲憤激，各校卽行罷課援助，全國各地紛紛響應，各界團體用文電抗爭及請願的絡繹不絕。政府雖釋放被捕學生，表示歉意，羣衆反對日本侵略及要求收回山東的運動仍然高漲，至六月三日上海市民大示威後，卽首先罷市罷工，數日內就有十幾個大城市響應，同時抵制日貨的運動也迅速開展。北京政府怕起來了，於是宣布將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三人免職，同時出席和會的代表也拒絕在和約上簽字。

這次民衆運動獲得很大的勝利，對於日帝國主義及其代理人的確是一個大打擊，所以「五四」後十年間，日本侵華的面目沒有那麼猙獰，而國民革命的形勢日益開展。

五四運動不止是一個反帝國主義的政治鬥爭，同時還是一個反封建的新文化運動，這個運動開始於五四以前數年，爲促成五四鬥爭之思想的背景，五四的鬥爭又把這個運動推進了，展開了。反封建的文化運動，一方面是批評中國傳統的學術思想禮制風俗等等，將過去一切文化重新估價，

新文化運動開展

一方面提出「科學」與「民主」兩個正面的標識來。最初發動這個運動的是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雜誌，胡適與陳獨秀在該誌提出白話文學的主張，吳虞陳獨秀魯迅等高舉反對舊禮教的旗幟，錢玄同吳稚暉等提倡新語文的應用，他們和舊派作過多次的論爭，對青年發生的影響最大。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對新文化運動熱心贊助，他聘了陳獨秀做北大文科學長，胡適魯迅等做教授，與國故派劉師培辜鴻銘等教授相對峙，充分發展大學內面的民主精神，造成講學自由的風氣。於是北大的優秀學生傅斯年等與一部分教授編了一個刊物，叫「新潮」，響應「新青年」，北京晨報首先改革副刊，登載新的評論與文藝，此外北京還有一個重要週刊「每週評論」及通俗刊物「新生活」。這樣就使得北京，特別是北大，成爲新文化中心。

五四大示威發生，新文化運動隨着救國運動而普遍到各省，一時大小刊物紛紛出現。上海六三運動以後，全國學生聯合會成立，差不多各級學生會都有刊物，其他同人

刊物也非常之多，南方著名的刊物有「星期評論」（上海）「湘江評論」（長沙）等，報紙副刊大半也革新起來，最著名的有上海民國日報的「覺悟」及時事新報的「學燈」等。同時因爲宣傳救國及組織抵貨運動，各地學生多開辦了平民學校，組織了宣傳劇團以及下鄉工作團體，因之新思想也逐漸帶到下層羣衆中去。

五四時期的青年對我國傳統的舊文化，採取盡情攻擊的態度，那時候的言論比較近年來批判傳統文化的言論要激烈百倍，比方「非孝」的主張，將「孝」這種道德簡單地否定了；「以世界語代替漢文」的主張，認爲中國只有「太陽」「月亮」「吃飯」「睡覺」之類的字句，沒有學術的語言，過去的中國書完全是宣傳迷信與專制的，應當一律廢除，早些走上世界同文的路。像這類的議論，在初期新文化運動是不能免的，並且對於解放舊思想的束縛，也是必要的，但是現在看起來，那都是「聊以快意」，對事實沒有益處的話，不合於科學方法的。我們現在認爲舊文化是新文化的根基，沒有舊的傳統，新的便無從產生，即使從外面移植新文化進來，也不會有接受的能力，不過舊的文化不適合於新時代，它應當「日日新」地向前進步，把它的缺點淘汰，優點發揚，所以我們主張接受前人的文化遺產，但不能夠無條件地接受，只能批判地接受。所謂批判地接受者，既不是全部接受，也不是全部否定，而是兼有淘汰與發揚兩方面作用的意思。

，五四時期的介紹新思潮，形成萬流並進的形勢。在外國互相水火的學說，同時輸入中國來，開始時彼此還能相安，各行其是，青年們的頭腦也就把他們兼收並蓄，比方社會主義啦，無政府主義啦，民主主義啦，大家混做一團。到民國十年，新青年雜誌談起社會主義來了，於是發生了社會主義的論戰，主要的對壘者就是所謂安那其派（即無政府主義派）與馬克思派（即科學的社會主義派）。安派理想很高，而馬派注重事實，前者爲理想家，後者爲實行家，兩方人生態度不同，所憑藉的社會背景各異。起初人們以爲兩者相近似，自從經過論戰，人們都明白了他們的差異，也就發生了深刻研究的興趣。民國十二年，又發生了一次科學與玄學的論戰，中心問題是討論人生觀，當時參加筆戰者都是社會名流，雙方壁壘分明。張君勱梁啓超等主張玄學的人生觀，認爲旁的事情可用科學解決，人生觀問題不能用科學解決，人生觀是屬於形而上的範圍。丁文江胡適吳稚暉等主張科學的人生觀，認爲世界上任何問題都屬於科學範圍，人生觀也不能例外。玄學派認爲東方的精神文明是救世之寶，科學派認爲西方的物質文明才能夠爲人類造幸福。科學派雖然比較傾向於實際，但仍然不能用正確的科學方法來處理精神文明，處理玄學派所提的問題——西方有物質文明而戰爭的災禍那麼酷烈，那不是應該用東方精神文明去治療嗎？科學派不能夠明白地指出：西方戰禍是資本主義制度（現代西方精

神文明正是這個制度的標記）的產物而不是物質文明的罪過，西方人正在提倡新的社會制度（從而有新的精神文明）來救濟它，那不是東方精神文明所能做的事。玄學派籠統抽象地說以精神文明來補救物質文明的缺陷，更是文不對題。這一場論戰不能夠得到滿意的結果，實在是五四時代新文化運動不很深刻的表現，這是時代所限制，不能不由後來的新文化運動去補救。

五四是承前啓後時期

人生觀的論戰是五四時期的壓軸戲，經過這場熱鬧以後，中國歷史轉入一個新的時期，即國民革命的行動時期——論戰的次年，即民國十三年，國民黨改組，三民主義形成了時代中心思想——而五四的領導人物，或則進一步去參加革命，去從事社會運動，或則退到書齋中去吟風弄月，去鑽古書的牛角尖。從民國四年新青年出版到民國十二年，這八九年間是中國革命運動一個承前啓後的時期，以五四運動來做代表。在五四時期以前，一般人的思想還沒有超越十九世紀的民族主義（即國家主義）與民主主義（只有政治上的民主，沒有經濟上的民主，也就是只有民權沒有民生的主義），對於國父的三民主義是很少了解的，在五四時期以後，因為俄國社會革命成功，社會主義影響擴大，中國共產黨產生，國父更親切地闡釋三民主義，結合民族主義與世界大同的理想，聯繫民主革命與社會革命的門

爭；而他的同志與一般優秀同胞也多半能了解，能接受這種新的革命理論，因而參加革命的民衆比較辛亥時期也更爲廣泛，不但知識分子與紳商，卽農工生產分子也積極地自覺地參加。這種顯著的進步，我們不能不歸功於五四時期的啓蒙工作。

第八講　十五年北伐

五四以後七八年中間，中國國民革命的潮流高漲，直到十五年北伐，就漲到了頂點。我們要講述這一時期的主要史事「北伐」，還得首先分析一下當時國內外的形勢。

北伐以前的國際形勢

世界大戰結束了，那時候的太平洋國際形勢也變了。一九二一年的華盛頓會議，把日本獨佔東亞的兇鋒挫折了一下。會議決定日本要把青島及膠濟鐵路交還中國，把二十一條件取消，並且當場訂立九國（英法日意美華荷比葡）公約，聲明尊重中國領土和主權的完整。這時候，英美日三強在太平洋有勢力均衡的模樣。

另一方面，俄國革命成功，對內對外都實行民族平等的政策。一九一九、一九二〇及一九二三年，蘇維埃政府三次對華宣言，聲明廢除俄皇時代的不平等條約，另訂平等條約。到一九二四年（民十三年），中俄協定在北京簽訂，同時東三省和新俄也訂了奉俄協定，這是我國廢除不平等條約的開端，對於我國爭取國際地位平等的國民革命，是很有力的鼓勵。

帝國主義既不能用武力干涉中國的事，革命的俄國又有意幫助中國的解放運動，這就可見國際形勢是對於中國革命有利。再看國內情形，也是對於革命有利的。

北伐以前的國內政治

一方面，我們看到北洋軍閥的分裂和火併，五四運動的次年（民九），直系軍閥曹錕吳佩孚利用民衆反對親日派的情緒，推翻了親日的皖系軍閥，民國十年，又打敗了親日的奉系軍閥。當時曹吳解散皖系所組織的國會，趕走他們所舉的大總統徐世昌，却重新拾起黎元洪時代的舊國會來。那些國會議員，不少無廉恥的政客，曹吳拿金錢收買起來，果然奉承意旨，舉曹錕做大總統（民十二）。曹錕的賄選，引起了全國的憤慨，奉系軍閥趁此機會，進攻直系。却不料奉直未分勝負的時候，直系內部又分化了，馮玉祥領導的國民軍，突然起事，推倒了曹吳，並且驅逐了宣統帝，歡迎國父北上，共商國事。奉系內部也發生了新派郭松齡的倒戈。

社會動態與國民黨

另方面，我們看到社會各階層的活躍。中產市民，尤其是富有民族思想的實業家，在五四參加反對賣國賊的鬥爭以後，對吳佩孚的武力統一政策也曾表示反對，他們主張召集國內和平會議，制定憲法，實行民主政治。還有些人贊成聯省自治，這個辦法就是首先制定省憲法，一省一省地

逐漸實行憲政，然後聯合起來，改革中央。但是最前進的一部分，就擁護國父孫先生的革命方針。

國父眼見得西南軍政府的自動解散，陸榮廷莫榮新乃至親信的陳炯明，都勾結曹吳，背離革命，國會議員也不少受曹吳收買，變成豬仔，這些武人政客，都不足靠，民國初年的法統（約法的傳統），也再沒有保持的價值，於是決意改變方針，放棄護法戰爭，進行國民革命，其入手方法卽注意民衆運動，向農工商各界作廣大的宣傳。而這時的各界民衆，除商界如前所述外，工農及知識分子都大有進步。知識分子自從五四時期參加新文化運動以後，把歐美民主主義及社會主義的思想介紹進來，就產生了幾種不同的傾向。有的主張說服吳佩孚，用和平手段統一全國，組織好人政府。有的則主張用民衆力量，打倒軍閥和軍閥的後台老板——帝國主義。工界自參加五四運動後，常常發生要求改良生活的工潮，又紛紛組織工會。民國十二年二月七日，平漢鐵路工人因組織工會事，被吳佩孚壓迫，竟至發生流血慘案。民國十四年五月三十日，上海工人因反對日本紗廠的壓迫，和巡捕衝突，也發生慘案，工人於是總罷工，並和商學各界聯合奮鬥。同年六月，廣州及香港工人，爲援助上海工人，及擁護廣東革命政府，也舉行大罷工。至於農民，因爲接受了國父耕者有其田的理想，又爲工人運動所鼓勵，他們也組織團

體，參加革命，特別是十五年北伐軍經過的地方，農民們幫助作戰，非常積極。

國民黨的改組

國父注重下層民衆的運動，又因國民黨腐化無能，不足以担負喚起民衆發展革命的巨大任務，決意加以改造。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年），他開始籌備改組國民黨，將修改不平等條約，實行普通選舉（選舉人不限定資格）及直接民權，改進農工生活和他們的地位等項寫入國民黨政綱，充實三民主義的內容，又廣泛吸收各界革命分子，充實黨的組織。十三年一月，國民黨召集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於廣州，國父出席演講，說革命須採用新方法，所以要改組國民黨。大會於是通過新黨章和宣言，決定組織國民政府，並批准共產黨與社會主義青年團加入國民黨案。新黨章規定各級領導機關採用委員制，並以定期舉行的代表大會爲最高權力機關，這是採用了民主集中的辦法。大會宣言駁斥了聯省自治、和平會議等類的政論，指出中國自強的必走之路，解釋了國民黨之主義，列舉了國民黨之政綱。

在主義的解釋上，有幾點非常值得注意。第一，民族主義由反對滿清專制進展到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而且放棄了大漢族主義，承認國內各民族的平等和自由聯合。第二，民權主義，一方面指摘「近世各國之民權主義，往往爲資產階級所專有」，另方面確定了「凡眞正反對帝國主義之個人及團體，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權利，而凡賣國罔民

以效忠於帝國主義及軍閥者，無論其爲團體或個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權利」。第三，民生主義在「平均地權」之外，加上了「節制資本」，而且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目標。（按：耕者有其田是國父民生主義演講裏面所強調的。在該演講內，還確認共產主義與三民主義可以相容。）

主義的實現不能不靠正確的政策。這次大會確定了國父所倡導的三大政策，就是「聯俄」，「聯共」，「扶助農工」，就使得三民主義的實現有了具體的辦法。

這次大會以後，一部分守舊的黨員很不滿意，紛紛脫黨，但青年知識分子和農工分子參加了很多進來。經過了這番淘汰和代謝，黨對於民衆的領導加強了。

共產黨的產生

如前所述，在五四運動中，中國的知識分子因爲看到工人參加反帝反軍閥鬥爭的英勇及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熱情地傾向於社會主義思想者，頗不少。有些人甚至開始進行勞工教育與勞工組織的運動。從民國八年到九年（一九一九—一九二〇）之間，這些知識分子對於社會革命與勞動運動的了解由紛歧模糊而逐漸形成系統的思想。他們又在各地建立社會主義的組織。到十年七月，以代表中國工人自命的中國共產黨便宣告成立了。十一年，共產黨發表宣言，主張打倒軍閥和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由人民建立眞正的民主共和國，又號召無產階級與

民主主義革命勢力合作。從十二年起，他們便開始和國民黨建立革命的聯合陣線。到十三年國民黨改組以後，一部分共產黨員就參加了國民黨。

聯俄政策的發展

國父的革命新方法是參考各國革命的經驗而決定的，尤其是參考了俄國的經驗。他在俄國十月革命成功的時候，就非常感動，打電去慶祝。蘇俄方面也對國父的奮鬥表同情。民國十年，第三國際會派代表與國父商量合作辦法，不久，蘇聯又派代表越飛到中國，於是有「孫越協定」的簽訂。國民黨將改組的時候，國父給廖仲凱以全權，執行聯俄政策，又派蔣中正親自到蘇聯去考察，後來又聘蘇聯代表鮑羅庭做國民黨的顧問。蔣氏回來，國父派他在黃埔訓練新的軍事幹部，重新建軍，這時候蘇聯又助了槍械，派了專家來做顧問或教官。

當國父改組國民黨，實行革命新方針的當兒，直系軍閥勾結廣東的小軍閥陳炯明等搗亂革命根據地，廣州商團首領陳廉伯又陰謀以武力推翻革命政府。因國父採取堅決手段，陳廉伯的陰謀被擊破了。直系軍閥的統治，在十三年十月，也被國民軍發動政變推翻了。

國民會議運動

曹吳倒台，段祺瑞担任北方的臨時執政，因為國父主張召集國民會議，實行和平統一，全國人民都熱烈贊成，使得段祺瑞也不能不邀請國父北上，共商國事。十三年十一

月，國父起程北上，發表北上宣言，提出取消不平等條約的政策及召開國民會議的辦法。宣言中說：「凡武力與帝國主義結合者無不敗，反之，與國民結合以速國民革命之進行者無不勝。今日以後，當劃一國民革命之新時代……第一步使武力與國民相結合，第二步使武力為國民之武力。」宣言對於國民會議的召集，主張事先召集一預備會議，由全國農商工學各團體，共同反對曹吳各軍及政黨派代表參加。

當時全國各地民衆，都擁護國父的主張，各地紛紛成立國民會議促成會，做他的後盾。但是段執政沒有與民衆合作的誠意，不肯接納國父的辦法，而召集他所御用的善後會議，由政府指派所謂有勳勞有資望的少數人包辦，不容許人民團體代表參加。後來執政府又拿出一個國民代表會議條例草案，提交善後會議，規定國民代表會議的職權，以制定憲法為限，這又和國父由國民會議解決全國一切大問題的主張不合。

國父這時候病勢沉重了，國民黨知道和段祺瑞沒有合作的可能，便議決黨員不參加善後會議，並通電表示不能贊同該項會議。

國父遺囑同志

不幸國父一病不起，十四年三月十二日竟在北平逝世。他臨終，對中國的革命事業，念念不忘，遺囑國民黨同志繼續努力，並且指出革命成功的途徑，在於喚起民衆，及聯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還有致蘇聯的遺書，

表示希望中俄能長久合作。全國民衆忽然失去了革命的導師，異常哀痛，同時也很激昂地要繼承他的遺志，因此各地追悼他的大會，空氣極爲悲壯。從此革命潮流一天天高漲，國父的精神不死！

五卅運動的開展

就在兩個多月以後，上海發生了五卅大罷工。這是一次空前巨大的反帝國主義羣衆鬥爭。這個鬥爭的興起，是受了國民黨及共產黨反帝宣傳的影響。事情的起因是日本資本家壓迫中國工人。上海內外棉織會社的工人，因要求增加工錢，被日本老板開槍，打死爲首的顧正紅。五月卅日，工人和學生在南京路演講，又被租界當局開槍轟擊，死傷多人，於是引起總罷工罷市罷課的運動，這次運動，一方面反抗日本的壓迫，另方面也是向租界當局抗議。參加者有工商學各界，並組織了工商學聯合會，共同提出條件，請政府（北京政府）交涉，這是全民一致對外的表現。

工商學聯合會提出的條件，最重要的是懲兇，賠款，道歉，華人在租界有言論出版集會之絕對自由，優待工人，訂立工人保護法，承認工人有組織工會及罷工之自由，撤銷「印刷附律」「加徵碼頭捐」「交易所領照」等案，制止越界築路，收回會審公廨，取消領事裁判權，永遠撤退英日駐華海陸軍。所謂印刷附律，加徵碼頭捐，交易所領照

等案，乃是工部局（工部局是上海公共租界的行政機關）向納稅外人會（這是立法機關）提出要求通過的，這些法案對於華商利益都有妨礙，比方其中印刷附律是把印刷業和出版業的自由，限制得非常利害的。越界築路呢，是租界修築馬路，越過租界的界線，伸入中國管轄的地界了；這種馬路一經修成，租界的警察（卽巡捕）就來站崗，馬路兩邊如有人建築房屋，那房捐就被租界收去了，這明明白白是侵害中國的主權，但中國官廳向來不大注意，又怕洋人，就默認了；因此惡例一開，繼續越界築路的事情便連連發生。會審公廨是一個司法機關，等於審判廳或地方法院，所謂會審，就是由洋人與華人會同審判的意思，原來外國人根據領事裁判權，要求把牽涉外人的中國人官司，由華洋雙方會審，但是後來有一次因爲發生內戰，中國官廳沒有人負責，外國人就把租界上全部的中國人官司，都拿到會審公廨來辦，並且完全由外國法官處斷，這個例子一開，以後就不更改了，五卅時提出收回，就是要把租界上非法侵佔我們的司法權收回。至於領事裁判權，是指條約上正式承認的一種特權，我們在第一章裏面曾經說過的，這種特權，外國人常常叫做治外法權，「治外」就是本國統治範圍以外，在國際法上，對於大使公使之類的外交官，是照例容許其享有治外法權的，不過普通的僑民，應當服從當地法律，沒有享受治外法權的道理，爲「正名」起見，這種特權衹能叫領事裁判權，因爲

事實上遇了外僑的官司，總是移交外國領事辦理。

上海市民的條件雖然提得很好，但北京政府却不肯認眞交涉，後來租界方面稍微出點撫䘏金，增加幾個華人代表進工部局董事會，敷衍了事（外國人還答應增加一點兒關稅稅率）。可是五卅運動的眞正意義却不在這裏，而在全國洶湧的革命羣衆鬥爭，越來越起勁。當時北至天津，南至港粵，全國各大都市紛紛響應，有的罷課罷工，有的示威游行，六月二十三日，廣州各界示威游行，在沙基遭洋兵開槍射擊，由此爆發大規模的省港（廣州和香港）大罷工。這次大罷工堅持了十六個月之久，罷工工人與廣東各界民衆一致推行對香港的經濟絕交，封鎖海口，使香港蒙受每日一百八十萬元的經濟損失，英帝國在遠東的威權一落千丈，而廣東的革命政權則由此鞏固。

反革命武力開始削弱

當時奉系軍閥非常猖狂，奉軍不但進了山海關，並且沿津浦路南下，到了上海，他們向來和帝國主義勾結，所以盡量壓迫民衆運動。但是，由於北洋系的四分五裂，軍閥力量還不夠鎭壓革命。十四年十月，浙江孫傳芳，利用反奉的民氣，出兵驅逐上海及安徽江蘇省境的奉軍，孫的宣言居然指責奉軍壓迫罷工的罪過。華北的國民軍是反奉的，奉軍郭松齡又實行叛變。國民軍的防地內，城市和鄉村的民衆，都相當活躍，尤其是北平，竟於十一月叫出「首都革命」

的口號，要推翻執政府，建設國民政府，不過國民軍本身對於革命運動還不曾積極參加。可是奉軍不斷地向國民軍壓迫，使國民軍不能不站在反奉戰爭的第一線。

當北方反奉戰爭開展時，南方也曾發生過幾次有重大意義的戰爭，這都是國民黨爲鞏固革命根據地而進行的。當時在廣東擁有雄厚實力的反革命派就是盤據東江的陳烱明，而駐在革命政府所在地廣州的滇軍楊希閔部及桂軍劉震寰部，也因爲舊習慣太深，不願意過革命的艱苦生活，大有動搖叛變的趨勢。革命政府的本身存在受到威脅，於是以黃埔軍校編練的新軍爲中心，兩次討伐陳烱明，將其實力消滅，完全收復東江，又將楊劉所部的滇桂軍解決。在討陳戰爭中，東江的農民自衛軍曾幫助革命軍作戰，討伐楊劉時，廣州工人也曾出力幫助革命軍。革命軍是由粵湘滇桂各省部隊組成，而以最勇敢的黃埔新軍爲前鋒，這部新軍所向無敵，其實還不到一師人，他們的力量完全是熱烈的革命情緒造成的。

革命根據地的鞏固

廣東反革命武力被肅清的過程中，革命政府便由大元帥制改成委員制，而稱爲國民政府（十四年七月一日成立）了。委員會制是合議制，比較首領制進步些，所以黨和政府都採用這個形式。國民政府是對黨負責的，這是革命緊急時期的需要，因爲國民大會還不可能召集，祇能以集合

全國革命力量的團體國民黨來代行國民大會的職權。國民政府成立以後，它所屬的省政府也改爲合議制。軍事方面，在政府下面設立一軍事委員會，羅致各省軍事領袖，把軍權統一起來，參加革命的各種地方軍隊，通通改編做國民革命軍。黃埔新練部隊和一部分廣東軍，編成第一軍，軍長開始係蔣中正，到北伐時改何應欽；湘軍爲第二軍，軍長譚延闓；滇軍爲第三軍，軍長朱培德；粵軍李濟琛部爲第四軍，李福林部爲第五軍，桂軍李宗仁部爲第七軍。

國民政府成立以後不久，國民黨中一個最能堅決執行孫總理三大政策的優秀領導者廖仲愷先生（當時是財政部長）被反動派刺殺（十四年八月二十日事）。但國府隨即捕獲嫌疑犯人，並且解散廣州及附近幾部分有反動傾向的軍隊。革命政府仍然穩固。

當時有一部分留在北平上海的國民黨老同志，不大贊同廣東方面黨政軍的行動，另以「反赤」的旗幟爲號召。他們曾在國父遺體暫厝處北平西山集會，因此被世人稱爲西山會議派。由於這一派的行動，國民黨在總理孫中山先生剛剛逝世之後，就有分裂的危險。中央委員會爲鞏固革命勢力的團結，於是在十五年一月召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於廣州。大會空氣極爲熱烈，通過了堅持民衆革命立場的決議，給動搖分子以很大的打擊。

三一八慘案的發生

廣東革命根據地既已穩固起來，北方的國民軍又同情於革命，那麽全國反動派就不能不驚心動魄，共同起來反攻了。當郭松齡倒戈，國民軍以全力和奉軍作戰的時候，吳佩孚也放棄對奉作戰，改而討伐馮玉祥了，魯軍張宗昌部也進攻國民軍了。日本帝國主義還恐怕奉直魯三軍打不了國民軍，直接出面干涉，首先幫奉軍解決了郭松齡，又用軍艦轟擊大沽口的國民軍，還瞎指國民軍首先開砲，而唆使辛丑條約各國向北京執政府提最後通牒。北京市民憤恨日帝國主義的陰險與兇暴，於三月十八日舉行民衆大會，遊行示威，叫出「驅逐八國公使」的口號，並向政府請願。可恨段祺瑞那廝竟下令衛隊開槍，當場打死四十餘人，傷者數百，這是所謂「三一八慘案」。慘案發生以後，國民黨黨員徐謙李石曾吳稚暉等還被通緝。國民軍對於這種內外環攻的局面，不能支持，終於被直魯奉聯軍趕出北京，退往西北。

北伐戰爭的發動

南方在這時發生了湖南的戰爭。原來趙恒惕拿省自治的旗幟應付南北兩方，竭力想保持超然的地位的，不料全國反革命武力和革命武力快要短兵相接的時候，正當衝要的湖南沒有脫身事外的可能，恰值部將唐生智勢力膨脹，趙卽自動告退，任唐部和自己親信的葉開鑫部去衝突，結果葉投入吳佩孚軍做先鋒，而唐也不得不參加國民革命軍（編爲第八軍），而北伐的前哨戰就

在湖南開始。

國民革命軍的北伐正如箭在弦上，不得不發，加以要援助北方的國民軍，和湖南的唐生智部，更不得不提前北伐。於是國民政府任命蔣中正爲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在十五年七月九日誓師出發。

革命運動從徒手的羣衆鬥爭發展到了武裝鬥爭的階段，便不能不進行革命的戰爭。北伐，正是繼續五四以來羣衆運動而轉進新階段的表現。

北伐戰爭的勝利

北伐軍主力經湖南出武漢，不到兩個月，就打破了吳佩孚的主力軍，汀泗橋一戰，吳佩孚吃了敗仗，再也振作不起來了，北伐軍於是佔領了漢口漢陽，圍攻武昌，到十月間，將武漢三鎮完全佔領。北伐軍另一路出江西，和孫傳芳軍接觸，也在十一月攻佔了南昌。沿海北進的北伐軍，於年底打進了福州（也是孫傳芳地盤）。十六年春季，沿海及沿江的北伐軍向長江下游推進，佔領了上海和南京。孫吳早已向張作霖求救，但也不能挽回潰敗的趨勢。

北伐軍人數不及直奉軍隊的多，裝備更差得遠，訓練也極不一致，很明顯地是劣勢的軍隊，但是他們攻打北方的堅強防線，好像折枯樹一樣，出兵八個月，就佔領了整個長江流域，這是什麽緣故呢？因爲北伐軍是和民衆結合的武力，有廣大民衆的幫助，加

以士兵抱着革命的志願，戰鬥的情緒特別強，那些反革命軍違反民意，兵無鬥志，自然不是北伐軍的敵手。北伐軍從廣州出發時，民衆就爭先恐後地充當伕役，特別是香港罷工工人，組織了幾千人的担架隊，隨軍出發。軍隊經過湖南時，不但有民衆招待及幫助運輸，而且有農民自衞軍担任嚮導、偵探或虛張聲勢，配合作戰，粵漢路萍株路的鐵路工人破壞敵方交通，參加武裝鬥爭。北伐軍轉到上海時，上海工人武裝起義，趕走軍閥隊伍，迎接革命軍。這些有組織的民衆行動，都是由國民黨及共產黨各地的黨員發動起來的。軍民的密切合作不但給予部隊以作戰上的便利，而且增加了他們作戰的勇氣和決心。總而言之，從「五四」「五卅」以來逐漸積蓄、發揚起來的民氣，是這次北伐戰勝的力量源泉。

民氣的威力不但助成軍事上的勝利，在外交上也發生了驚人的效果。十六年一月三日，英國水兵在漢口行兇，造成慘案，激起民衆的憤怒，於是漢口及九江的英租界，在民衆的要求呼聲中，居然由英國人手裏收回了。當時我外交部長陳友仁與英代表阿瑪利簽訂的協定，在中國近代外交史上的確放出了一種特殊的光彩。

北伐勝利的原因

這一次國民革命軍的北伐，摧毀了北洋軍閥封建性的統治，實現了中山先生多年倡導的也就是南方革命軍民所念念不忘的「會師武漢」的口號，

使南方民衆革命的高潮湧向中原去，向北方去，是有重大意義的。北伐勝利的原因，主要的不在軍事，因爲革命軍比較北洋軍是劣勢的。而是在於政治：因爲革命政府的主張或工作方針是實行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與三大政策，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廢除不平等條約，解放被壓迫被剝削的民衆；有了這種政治主張或工作方針，所以全國民心歸附；民心歸附，士氣就振作。不但如此，還有國共兩黨的聯合領導，發展反帝國主義反軍閥及改善人民生活的羣衆運動，造成了官民一致、軍民一致、官兵一致的精神。所以革命陣線非常廣大而堅強，正符合着「衆志成城」的古話。其實「軍事是政治的延長」，政治的力量並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形成的，而是自從五四運動以來，經過「二七」「五卅」「省港罷工」等等偉大的鬥爭逐漸積累成功的，到了羣衆鬥爭異常尖銳的時候，和平的方式便得轉變爲武裝的方式。北伐正是配合着這種形勢，所以「水到渠成」，「事半功倍」。因此，北伐只是這個連續幾年的國民革命高潮中的最後一部分。我們最須記取的，就是這一勝利得力於國共兩黨的合作。而國民黨威望空前的高漲，也得力於這一個合作。

第九講　北伐後的內戰

北伐革命本來是上層資產階級和工農羣衆聯合進行的，反映到黨派關係上，就是國共兩黨的合作。但是一到革命已經獲得相當成就的時候，有些向來反對革命的官僚、軍閥、政客、土豪、劣紳，都滿口贊成革命，混進革命隊伍來，挑撥離間，破壞革命陣線的團結。而帝國主義也從中播弄，對上層分子作些小小的讓步，又用砲艦政策來威脅，引起他們放棄澈底反對帝國主義的政策。特別是上層資產分子本身，祇想利用工農羣衆打天下，不願意和工農共掌政權，到了這時候，便決意要一腳踢開工農，好由自己獨吞革命的果實。因爲這些緣故，革命陣營內部就發生了分裂。本來同甘共苦的國共兩黨就變成了互不相容的冰炭。

革命陣線何以分裂

三月二十日事變

這種情形並不是突然而來的。在北伐出師以前，正當十五年北方三一八事變後兩天，就發生過三月二十日事變。當時國民黨西山會議派在帝國主義者買辦階級影響之下暗中在廣州活動，於黃埔軍校等機關內組織了孫文主義學會，時常造謠離間國共關係。那一天海軍局代局長李之龍忽然接

到一個假傳的命令，叫他將中山艦升火開到黃埔軍校候用，他不知道是假的，遵令開去。蔣校長在省城聽到消息，認爲共產黨陰謀作亂，便下令緊急戒嚴，並將李之龍扣押，同時包圍省港罷工委員會及俄顧問等人住宅，拘捕各軍黨代表等五十餘人。共產黨幾次表示讓步，事變才平息下去。到五月十五日，國民黨中央全體會又通過黨務整理案，限制共產黨員在國民黨內的地位，如不許當中央各部部長等。但因當時代表上層資產分子的國民黨實力派力量還弱，還願意和共產黨合作北伐，共產黨方面也退讓遷就，所以聯合戰線還能夠保持。

北伐佈置及遷都問題

國民黨對於北伐出師的布置，特別提高了軍校。不但海陸空軍及與軍事有關的各機關全部歸總司令節制，而且連政府所屬民政財政機關，在戰時也歸總司令指揮。總司令兼任國府的軍事委員會主席，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主席（原係汪精衛，在「三二〇」事變後被排斥出國）及軍人部部長。這樣集大權於軍事領袖一人之身，就準備了未來的清黨反共的政變。

北伐軍到達長江以後，廣州的國民政府決定遷都到漢口，因爲武漢是中國本部各省的中心，扼長江與平漢粵漢兩鐵路的樞紐，工商業的發達僅次於上海，擁有全國最大的兵工廠，附近區域又爲工農運動發展的地方，它確是一個很配做革命首都的地方。但當

時總司令駐在南昌，他主張國民政府搬到南昌去。經過一番爭論，雖然還是依多數中委意見遷都武漢，可是軍事領袖和黨政中樞的裂痕已經發生，帝國主義與反革命者從中挑撥，左右分化的趨勢一天天明顯。

帝國主義威迫利誘

當革命軍勢力到達長江的時候，帝國主義就看到了國民黨內部有溫和派與急進派的存在。為了拉攏溫和派，使它和急進派分裂起見，帝國主義一方面對革命政府表示若干次要的讓步，另方面又用砲艦屠殺政策對付一般反帝國主義的中國人。帝國主義暗示，只要革命政府願意維持帝國主義的秩序，尊重不平等條約的既成事實，他們洋大人也願意提供若干的讓步，甚至不平等條約的修改也不妨慢慢商量。這樣砲艦政策與懷柔政策雙管齊下，不怕溫和派不進它們的圈套。

十五年九月五日，英國砲艦藉口和楊森軍隊的小爭執，砲轟萬縣，屠殺民衆及兵士數千，焚毀商店二百多家。十六年一月三日，英國水兵在漢口又製造慘案。三月二十四日，英美日法意等國領事藉口僑民及領事館受南京示威民衆侵擾，下令南京江面各國軍艦開砲向城內轟擊，死傷我軍民千餘人，反向我政府提出無理要求。當上海工人解除北洋軍閥武裝之後，洋兵開到二萬餘人，還陸續開來，租界戒備森嚴，黃浦江軍艦雲集，

如臨大敵，他們又放出謠言，說民衆會佔領租界，這種緊張空氣的威脅，自然使國民黨溫和派担心，他們恐怕事情鬧大了，民衆的氣焰越高，那時要排斥工農與共黨而獨攬大權，不可能做到。

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英國公使於十五年十二月向各國公使團提議無條件承認中國增收海關附加稅，以表示對中國的好意。其實此項附稅，各國雖沒有承認，國民政府從在廣州時起就早已自動實行，對各國的抗議並不理會（尊重不平等條約的北方政府就不敢實行）。英國的意思是想拿這一點兒慷慨來換取國民政府對於條約的尊重。帝國主義者這種「慷慨」「讓步」的表示對於上層中國人很容易取得好感，容易使他們脫離民族革命而走上民族改良的道路。

從三二一
到四一二

上海工人響應北伐軍的起義共有三次。第一二次因時機還沒有成熟，宣傳組織的功夫又做得不夠，所以沒有成功。到十六年（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一日舉行第三次起義，便獲得全勝。這次起義的前夜，北伐軍已經到達松江和常州；起義的工人和各界聯絡，組織了革命市政府的雛形機構；又組成了五千人的工人糾察隊，作為軍事行動的中堅。二十一日上海總工會宣布總同盟罷工後，迅速由罷工轉到軍事行動，進攻各區警署，奪取武器，和直魯聯軍巷戰。經過

兩天戰鬥，把敵人完全擊潰；北伐軍也由上海南郊開到，把敗兵解決。

工人起義勝利後，共產黨發動舉行上海市民代表會，建立了上海市民政府。但資產分子不願意參加這個由武裝工人護衛的政權，而忙於尋找能代表他們自己的武力來解除工人的武裝。當時北伐軍領袖雖然站在資產者方面，但有幾師人對革命有好感，可是工人方面沒有預先警覺資產者方面的密謀，沒有爭取這一部分北伐軍的援助。於是四月十一日晚，就有被人家收買的大批流氓僞裝工人，向工人糾察隊襲擊。糾察隊正在倉卒起而抵抗，軍事當局就藉口工人內爭，派隊伍彈壓，趁勢用高壓手段將工人糾察隊繳械。十二日，工人羣衆到司令部去請願，軍隊用機關槍掃射，工人及一般行人死傷滿街，屍首達七八卡車之多。從這一天起，東南各省的國民黨就開始清黨，將共產黨員以及國民黨左翼分子大批的殺戮或監禁。上層資產分子和工農的革命聯合戰線從此破裂了。上層資產分子從此退出了革命，而與帝國主義及封建勢力謀妥協了。

革命高潮和緊張局勢

當「四一二」政變時，華中各省正在革命高潮洶湧之中，武漢的國民政府對革命還是積極。先是國民黨中央黨部於三月七日舉行二屆執委的三中全會於武漢，決定提高黨權，使軍事動員等事的決定成爲民主的。四一二事變後，武漢中央又決定以唐生智爲總司令。這樣，武漢與南京便形成

了對立的形勢。四月十八日，南京方面的中央黨部與國民政府產生，於是武漢與南京正式分裂。

武漢國民政府的左傾是由於兩湖革命空氣的濃厚，而造成這種局勢的因素就是蓬蓬勃勃的工農運動，特別是農民運動。在十六年春季，兩湖農民協會擁有會員五百萬。湖南農民的自發鬥爭已由減租減息進到「插標」重分土地的步驟。若干鄉村政權差不多完全由農協掌握。他們將團防武裝拿過來組成農民自衛軍，維持鄉村秩序。他們解決民間爭訟；厲行禁吸鴉片，修築道路等事。對過去作威作福的土豪劣紳則強迫着戴高帽子遊鄉去羞辱他們。當時國民黨左派甚至共產黨所倡導的還是農民與地主合作的民主政權，但有些鄉村農民的行動則已超過這個限度。不過縣以上的政權就是道地的各階層聯合，其形式是由政府、國共兩黨的縣黨部、以及各民衆團體的代表定期舉行聯席會議，解決一切重要問題。

這樣，當時武漢的局面便是工農與中小資產者聯合掌握政權。對於這個聯合政權，帝國主義、大資產階級、軍閥、豪紳、大地主，都極端憎恨，所以他們拚命地攻擊，而且陰謀破壞。帝國主義在長江實行經濟封鎖，一部分資產分子關廠關店，使工人失業，生產品減少，商品不流通，貿易蕭條，幣值低落，物價高漲，日用品供不應求。各種反

革命分子散佈謠言，中傷革命，甚至紛紛傳說漢口有婦女裸體游行的大會。

革命是更發展更深入而到了土地革命的階段了，但環境卻非常之險惡。軍隊的革命情緒雖高，但軍官多半是動搖的，有一部分上層軍官反革命傾向很強。國民黨與政府的領袖人物在帝國主義與大資產者威迫之下，又看到農民自發行動的激進，也動搖、彷徨，而感到「夾攻中奮鬥」的苦悶。這時候，站在工農前衞地位的共產黨也亂了步驟，沒有堅定明確的主張，專看國民黨上層分子的風色。雖然他們也參加了國民政府，但不能勇敢地提出武裝工農、組織新軍、發展土地革命、實行經濟統制、鎮壓反革命的政策，只是消極地阻止農民的「過火」行動，甚至自動繳出工人糾察隊的一點點武裝，以避免激進的嫌疑。結果，由於最前進者的不堅決，作為友軍的國民黨左派也動搖畏縮，而反革命分子便乘機步步進攻。

由馬夜事變到國共分裂

當寧漢兩個國民政府對立的開始，北洋軍閥奉（張作霖）直（孫傳芳）魯（張宗昌）各系聯合反攻。五月初，南京武漢同時各自出兵北伐。武漢方面的計劃是打到鄭州，把隔在陝西的馮玉祥的國民軍接出到中原來。正當前線勝利的時候，後方就發生反革命的亂子。首先是五月十七日夏斗寅師的叛變，聯合劉佐龍部及川軍楊森部進攻武漢。結果被葉挺等部隊擊退。接着五月二十

一日又有何鍵部下許克祥團在長沙的屠殺工農。這就是所謂「馬夜事變」。在廿一日深夜，負長沙街市警備任務的許部忽然進攻市內的全省總工會及全省農民協會，將會內守衛的少數工人糾察隊及農民自衛軍繳械，次晨包圍國民黨省黨部，繼續擴大對國民黨左派、共產黨及工農會羣衆的大批殺害。數日後，有十餘萬農民自衛軍自長沙周圍各縣出發，聲稱反攻長沙，但共產黨上層分子因希望武漢中央政府的法律解決，阻止了農民的前進。長沙的白色恐怖繼續高漲並向各縣展開。

但武漢中央並沒有制裁長沙的叛徒，而共產黨中央也採取退讓容忍的政策，於是許多可左可右的軍隊都動搖起來，而反動方面則氣燄越來越高了。五月二十九日唐生智的通電，指摘「湘省黨務爲跨黨暴徒及本黨不良分子操縱」，無異於替許克祥發宣言。接着，汪精衛領導的武漢政治會議議決解除蘇聯人鮑羅庭的顧問合同（六月五日）。國民黨要人在鄭州會議，決定由唐生智回師武漢，鎮壓工農革命運動，河南軍事交西北國民軍負責（六月十日）。唐部回師後，三十五軍軍長何鍵發出反共訓令（六月廿九日），捕殺共黨分子。到七月十五日，武漢政府便正式決定與共產黨分裂，封閉工農組織，捕殺共產黨員及國民黨內外一般革命分子。

武漢政變後，漢口工人一度罷工抗議，鄂南與湘東的農民也有短期的武裝騷動。八

月一日，賀龍及葉挺部隊兩萬餘人在南昌舉起反抗武漢政府的旗幟，成立革命委員會，以宋慶齡鄧演達周恩來譚平山等二十五人爲委員。他們沒有向政治中心的武漢進攻，爭取若干可左可右的軍隊，也沒有向農民運動中心的湖南進展，發動羣衆，擴大武力及政治影響，而採取避重就輕的路線，經贛東閩西進入潮汕。他們經過這些沒有羣衆基礎的地方，得不到老百姓的幫助，成爲疲乏的軍隊，因此，還沒有在潮汕站住脚，就被廣東軍打敗了。殘餘的隊伍一部分到海陸豐和農軍會合。一部分由朱德帶領轉移北江，後來轉入湘贛，成爲紅軍的基礎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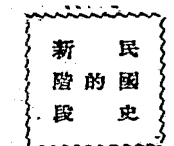
共產黨反攻的失敗

中共被汪精衞派排除後，就宣布退出國民政府，並痛斥反革命派。他們自覺領導者退讓政策的錯誤，舉行了有名的「八七會議」，檢討陳獨秀機會主義的過失，重整陣容，佈置反攻。葉賀南征失敗後，左派國民黨覺得中共已不能有所作爲，醞釀第三黨的組織，而中共也認爲與左派國民黨聯合的時期已經過去，只有單獨的負起領導責任來。在九月間，中共號召了所謂兩湖秋收暴動。在十一月，他們在廣東海陸豐建立了第一個工農蘇維埃政權。在十二月十一日，又由張發奎部下的共黨軍人與廣州工人聯合起事，建立了廣州蘇維埃。

廣州的赤色統治只存在了三天，就被廣州河南及東西江各路國民黨軍包圍消滅，總指揮張太雷戰死，工人被殺五千七百多人。當時中共還不知道化整爲零，退守農村山地，所以犧牲頗大。這個短期政權有點兒像一八七一年法國的巴黎公社，所以中共稱之爲廣州公社。

這次失敗後，中共放棄了建立大城市政權的企圖。他們承認革命已由高潮轉入低潮，而認爲「廣州起義是退兵時的一戰」。

武漢反共後，國民黨各派的政治路線已趨於一致。原來除南京武漢兩個中央外，上海還有一個西山會議派的中央，到這時候，便同意合併，而反共先進與反共後進濟濟一堂了。自然，寧漢兩國民政府這時也合併爲一個。



國民黨宣布清黨以後，不止是把共產黨分子排除到黨外去，而且連黨外也不許有共產黨及其他黨派的存在，他們有兩句話：「黨外無黨，黨內無派」。因此不但共產黨轉入地下，就是鄧演達譚平山的第三黨也是祕密存在的。國民黨本身的中下級黨部也完全給破壞了，經過多年的改造，才形成了一種官吏兼偵探作用的新型組織。民衆團體經這次事變後，大致是連名義都至今沒有恢復，如農民協會，全國總工會，全國學聯會之

類，連官廳式的都沒有產生過。

清黨以後，國民黨的對外政策也走向新的道路。十七年二月宣布對蘇聯絕交，同時準備改善對英美日的關係。

國民黨改組以來所奉行的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三大政策，至此全部取消了。

在對外政策變更之後，國民政府第二期的北伐軍，不敢和佔領濟南屠殺軍民外交官的日本侵略軍對抗，轉道進入北平。東三省的軍事領袖張學良（這時張作霖已經被日本人炸死，學良承繼父業）自動地歸服國民政府，懸掛青天白日旗。於是南北重歸統一。這是民國十七年的事。

這不能不說是開闢了民國史的一個新階段。這個新階段的特點，是結束了北洋軍閥統治的局面，同時把軍閥弄得髒臭不堪的「約法」「國會」傳統一刀兩斷了，另方面人民還沒有獲得統治權，卻開始了一種新的統治形式，即國民黨的「黨治」。在黨治下，沒有由人民選舉的國會，而由黨部產生政府並指導它。國民黨並在民國二十年制定訓政時期約法，在法律上給予這種統治形式一種明文的規定。

國共兩黨的戰爭

國共分家以後，國民黨表面統一了中國，實際上中國還是四分五裂，內戰連續不斷，不過不是從前那樣的軍閥混戰，而是國共兩黨的相互廝殺

及國民黨內部的軍事衝突這兩種內戰。這是革命戰線分裂後必然演成的後果。

且說共黨的武裝反抗經屢次失敗後，就決定到廣大農村中去組織武力來推翻國民黨的獨裁政權。他們認為資產階級既已退出革命而與反革命方面合作，那末中國革命的担負者就只有工人農民和下層小資產分子了，這就是使革命走向蘇維埃階段或土地革命的階段，而這個蘇維埃則和俄國的蘇維埃不同，它不是產業工人與貧農的專政，而是工農民主專政，這裏面包括了手工業工人與小有產者。他們又根據中國經濟發展不平衡及土地廣大交通不便諸條件，認為新的革命高潮可能從農村中開始。又認為在反革命軍事獨裁之下，沒有議會，沒有言論集會自由，合法運動的可能性很狹小，因此建立革命武裝是必要的。根據這種理論，毛澤東就將秋收暴動後所有的一點微弱的武裝轉移到贛西的井岡山一帶，開始建立根據地。後來朱德部來會合，便有所謂朱毛紅軍的產生。他們以土地革命為號召，發動贛西贛南湘東幾十縣農民，驅逐國民黨的官吏，建立蘇維埃政府，擴大紅軍，聲勢不小。到十九年七月，彭德懷部紅軍竟一度攻入長沙。同時皖鄂豫境及陝西北部等地也發生同樣組織。

南京政府對於這些共黨領導的農民軍曾動員數十萬軍隊長期圍勦，雖然到了強寇日本帝國主義發動瀋陽事變以後，全國要求抗日，但南京仍集中力量勦共，不談抗日。可

是圍剿七八年之久，沒有顯著成效。後來根據曾國藩李鴻章的軍事經驗及德國軍事顧問的意見，採行新戰略，卽一面施行經濟封鎖，一面建築碉堡，逐漸縮小包圍圈，江西蘇區才有些削弱徵象。但國民黨還是不能迅速解決他們，而日本武力深入國土，一般國人希望內爭早息，全力對外。朱毛紅軍也曾向南京提議雙方停戰，共同抗日，南京方面置之不理。他們便於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六日晚上，把紅軍主力從江西向西轉移，經湘、粵、桂及黔、滇、川、康、靑諸省二萬五千里的長征，與陝北紅軍會合，建立陝甘寧邊區政權，一面號召「停止內戰」與「組織全國抗日聯軍」（中共在二十四年發表八一宣言）。共軍於二十五年二月，又宣稱為實現抗日，由陝北渡黃河東征。南京派大軍三十萬入山西堵截。五月，共軍撤回黃河西岸，要求停戰議和，保存雙方實力，一致抗日。八月，中共及共軍先後致書國民黨及其前線將領，作同樣的呼籲。十二月一日，毛澤東朱德又致書蔣委員長，表示這一意見。南京中央雖然通通置之不理，前線將領及若干國民黨分子頗表贊同，因為自從二十四年日軍侵入華北以後，全國人心震動，救亡呼聲很高，民氣激昂，不容漠視。到廿五年十二月終於發生了西安事變。

當時在陝西剿共的張學良楊虎城兩部軍隊首先贊同槍口對外的原則，於是在十二月十二日乘蔣委員長巡視到陝的機會實行兵諫，將他留在西

安，要求承認八項主張。這八項就是：(一)改組國民政府，容納各黨各派，共同負責救國；(二)停止一切內戰；(三)立即釋放被捕之愛國領袖；(四)釋放一切政治犯；(五)開放民族愛國運動；(六)保障人民集會結社等一切政治自由；(七)確實遵行總理遺囑；(八)立即召開救國會議。二十四日，蔣委員長接受抗日條件，二十五日恢復自由，由張學良陪同飛返南京。這次事變發生，南京的親日派企圖擴大內戰，轟炸西安，並叫親日頭子汪精衛從德國趕回，以便造成降日賣國的局面。但幸而事件的發展沒有如親日派的想法，從此倒反開創了國共合作，全國團結抗日的新局面。眞可說是大幸事！

國民黨內部的兵爭

國府定都南京以後，國民黨內部也有幾次軍事行動。在九一八以前，有十六年西征軍討伐唐生智之役，十八年西征桂系之役，十九年對付汪精衛改組國民黨運動的中原大戰。九一八以後，每次內戰都是爲了對日和戰問題而起。廿二年十一月二十日，李濟琛陳銘樞等在福建組織人民政府，以抗日及計口授田爲號召，武力基礎就是廿一年一月在上海抗戰的十九路軍。廿三年一月，中央軍入福建，消滅了抗日人民政府。廿五年兩廣當局發動所謂六一運動，標榜抗日救國。六月四日，西南將領發電響應，要求中央允許出兵。八日，進兵湖南。當時南京宣稱「決不可顧慮外患之壓迫，就聽少數人破壞紀律，自由行動」，將用武力對付兩

議。但因全國輿論一致反對，兩廣事件終於和平解決。在談判中，南京當局也發出了抗日的諾言。

不能忘的教訓

自從國民黨改組到北伐初期，上層資產分子是向左聯合工農小市民的。到了後來，便拆開左邊的聯合戰線，而向右聯合買辦紳士官僚大地主等舊統治階層。反映到政黨關係上，便由國共合作而變成國共分家。當中國民主革命正在順利進展的時候，革命陣線有這樣的分裂，實在是很不幸的。敵友最要分明；對於革命的朋友有不滿意之處，儘可以坦白陳述，互相批評督促，求得一致的認識和相互的諒解，卻不應放過敵人，自相殘殺，以致「為親者所痛，為仇者所快」。假使代表上層分子的政黨，寬宏大度，與其他黨派和衷共濟，那末豈但千百萬同胞的生命財產不會犧牲於長期內戰與政治屠殺，而反帝國主義與反封建勢力的民主革命也可以提早成功。假使代表下層羣衆的政黨用堅決明確的態度爭取可左可右的分子，上層分子也不會全部離開革命陣營，內戰即使不可避免，也將縮小範圍和縮短時間，不會犧牲太大。在那種場合下，日本帝國主義決不敢輕易發動武力的侵略；即使發動，我們也會立即抵抗，決不至於不戰而丟掉整個東北。這種歷史的教訓是我們永不能忘的。

第十講　內戰中的外患

從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年）國民政府統一南北到二十六年對日全面抗戰，恰好十年光景。這十年當中的主要史事，除內戰外，就是日本對華發動武力的侵略。

日本武力侵華的先聲

日本帝國主義的發展必然要向亞洲大陸擴張地盤，尤其要獨佔中國。還在十六年的時候，日本內閣總理田中義一就上奏天皇，說明大陸政策道：「如果想征服中國，必須征服滿蒙；如果想征服世界，必須先征服中國。倘若中國完全可被我國征服，其他如小中亞細亞及印度等異服之民族，必定畏我敬我而降服於我，使世界知東亞是我國的東亞，永不敢向我侵犯，此乃明治大帝之遺策，也是我日本帝國存在上必要的事。」這一年，日本曾派兵到我國的山東省，預防國民革命軍的北上。十七年四月，北伐軍果然到了山東，奉魯軍的殘餘不能支持，日軍於是二次出發山東，分布濟南及膠濟鐵路一帶。五月三日，正值北伐軍初到濟南，日軍就開槍打死北伐軍兵士，故意引起衝突，隨卽用大砲轟擊濟南城，我軍民死傷萬多人，戰地委員會交涉員蔡公時被日軍割

去耳朵鼻子，再加慘殺。日軍當局反而向北伐軍當局提條件，要求懲兇、道歉、將華軍撤離濟南和膠濟路以外。當時北伐陣營中已經是國共分家，氣勢不壯，當局不敢用頑強態度對付日本，只是嚴令軍人不得抵抗，並且將軍隊撤退，繞道北上。日軍居然佔領山東一年多之久。這次屠殺可說是第一次的威迫。

九一八事變的背景

日本用武力打擊北伐軍的用意，是表示它爲華北的主人翁，不能容許有什麼新的勢力鑽到華北去，以致妨害日本帝國主義的獨佔的計劃。假使北伐軍完全尊重日本的意旨，它當然也能容許；可是，北伐軍不過對日避免武裝衝突吧了，根本政策是要對英美日各方開放門戶，不會完全依從日本意旨的。這使得日本很不放心。甚至就是日本向來安心支配着的奉軍，到後來也被認爲不可靠了，因爲日本在滿洲的投資雖然早已佔全部外資百分之七十三，但是還有給其他外資以及中國資本自由發展的餘地，所謂與南滿路競爭的並行鐵路線，就是張氏父子任內的成績。張作霖在皇姑屯遭遇火車被炸的慘劇，就是日本人對他的懲罰。在東三省歸服國民政府以後，別國勢力侵入的威脅尤其顯著。因此日本軍閥用自己武力直接支配東三省和華北的決意便形成了。

就日本帝國主義的特性看，它的資本本來不雄厚，經濟資源如煤鐵石油以及羊毛棉

花等都非常貧乏，它要想和英美在世界市場上和平的角逐，是不可能的，它祇有用武力侵略來補充它的缺陷，就是直接掠奪經濟資源而獨佔起來，遮斷外來資本向它的勢力圈內的投放，才能夠繼續發展它的資本主義經濟。所以日本人常說：「滿蒙是日本帝國的生命線」，並不是虛言。因爲我國東三省和內蒙古是「天府之國」，農產鑛產都極豐富，如煤、鐵、金、石油、大豆、羊毛、等等，是大家都知道的。

日本這種武力侵佔計劃遲早當然要實現，祇不過在北伐軍勢力伸到北方的時候就比較迫切了，尤其在一九二九年(民十八年)世界經濟大恐慌以後，日本資本主義經濟受到了波及，更感到世界經濟的劇烈競爭，有一天會使日本得不到美國的石油、南洋的橡皮、澳洲的羊毛、印度的棉花……等等，除非早一點獨佔滿蒙以及中國本部，將來會只有死路一條。

日本在經濟上既然有武力進佔中國的需要，同時在政治上又抓到了幾個便利的條件。因爲在民國二十年的時候，英美的態度已不一致，英國對華態度剛剛好轉，還不能對中國提供什麽積極的援助。蘇聯和中國還沒有恢復邦交，並且在一九二九年，因爲日本挑撥，爲中東路事發生過局部戰爭，更談不上援助。中國國內連年內戰，除江西等地圍共的長期戰爭外，還有十八年國府的西征，十九年中央與西北各軍的中原大會戰等，

都指示着武力正集中消耗於對內，沒有餘力去抵禦外患。認明了這幾點，日本軍閥便決定在民國二十年發動對華的武力侵略，而選擇的地點便是它素來佈置了軍隊警察和浪人的地方，即東三省的首都瀋陽及其周圍的城市。

九一八事變的經過

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一年）日本的武力侵略中國，發生於九月十八日，一般人稱為九一八事變。

事變以前的形勢是這樣的：日本開入滿洲的軍隊已經有二萬餘人，在鄉軍人七千餘人，警察也有五六千人。原來日本憑借不平等條約，老早就在南滿洲取得了駐兵權，這時候却又把兵力擴大了。這是軍事的佈置。

再說挑衅的口實。日本人在事前製造了萬寶山事件與中村事件。萬寶山事件是二十年七月發生的，日本駐長春的領事鼓動長春萬寶山的韓國農民強掘中國農民的田地，引伊通河水築壩修堤，故意激怒中國農民，和日本警察發生衝突，日本領事派大批軍警壓迫中國農民，反而說中國壓迫韓國農民，反而煽動朝鮮各地的排華風潮，慘殺華商多人，搗毀許多商店住宅。日本人這次舉動，一方面是製造反對中國的口實，一方面是挑撥中韓民族的惡感，就是預防中韓兩個民族聯合起來反抗它的侵略。這是萬寶山事件的意義。中村事件呢？日本派了中村震太郎到內蒙偵探中國軍情，在八月間日本人說他失

蹤了，是與安嶺的中國屯墾軍故意將他殺害，借此爲由，鼓動國內的反華論調，主張用武力來「膺懲」中國。這當然是直接的挑釁。對於這種挑釁舉動，中國當局不敢用嚴正的態度對付，只是百般忍耐遷就，希望和平解決；可是日本方面有意爲難，無論怎樣遷就，還是爆發了九一八事變。

事變的進行是這樣的：

九月十八日夜晚，日本軍暗中將南滿路的柳河鐵橋炸斷，開炮轟擊瀋陽的北大營，佔領兵工廠和各機關。我東北邊防軍奉中央命避免衝突，所以不曾抵抗，便撤退了。同時另一部分日軍襲擊長春，進逼吉林，吉林省代主席熙洽繳械投降。十一月，日軍進攻黑龍江，佔齊齊哈爾。次年一月，日本派熙洽進佔哈爾濱。於是整個東三省落到日人手中。許多不願降服的軍隊和民衆，聯合組成抗日義勇軍，在馬占山蘇炳文李杜等領導之下，實行抗戰，但是因爲政府不給予接濟，到了彈盡援絕的時候，就不能繼續了（後來有善於運用游擊戰術的抗日軍繼承他們的任務，一直奮鬥到日本戰敗的時候）。總而言之，九一八事變，日本以少量代價獲得東三省的廣大土地，實在太便宜了它。

日本侵略的反響

當時我國政府的對策呢？因爲對內還是在進行勦共軍事，所以對於日本帝國主義，堅持和平政策，決不抵抗。當局認爲「信賴國聯（國際聯盟）

乃吾人唯一之義務」，只是請求國際聯盟出來干涉。從理論上看，國際聯盟是各國組織的聯合會，以維持和平為宗旨，約章上是禁止會員國用武力相侵的，如有違約者，大家得共同給他一個制裁，中國日本都是會員國，日本違約進兵，國聯自應制裁它。但是國聯本身並沒有實力，實權還是操在英法二國手裏（當時美蘇都在國聯之外）。英法沒有制裁日本的必要，國聯便只能空口說白話調解一番，至多再對日本武力侵略的行為加以譴責，不給以合法的承認，如此而已。

我們看看國聯干涉的經過吧。在二十年九十兩月間，國聯兩次議決叫日本撤兵，日本不理。中國代表在國聯會上提議，設錦州（在遼寧省附近山海關的地方）中立區以為緩衝，中國軍隊可以全部撤出東三省，只要日本不再進兵，但日軍在十二月二十六日攻佔了錦州。十二月九日，國聯會組織了一個滿案調查團，由英美法意德五國代表參加，英人李頓爵士率領東來，次年春天到達中國，至下半年才發表報告書，那報告書雖然尊重中國對於東三省的主權，但也承認日本出兵有其歷史的根據，不過反對日本獨佔，而主張東三省自治，由各國派遣顧問共同參加治理。國聯這種共管的主張，實際上是漠視我國的領土主權的完整；但我國當局還是拚命恭維。可是日本呢，就看待報告書如同廢紙，毫不理睬。二十一年年底，日軍繼續進攻榆關熱河。二十二年二月二十四日，國聯

大會再行調解，日本不接受，並且宣告退出國聯，把名義上的約束都解脫了。以後國聯再也不調解，也不提滿洲自治，僅僅決議不承認日本侵佔滿洲的事實（卽不承認「滿洲國」）罷了。

現在再說美國和蘇聯對於日本侵華的反響。美國在民國二十一年由國務卿史汀生表示不承認武力造成的結果，並且重新聲明門戶開放政策。那時候，美國邀請英國共同表示，英國不肯。後來美國又主張由九國公約簽字國向日本發一個宣言，又因為英國不肯一致行動，沒有弄得成。美國雖然好像比英國積極一點，但是它對日本，不但不用武力制裁，而且連經濟制裁都不幹，還是照常銷日本貨，供給汽油等物給日本。至於蘇聯，眼見得日本破壞遠東和平，威脅其本身的安全，未必不想和中國共同抵抗，但因為中國不願意和它合作（雖然因為迫於民意，於二十一年底和它復交），它也不便「越俎代庖」地幹起來。其實中蘇如果老早訂立了防日的軍事互助條約，日本根本不敢發動瀋陽事變。

一二八戰爭與上海協定

日本的武力侵略既然進行得十分順利，它便一步一步地擴大，一層一層地推進起來。緊接着九一八事變以後，它在上海發動了一二八戰爭。

當時全國民衆反日運動高漲，上海尤其發展得快，罷工罷課示威的行動不斷發生。日本帝國主義為了鎮壓中國人民的反日運動，破壞經濟及文

化中心的上海，以減少抗日力量，以及轉移國際上對滿洲事變的注意起見，便決定了一二八戰爭的發動。

廿一年一月二十日，上海日本浪人放火焚毀我國的三友實業社工廠，被我軍警打傷一個。二十四日，日本特務機關放火焚燒日公使重光葵的公館，作爲進攻上海的藉口。二十七日，日領事向上海市長提出最後通牒，要求取消抗日團體，封閉民國日報，禁止反日言論，限四十八小時答覆。國府訓令上海市長完全接受。但日方海空軍源源開到上海，又指斥我駐上海的十九路軍延不撤退。二十八日下午四時，南京電令十九路軍退出眞茹南翔閘北等地，防務交憲兵接替。晚上十時，日本海軍陸戰隊突然向江灣、吳淞、北火車站等地進攻，十九路軍來不及撤退，奮起抵抗。戰爭就開始了。

當時全國人民和將士，抗日情緒都很高。各省將士紛紛請求抗戰，國民政府不許。只是遷都洛陽，逃避威脅。日本兵艦開砲轟擊吳淞等地，中國海軍奉令不准還擊。十九路軍在上海英勇抗戰，國府不派援兵，不給接濟，反而扣留國內外人民援助十九路軍的捐款。十九路軍孤軍抗戰，在日寇海陸空圍攻之下，打了三十三晝夜，連戰連勝，最後因爲另一部日軍從瀏河上岸，襲擊後方，我方兵力不夠應付，不得不自動撤退。

這次抗戰雖然失敗，但是提高了軍民抗戰的勇氣，打擊了不抵抗主義，意義非常之

大。日本方面知道國民政府不敢抵抗，就威迫它承認屈辱的條件。五月，中日訂立上海停戰協定，中國不在上海駐紮軍隊，但日軍可以駐紮。

在上海戰爭的同時，日帝國主義就進行着僞滿政權的建立。三月九日，僞「滿洲國」宣告成立，以前清被廢除的皇帝溥儀做執政（兩年之後改稱皇帝）。僞滿的土地除東三省外，日人還把熱河劃了進去。二十二年元旦，日軍攻佔山海關；三月，進佔熱河，我守軍湯玉麟部不戰而逃。我

長城抗戰及塘沽協定

軍商震、宋哲元、王以哲、孫殿英、關麟徵等部隊在喜峯口、古北口、冷口等處抗戰勝利，但因指揮不統一，戰略又沒有主動的攻勢，終於被日軍各個擊破。四月，日軍進佔灤東，何應欽令守軍自動撤退。五月三十日，中日代表在塘沽簽訂停戰協定，我方承認將冀東（河北東部）二十二縣劃爲非武裝區域，中國軍隊完全退出。實際上這個協定使中國丟掉四省的領土，而日人得在綏東、察北、冀東等區域自由進出。

在塘沽協定簽定的前四天，馮玉祥、吉鴻昌、方振武所組織的抗日同盟軍在張家口成立。同盟軍連戰連捷，於七月間收復多倫。八月，蔣委員長派中央軍十三師進勦抗日同盟軍，同盟軍在前後方夾攻之下失敗了。

廿三年四月十七日，日本外務省情報部長天羽發表聲明，說中國的事應該完全歸日

本支配，歐美列強無權過問。這是日帝國主義想獨佔整個中國的表示。五月十四日中日代表在榆關開會，議決華北與偽滿於六月一日通車。這是南京實際承認「滿洲國」的表示。此後，日本一面用威迫利誘，策動華北的分離，一面以「中日親善」「中日經濟提攜」的口號向南京詐索全國範圍的控制權。

何梅協定與「華北自治」

廿四年一月，日軍及偽軍進攻察哈爾東部。二月，中日雙方在大灘會議，約定察東各地，中國不得駐兵，劃為非武裝區。五月二十九日，駐華北的日軍武官藉口東北義勇軍孫永勤部攻入冀東，向北平軍委分會提出苛刻要求。六月四日，駐天津的日軍司令梅津與北平軍分會主任何應欽談判，祕密簽訂「何梅協定」。中國在冀察兩省的主權因此大部分喪失。政府依照這個協定，把中央軍調離河北，把東北軍調到陝西剿共，並且調換冀察兩省的主席，取消國民黨黨部及軍分會政訓處，還下令禁止人民抗日的言論行動。接着日關東軍代表土肥原又藉口張北中國軍隊拘留日本特務人員，逼迫政府撤換察哈爾主席宋哲元。十月，日本特務在冀東香河縣指使漢奸地痞暴動，佔駐了縣城，並且公開宣傳「華北自治」運動，一面叫漢奸們用「華北民衆自治促進會」名義大吹大擂，說要促進中日提攜，勵行冀魯晉察綏五省自治，一面由日本軍事訪問團訪問濟南和與晉

會當局接洽，宣稱華北人民要求經濟獨立，「任何中國人倘若想以武力防範自治運動，必將觸犯關東軍的兵力」。

五省防共自治的戲終於未能演出，導演土肥原賢二郎心生一計，嗾使冀東的行政專員漢奸殷汝耕於十一月廿四日宣布獨立，成立了「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把冀東二十多縣置於這個傀儡組織之下，包括香河在內，北平是在它的包圍之中。這時全國民意沸騰，國民政府乃下令通緝殷汝耕；但日本武官聲稱任何有礙「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的軍事行動，均將違反「塘沽休戰協定」，於是殷逆就逍遙法外了。日本既已策動了香河事變及冀東獨立，進一步便威脅宋哲元步殷汝耕的後塵。宋氏打電到南京請示；中央承認冀察兩省半獨立，於十二月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除以廿九軍軍長宋哲元爲委員長外，委員中還容納了王揖唐、王克敏等親日分子，這等於一個半傀儡或準傀儡。日帝國主義利用這個半傀儡，進行華北富源和交通的開發，並且公開走私漏稅輸入大批的日貨。據說還和冀察政府訂立了共同防共的祕密協定。內蒙方面，自日僞軍進犯察東和察北後，便陰謀利用蒙古王公，製造傀儡國，結果成立了所謂「蒙古自治軍政府」的僞組織，以漢奸德王爲首腦，並且勾結土匪，進擾綏遠。二十五年十一月，傅作義在綏遠抗戰，於紅格爾圖大敗僞軍匪軍，收復了百靈廟，敵人西進的氣勢因此受了挫折。

當土肥原策動華北分離的時候，全國人民怒吼抗戰，國民黨五全大會正開會於南京，蔣委員長報告對外關係，稱「和平未到絕望時期，絕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絕不輕言犧牲」。因此除成立冀察半傀儡組織外，又在原則上接受了中日全面提攜的直接談判。

中日南京談判

遠在廿四年初頭，日本外相廣田就提出了「中日親善」「經濟提攜」的口號。中國當局認他的話「亦具誠意」，並說「吾國朝野」應「制裁一時衝動及反日行爲，以示信誼」。接着就下令「取締排日」。六月間，又下「敦睦友邦」令，凡以文字圖畫或演說爲反日宣傳者，處以妨害邦交罪。十月，中日雙方交換經濟考察團，並商討成立中日貿易協會。其實日本所謂「經濟提攜」，以「農業的中國，工業的日本」爲原則，而且指在華北所推行的是經濟提攜的模範（天津中國人的紗廠就在這時期被迫關門頂給日人），這明明是叫我國做它的十足殖民地，專門替它生產原料，不容我們有獨立性的國民經濟。

廿五年一月，日本外相廣田又提出（一）承認「滿洲國」，中日「滿」經濟合作；（二）根絕排日運動，斷絕歐美援助；及（三）中日「滿」共同防共的三原則，向我政府交涉。其中共同防共一點，就是要中國允許日本在各省駐兵，以便幫中國打共產黨或者防蘇，是一種變相的武裝佔領。當時南京外交界表示，我方對三原則雖未接受，但亦不拒絕。後

來又宣傳勦共已具成效，稍加時日，便可完全消滅，希望日方諒解。實則廿五六年間，日本不待南京的承認，已在華北陸續增加大批軍隊。就歐美援助而言，實際有效的援助本來很少，僅英人李滋羅斯給南京定了法幣政策，頗有裨益。二十四年十一月四日宣布白銀國有，以中中交農四行鈔票爲法幣及禁用現金以後，日本曾指使漢奸在天津一帶宣言反對。

二十五年二月，中國駐日領事奉令向日本提議，在南京召開中日談判會議，促進中日提攜。三月，日本派有田大使到南京，與中國外交部長張羣連開談判，雙方見解未能全部一致。八九月間，成都民衆反對日本在成都設領事，打死了兩個日本人；廣東北海市民反日聲中，因日本商人中野惹起衝突，打死了中野；漢口也有日本警察吉岡被打死的事。日方藉口這些小事情，威迫南京承認三原則。九月間，川越茂代替有田做日本大使，到南京和張羣繼續談判，除堅持三原則外，又提出四項要求。因日方條件苛刻，由九月到十月，幾次談判，沒有結果。

不抵抗政策的堅持與放棄

自從國府實行對日不抵抗政策以來，各界人士多數反對，就是國民黨元老也多數不表贊同。如二十一年三月，駐滬一部分國民黨中委爲十九路軍抗戰失敗致電蔣汪，批評妥協政策。同年九月，馮玉祥李烈鈞柏文蔚等

十五人聯名通電，要求放棄不抵抗主義及依賴國聯之謬想，動員抗日，收復失地。二十三年四月，宋慶齡馬湘伯何香凝李杜等公布「中華人民對日作戰基本綱領」，號召「成立工農兵學商代表選出的中華民族武裝自衛委員會」。所以人民請願示威，軍隊局部抗戰，此起彼伏，不斷興起。南京當局於一二八戰爭爆發後，雖然邀集各方人士，舉行國難會議於洛陽，但實際由不抵抗派把持，不採納全國民意，而通過了「對日交涉」「全力勦共」的方針。此後不抵抗派便一面宣傳不抵抗的理論，一面鎮壓抗日的言論與行動。在理論上，有汪精衛的「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之說（二十一年二月在徐州講演）——其實所謂抵抗是十九路軍自動的行為，與國府無關；——有他的「抗日必先勦共」說，將勦共和「諸葛武侯要出兵中原，必先平定南蠻」相比；有他的唯武器論，抗日必敗論；有蔣中正的「安內始能攘外」說，三日亡國論（二十三年七月在廬山軍官訓練團講「抵禦外侮與復興民族」，說日寇只要三天就可以把中國要害之區都佔領下來，滅亡我們中國，中國準備三十年還不能戰勝日本，如要抗日，只有等待時機，等待它和太平洋其他強國決戰的時候）；有丁文江的退到堪察加論（二十四年六月丁氏在大公報上發表「蘇俄外交史的一頁及其教訓」一文，曲解布勒斯特和約，主張：日寇要我華北，便連華中給它，退到雲貴去「復興」民族。其實當年蘇俄對德講和的用意，是使共產黨有可能取

得時間、利用帝國主義營壘中的衝突，瓦解敵人勢力，爲自己保留着農民，養精蓄銳來準備向高爾察克和鄧尼金等反革命軍進攻，那次和約是加強革命勢力而分散國際帝國主義的一種讓步，和中國的不抗日政策完全不同），胡適的準備五十年論，等等。至於鎮壓抗日運動的措施，則有如二十年十二月十七日，學生羣衆在南京請願時，軍警打死學生三四十人；二十四年六月七日，日領事因「新生」週刊刊載「閒話皇帝」一文，認爲侮辱日本天皇，提出嚴重抗議，南京訓令上海市府向日道歉，撤換上海公安局長，封閉新生週刊，判該刊主編杜重遠徒刑一年二月；二十四年十二月九日及十六日，北平學生抗議冀東漢奸政府成立，反對所謂防共自治，要求停止內戰，舉行示威，被宋哲元部軍警用水龍槍刀木棍襲擊，死傷無算；二十五年二月二十日，國府頒布「維持公安緊急治罪法」，規定軍警槍殺抗日羣衆、逮捕救國分子、解散救亡團體、封閉救亡言論機關爲合法行爲，次日，平津當局派大批密探赴各校逮捕學生運動領袖一百零九人，指爲共黨；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逮捕上海救國會領袖沈鈞儒鄒韜奮李公樸章乃器沙千里王造時史良等七人，在法院以「危害民國」罪起訴（七君子案）；這些事實是最顯著的。此外還有人用暗殺方式威脅人民領袖，如二十一年六月民權保障會副會長楊杏佛被刺，魯迅宋慶齡蔡元培等均接到暗殺警告；廿三年十一月申報負責人史量才被刺。此時全國

人民的處境，正如二十四年十一月清華等十校通電所云：「昔可以赤化爲口實，今復可以妨礙邦交爲罪名，而吾民則一舉一動，皆有犯罪之機會矣！北大學生組織反帝國主義座談會，清華學生組織現代座談會，此約法所許之權利，而政府則解散之，逮捕之。著作乃人民之自由，而北平一隅，民國二十三年焚燬書籍，竟達千餘種以上！」可是在朝黨爲了堅持一種與衆不同的路線，卻感到「政治上獨裁的要求，乃較之任何國家更爲迫切」（廿二年三月復興社成立宣言），所以有復興社或藍衣社之類的團體產生，以幫助執行鎭迫民衆的方針。

可是民族失敗主義的謬誤，在許多次局部抗戰的勝利中已經充分暴露。對內軍事不但無結束的希望，而且因對日政策問題，反而增加抗戰派（中共、兩廣等）軍事上的聲勢。加之日帝國主義刀鋒進入華北，黃河流域卽將淪陷，民氣激昂隨而增長。自北平一二九學生運動以後，救亡呼聲波及全國，黨政軍各界稍明大義的人，也都認識停止內爭一致對外的必要。到了這個時候，任何高壓與武斷宣傳都無法阻止抗戰的要求，所以不抵抗政策最後就不得不放棄了。

第十一講　中日大戰

這次中日大戰是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爆發的。開始爆發的地點是盧溝橋。所謂盧溝橋事變或七七事變，就是大戰的誘因，也可說是大戰的序幕。

七七事變以前的形勢

先把七七以前的形勢回顧一下吧。日帝國主義自從九一八發動瀋陽事變以後，它的侵略方式可分幾點說：（一）它用軟硬兼施的政策，軍事外交雙管齊下，想拿威嚇手段來屈服我們；（二）它的佔領是逐步推進，廿年佔領東三省，至廿二年才佔熱河，到廿四年才向華北開刀，每次佔得一處地方，必須以相當時期來作政治經濟各方面的布置，然後再佔別的地方，因為中國太大，一口氣吞下去它消化不了；（三）它的統治方式是「以華制華」，它恐怕露骨的直接統治太容易激怒民衆，不如經過中國傀儡，還可以欺騙，又減少許多麻煩；（四）它的統治方式又是以分裂中國成若干傀儡國為原則，如東四省為一國，察哈爾綏遠一隅之地又成立一國（內蒙），而「華北自治」的意義也是想造成一個華北國。日本恐怕中國的傀儡政權靠不住，中國偌大的地方，人民又多，

如果還是整個的統一物，將來或者傀儡弄到「尾大不掉」，或者人民叛變起來，斷然吃不消，所以只有分裂好；分裂以後日本要控制傀儡，傀儡要控制民衆，都比較容易。

日帝國主義既然要造成一個華北國，當然不能以半傀儡的「華北自治」爲滿足，所以它必須來一次新的軍事行動。於是它在廿五年製造兩次豐台衝突事件，藉此佔領北寧路據點豐台，廿六年又製造盧溝橋事件，想藉此又佔領平漢路據點盧溝橋，這樣來造成軍事上包圍平津的形勢，以便進而佔領平津。

抗戰局勢的展開

盧溝橋在北平西南二十餘里，屬河北省宛平縣，跨在永定河上面，有了八百餘年的歷史，素稱名勝之地，所謂盧溝曉月，至今還被人們稱道。平漢鐵路在它旁邊渡過永定河，使這兒成了交通要道，又是軍事上的據點，有翟衞北平的作用。

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軍隊在盧溝橋附近操演，藉口失落士兵一名，要到盧溝橋附近的宛平縣城去搜查。那時我方駐軍因深夜不肯開城門，日軍就包圍宛平。八日早晨，北平當局派人會同日方去調查，但日軍向我駐軍開砲，要我駐軍立即撤退，方可談判。我駐軍吉星文團過去參加過長城抗戰的，當時就堅決表示：「願與盧溝橋共存亡」，不肯撤退。中日戰爭的砲聲於是響了。但是那時戰事只在盧溝橋進

行，其餘各地，中日兩軍還沒有交手，南京也沒有下令動員，所以盧溝橋戰爭只算得中日大戰的序幕。

戰爭的序幕雖然已經揭開，中日和平之門還沒有關閉。日方原來想以恐嚇手段逼我二十九軍南下，不戰而取得平津，到了吉星文抗戰時，它便一面戰爭，一面交涉。當時冀察當局對抗日親日還動搖不定。他們與日方誠意談判，而日方還是提出無理條件來恫嚇，同時利用談判時間從東三省調兵增援。七月十七日，蔣委員長在盧山談話會（是召集全國名流學者到盧山聽報告）演說中，對盧溝橋事件和平談判，提出最低限度，大意是冀察行政組織不容有不合法之改變，——宋哲元不能撤換，二十九軍駐防地區不能受約束等。並且說如領土主權再受侵害，卽起而應戰。此時宋哲元便決意抗戰。日方到二十六日便向宋哲元提出最後通牒，限期撤退三十七師馮治安部（駐北平及盧溝橋一帶），並於同日佔領廊房。二十七日，宋哲元拒絕日方要求，下令動員。日軍卽日攻佔二十九軍所駐的南苑。宋哲元馮治安等次日晚間率部退守保定，北平陷落。二十九日，天津也陷落了。

平津失守以後，戰事向津浦、平漢、平綏三路展開。南京開始佈置軍事，迎頭堵截。日軍爲要牽制我南方兵力，又在上海挑起戰端。八月九日，日兵二人闖入上海虹橋

飛機場，與我守軍衝突，各有死傷。日軍就大調兵艦，我方也開了兩師精銳兵到上海。八月十三日，日軍向我軍開火，我軍沉着應戰。八月十四日，我外交部向全世界發表聲明，表示實行自衛以維護領土主權及國際條約的尊嚴。於是全面抗戰從此展開。

和平統一的實現

這次抗戰政策的決定是在二十六年二月。早在二十四年華北緊急的時候，民衆的抗戰要求就成了不可遏制的形勢。首先是一二九大請願及一二一六大示威，喊出「武裝保衛華北」「收復東北失地」「反對華北自治運動」「停止一切內戰」「要求言論集會結社出版自由」等口號，衝開了「救國有罪」「抗日犯法」的鐵網，打破了三四年來的沉悶空氣，開展了全國抗日救亡反內戰爭民主的運動，推動了舉國精誠團結共赴國難的新局面。一二九運動以後，上海就產生了各界救國會，國難教育社諸團體，後來救國會的組織普遍到全國，又成立全國的總組織，推沈鈞儒等爲委員。二十五年七月，沈鈞儒章乃器陶行知鄒韜奮發表「團結禦侮的幾個基本條件與最低要求」。同月，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中，蔣委員長解釋由和平轉向抗戰的「最後關頭」，是「領土和主權不能再有絲毫的喪失」。可是眞正要抗戰，必須先做到對內的和平統一。在全國人民團結禦侮的呼聲中，兩廣事變及西安事變都和平解決了。特別是西安事變以後，形勢轉變得快，十年對戰的國共兩軍都逐漸停火了。到

二十六年二月，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開會，中共向國民黨提出了五項要求和四項保證。五項要求是：(一)停止一切內戰，集中國力，一致對外；(二)開放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之自由，釋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黨各派各軍各界的代表會議，集中全國人才，共同救國；(四)迅速完成對日抗戰之一切準備工作；(五)改善人民生活。四項保證是：(一)在全國範圍內停止推翻國民政府之武裝暴動；(二)蘇區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直接受南京政府與軍事委員會之指導；(三)在特區政府區域內，實施普選的徹底民主制度；(四)停止徵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堅決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共同綱領。二中全會對中共提議沒有什麽表示，也沒有公然拒絕，另通過一個「根絕赤化」案，表示對共黨問題也採用和平解決的辦法。在會議中，宋慶齡等十三人提「恢復中山先生手訂聯俄聯共擁護農工三大政策」，此案未公開發表。這次會議確定了對內和平方針，可說是確定了抗日的前提條件。到八月廬山談話會中，蔣委員長講演，就宣稱「如果戰端一開，就是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接着，國民黨代表蔣中正、張冲、邵力子與共產黨代表周恩來、秦邦獻、林祖涵在廬山會談，蔣委員長允許公布承認陝甘寧邊區。九月，各報登載中共共赴國難的宣言，內面提出前述的幾點保證及實行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蔣委員長

隨即發表談話，表示「開誠接納」「不問過去」。從此，國共合作的新局面開始，國內和平統一實現。國府任命朱德為十八集團軍總司令，彭德懷為八路軍軍長；又將南方各省游擊隊合編為新四軍，以葉挺為軍長。他們這些裝備較劣的軍隊，在抗日戰爭中活躍於廣大敵佔區，以游擊戰運動戰困擾敵人，建了不少的奇功。

抗戰第一階段

抗日戰爭從廿六年七七蘆溝橋事變到卅四年八月十日日本投降止，共經八年之久。大致可分為兩個階段，以廿七年十月武漢失守為界限。第一個階段經過的時間只有十五個月，却是在抗戰史上比較值得讚揚的時期。

在軍事上雖然是敵進我退，喪失了平、津、京、滬、青島、濟南、保定、太原、歸綏、張家口、徐州、武漢、廣州等大城市，失去了北寧、平綏、津浦、京滬、平漢各鐵路及隴海路東段，粵漢路兩端的控制權，大體上總算是認真作戰。像濟南韓復渠大同李服膺的開門迎敵，察哈爾劉汝明平漢路劉峙的不戰而退，以及南京之役，指揮二十萬大軍的唐生智，倉皇奔逃，弄得全軍潰散，難民不及撤退，爭渡淹死及被敵人屠殺者二十多萬，固然是污點，但仍然是個別的例子。全國軍隊抗戰情緒很高，有許多打得很好的戰役，如八・一三到一一・九的淞滬戰役，與敵周旋三個月之久，同時北方的南口戰役，次年的臨沂之戰，台兒莊之戰，即裝備不好的八路軍也是一開始就有平

型關（山西）的大捷，接着深入敵後，建立許多抗日根據地。就戰略說，因爲敵人的裝備比我們的好，第一階段的戰略本應以消耗敵人力量爲主，對一城一地的得失不必太顧及；不過執行此等戰略，必須有戰役的攻勢，必須在每次撤退前使敵人付出很大的代價，那種無計劃的潰退是不能容許的。

抗戰初期的外交，最重要的是二十六年八月中蘇互不侵犯條約的訂定，明白表示中國不參加德日意的反共陣線。這時期中的國際援助以來自蘇聯者爲多，包括道義上聲援以及物資、武器、借款等項，蘇聯還有空軍人員志願隊及軍事顧問來華參加抗戰。英美也以道義上的援助及借款給中國，但同時美國又以汽油廢鐵接濟日本。當時德國早已承認僞滿，而且由駐華大使陶德曼替日本暗中勸中國降服，以內蒙獨立，華北自治及共同防共爲條件，恢復和平。在抗戰開始後，汪精衞仍然主張一面交涉一面抵抗，後來又主張走德意路線，當時國防最高委會對德大使調停曾有所討論，但汪派主張未能通過，因人民抗敵情緒很高的緣故。

抗戰初期的政治雖然還是國民黨獨裁，但比較抗戰前是要民主一些。如釋放政治犯，短期的局部的開放做救亡工作的自由，容許進步出版物之發行。又，二十七年四月，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通過抗戰建國綱領三十二條，曾獲得各黨派的同意。大會

以後，設立國民參政會爲備諮詢的準民意機關，雖然不是由人民選舉，也沒有實際權力，但邀了各抗日黨派及各界優秀分子參加，總算讓黨外人士有貢獻意見的機會。假如照着這個民主化的道路繼續前進，政治的進步是滿有希望的。

抗戰第二階段

抗戰第二階段，因敵人已佔廣大地區，需要一個時期將它消化，暫時不再向交通不便的西部中國前進，所以軍事形勢大體上是敵我相持。但政治形勢則逆轉後，團結發生問題，抗戰情緒一般低落，士氣不振，戰鬥力量逐漸減低，變成了一種苟安狀態。最後造成了三十三年軍事上的大撤退。幸虧國際的壓力迫使日本投降，否則抗戰局勢的變化和過程的艱苦，將更不堪設想。

日寇侵略我國，向來採用「以華制華」的政治陰謀，它自從佔平津京滬以後，就成立了華北華中的兩個僞組織，又勾結素來親日的汪精衛，想分化我抗戰的陣營。可是汪精衛的抗戰必敗的論調，早已被人家打擊得「體無完膚」，德大使的誘和又不成功，日寇知道他留在抗戰陣營內的漢奸作用已減弱，便把他拉到南京去組織僞國民政府，來動搖抗戰的重慶。二十七年年底汪精衛由戰時首都出走，經河內發出艷電主和。廿八年一月，國民黨決議開除汪的黨籍，黨內已無明顯宣傳失敗主義的人。但若干重要人物如陳

公博周佛海褚民誼陳羣繆斌之流，仍然大批大批的隨汪先後投敵。日汪還時常向重慶招手誘和。二十九年，日方爲試探和平，且將桂南軍隊自動撤退。這時重慶內部對抗戰有徹底信心者也很少。有人解釋抗戰到底的「底」只是恢復蘆溝橋事變以前狀況，而不是收復一切失地。有人認爲抗戰勝利只有倚賴國際干涉，英美調停。因此他們所想望的只是苟且偏安，和日偽相當地和平共處，以拖延時日。

這時英美等國口頭上對中國表同情，實際上仍不斷給日人以援助。如英國在廿九年一度封鎖滇緬路，又曾承認日人攫奪我海關稅的辦法，曾將我存天津白銀移交日人；美國繼續接濟日本；法國對德屈服後，容許日人進佔安南，威脅我西南的安全。二十八年七月英日簽訂有田克萊琪協定，不僅是解決天津事件，同時還有醞釀「遠東慕尼黑」（即將中國權利慷慨送與日本）的作用。三十年夏間，美國亦曾一度調停中日戰爭。

在此時期，蔣委員長雖然官式地駁斥汪日密約之類的日偽文件，但民衆中的反汪宣傳或示威則被政府禁止。德蘇戰爭後，政府雖因德意承認汪記偽組織，已與德意絕交，但仍有德意路線派在重慶公開鼓吹德日必勝論，及宣傳希特勒黨徒的「大地政治學」。

三十年冬，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英美對日宣戰，中國也跟着正式對日宣戰，同時對德意宣戰，並參加了二十六聯合國發表宣言。但因英美戰爭初期不利，中國方面對抗

戰悲觀情緒更增加，日方又加強和平攻勢，於是我方將領投敵的如龐炳勳孫良誠之流，爲數不少。龐炳勳部下軍官還自稱奉有密令，就是反共第一，抗日第二。

龐所說的話可說是抗戰第二階段的特徵。因爲若干將領，已將抗戰初期「抗日第一」的信念改變，所以作戰不起勁。雖然像二十九年張自忠殉難的襄河之役，三十二年冬開羅及德黑蘭會議時的常德大捷，這些個別的戰役，都是值得稱道的，但許多其他的捷報如長沙三次會戰，鄂西、桂南的日軍撤退等，實際都是日方誘和的姿態。而如長沙大火（廿七年十一月），宜昌棄守（廿九年），浙贛線撤退（三十一年）滇西失陷（三十一年）以及三十三年的中原大敗及湘桂黔大奔逃的慘劇，尤其是後期軍事怠工的顯著結果。

造成這種現象（抗日第二）的根本原因是政治上的矛盾（反共第一）。國共兩黨的關係不如抗戰初期的好，摩擦日益加深。因朱德部隊及華南抗日縱隊在敵後會發動百團大戰等戰役，粉碎日方的「掃蕩」政策，截至戰爭結束前，擴大解放區到十九個區，解放人民至一萬萬以上，正規軍增至九十一萬，民兵二百三十餘萬，這種勢力的膨脹，很爲國民黨所不喜歡，故曾由張蔭梧石友三等在敵後和共軍摩擦，又以裝備優良之胡宗南部隊數十萬經常包圍陝甘寧邊區，並封鎖特區經濟。三十年春天，參謀部強迫將皖南新四軍北調，又於途中襲擊，俘軍長葉挺，明令解散新四軍。在後方，則因防範共黨及壓

制一切民主分子的緣故，加緊剝奪人民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之自由，以恐怖手段，壓迫救亡青年退出抗戰崗位。若干新的祕密法規如「限制異黨活動辦法」「共黨問題處置辦法」「淪陷區防範共黨活動辦法草案」等都成爲此時各級文武官所切實奉行的寶典。抗戰初期，本來因爲民衆沒有充分自由，動員不夠深入，到了後期，自由全被剝奪，民運完全停止，動員便更動不起來；行政官吏自中央以至鄉保，貪汚橫行，益無忌憚；以致國計民生，都走到山窮水盡，前方兵士喝白粥，後方飢民食草根；徵兵變作抓丁，征糧成爲勒索。政治力量削弱到這樣，憑什麼抗敵呢？

政治力量減弱的癥結既然由於國共兩黨的摩擦，各中間黨派便發動了調停的運動，共黨也提出民主團結的要求，但國民黨則用預備立憲的姿態來敷衍。三十年，各中間黨派組織民主政團同盟，後來擴大爲民主同盟，從事於「政治民主化」與「軍隊國家化」的運動。三十三年，共產黨提出「聯合政府」的口號。但國民黨堅持國民黨的法統，不肯和其他黨派平等聯合。故政治終於不能好轉。

勝利終於到來

中英美聯合抗日以後，英美對華宣布放棄領事裁判內河航行等特權，交還租界（民卅二。事前日本對汪記僞組織已做了這一套）。卅二年冬，中英美三國首長在開羅會議，宣布了對日戰爭目標，就是剝奪日本侵略所

得的權益，及由中國收回東北和台灣等項。一九四五年(民卅四年)七月，英美蘇領袖在德國波茨坦會議，我國與英美也根據開羅會議的條件，從波茨坦發出向日本招降的宣言。

八月八日，蘇聯對日宣戰，蘇軍進入東北。這時候，美軍在太平洋的進攻也逼近了日本本土。八月十日，日本對盟軍宣布投降，我們的最後勝利終於到來了。但這時候，東邊的半個中國，還是日軍佔領區。八月十四日，中蘇友好同盟簽字，中國允許戰後將東北鐵路兩大幹線及大連商港、旅順軍港與蘇聯共用三十年，以合力預防日本侵略的再起。同時承認外蒙古人民有組織獨立政府的自決權。到九月初，蘇軍及外蒙軍把東北的日軍（所謂關東軍，是日本強有力的部隊，數量約百萬）全部解除了武裝。這時候，和蘇聯配合作戰的中共軍隊，在華北和東北的力量增加了不少

日人失敗的因素，一方面是我國軍民的堅決抗戰，另方面是德意兩侵略幫夥垮台，美軍在太平洋的反攻勝利，以及八月八日的蘇聯對日宣戰

抗日戰爭的勝利結束，早在我們意料之中，但日閥投降之早，卻出我們的意外，因為日本主力軍並沒有完全崩潰，日軍佔領地還非常廣大，特別是中國戰場，我們反攻大決戰還沒有開始。日本之所以投降，是看到世界大勢，法西斯必然失敗，民主國必然勝

利，與其蠻幹到底，徒然作無謂犧牲，倒不如提早收束，還可保存幾分人力、物力，作異日捲土重來的基礎，尤其是藉此可以分化利害不一致的美蘇，可從中得到若干的好處。因爲這個緣故，在中國戰場裏，就表現日軍投降的不爽快性。加之國共兩黨合作不圓滿，便因受降造成了內部糾紛。

勝利以後的民主運動

當日本乞降的時候，我中央軍還在西南各省境內，日軍主力所在的沿江沿海以及華北各地，多半在八路軍新四軍及他們所領導的民兵包圍之中，東北日軍則被蘇聯軍隊繳械。這時候，共產黨方面主張仿德軍投降前例，各地敵軍向當地我軍部隊投降，但國民黨方面則主張由大後方派中央軍到各地受降，於是由蔣委員長命令敵僞軍須向陸軍總司令何應欽所指揮的部隊投降，不得向其他部隊投降，又命令十八集團軍不得移動。事實上則自蘇聯對日宣戰那一天起，朱德下令反攻，到日本乞降以後，他們的軍事行動毫沒有停止。據他們的報道，這九年來他們在敵後方抗戰，建立了十九個解放區，主要的在晉綏熱察冀魯遼豫蘇浙皖鄂各省。當中央軍由美機美艦運到及由陸路開到黃河流域各省受降時，須首先佔領他們的防區，因此便和他們發生軍事衝突。而敵軍僞軍則延未繳械。

八月間，國府蔣主席電邀中共領袖毛澤東到重慶商談國事，毛氏到渝後，雙方又派

出代表商談。經過四十多天，於雙十節發表國共會談紀要，表示兩黨必須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團結、統一爲基礎，並在蔣主席領導之下，長期合作，堅決避免內戰，建設獨立自由和富強的新中國。關於人民自由，黨派平等合法，禁止特務捕人，釋放政治犯諸事，也獲得協議。軍隊國家化問題，中共承認在民主政府公平合理整編之下，可將中共領導的抗日軍隊縮編爲二十師。但中共解放區民選政府，國府不肯承認。嚴懲漢奸，解散敵僞軍，共同受降等事，沒有具體解決。國民大會及憲草諸問題，也未曾獲得協議，雙方同意召開各黨派人士與社會賢達之政治協商會議再行商討。

在此次商談後，雙方同意之事項，如保障人民自由等，延未實行，而軍事衝突更比以前擴大，至卅四年十二月十五日美總統杜魯門發表對華聲明，重申支持國民政府，盼中國各黨派協商擴大國民政府，同時具廣泛代表性之政府成立後，自主性之軍隊應合併爲國軍，美國對和平團結之中國，願予以擴大之經濟與軍事幫助，且不參加內戰。不久延安代表到渝，美特使馬歇爾將軍亦來華，局勢好轉，政治協商會議終於卅五年一月十日在重慶開幕。參加者除國共兩黨外，還有民主同盟及青年黨的代表，以及無黨派的社會賢達。開會的一日，國共雙方下令於十三日起停止軍事衝突。並由國共美三方組織軍事調解執行部於北平，分派人員赴火線上調停。

政治協商會議開會兩旬，通過了和平建國綱領。關於改組國民政府，修改憲法草案，召開國民大會，整編軍隊等問題，也都有相當詳明的原則上的協議。

和平建國綱領的主要原則是「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及黨派平等合法。其餘要點是切實保障人民基本權利；積極推行地方自治；實行縣長民選；尊重少數民族（指人數較少的各族如蒙、藏、回、苗等）地位；實行軍黨分立，軍民分治；公平整編軍隊；與盟邦共策世界安全，防止日本法西斯再起；防止官僚資本的發展；實行減租、減息；保障學術自由等等。

改組政府的主要內容，是國民政府委員名額定為四十名，國民黨佔半數，其餘選任各黨派及社會賢達，行政院各部會及擬設的不管部政務委員也以七八席請國民黨以外人士充任。此案實際上仍然保持國民黨的絕對優勢，在各黨派是作了大的讓步的。

修改憲草的原則是加強立法院職權，並由人民直接選舉，使行政院對民意機關負責，不至於獨裁。

國民大會問題；各黨派也十分遷就政府黨的意見，抗戰前選出的代表仍認為有效，但去掉指派的代表，另新代表八百餘名。

軍事問題，注意「以政治軍」及公平整軍的辦法。

這次協議，各民主黨派對國民黨作了很大的讓步，但少數頑固分子仍不滿意。政協會閉幕不久，重慶的校場口血案，昆明的李（公樸）聞（一多）被刺案相繼發生，黨派摩擦越來越大，政協決議無形破壞，國內局勢又一步步轉入全面內戰的時期了。這個時期，每個中國人的主要任務，是爭取民主。有了民主，國內的和平和統一才可以實現。

大事年表

（書中紀年，或用國曆，或用公曆，不免參差，請讀者參照此表。）

公曆紀元	民國紀元	帝王紀元	干支	大事記
一八四〇	前七二	清道光二〇	庚子	鴉片戰爭開始。
一八四一	前七一	二一	辛丑	平英團舉義。
一八四二	前七〇	二二	壬寅	中英訂南京條約。
一八四三	前六九	二三	癸卯	南京增補條約成立。
一八五〇	前六二	三〇	庚戌	洪秀全起義。
一八五三	前五九	清咸豐三	癸丑	太平軍佔領南京。
一八五六	前五六	六	丙辰	英人借亞羅船案挑戰釁。
一八五七	前五五	七	丁巳	英法聯軍開始進攻。
一八五八	前五四	八	戊午	與英法議和，訂天津條約。
一八五九	前五三	九	己未	英法聯軍入北京，訂北京條約。中俄訂北京條約。
一八六四	前四八	清同治三	甲子	湘軍攻破南京。
一八六五	前四七	四	乙丑	太平軍消滅，一部分加入捻黨。
一八六六	前四六	五	丙寅	北方捻黨亂事擴大。
一八六八	前四四	七	戊辰	捻黨消滅。日本明治維新開始。
一八七一	前四一	一〇	辛未	臺灣生番劫殺琉球人案發生。
一八七四	前三八	一三	甲戌	日本借口琉球人案攻臺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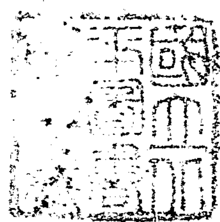
西元	民國	清光緒	干支	記事
一八七五	前三七	一	乙亥	日本與韓國訂江華條約。
一八七九	前三三	五	己卯	日本滅琉球。
一八八四	前二八	一〇	甲申	中法戰爭發生。
一八八五	前二七	一一	乙酉	中法在天津議和。中日訂約，認朝鮮爲中日共同保護國。
一八八六	前二六	一二	丙戌	英國佔緬甸，中英訂約加以承認。
一八九四	前一八	二〇	甲午	中日爲朝鮮問題開戰。
一八九五	前一七	二一	乙未	中日訂馬關條約。俄法德三國干涉日本。
一八九六	前一六	二二	丙申	中日訂通商條約，訂交還遼東半島條約。中俄訂密約共防日本。
一八九七	前一五	二三	丁酉	德國藉口曹州教案，出兵山東。
一八九八	前一四	二四	戊戌	中德訂膠州灣租借條約。光緒維新失敗，俄國租借旅順大連。日本要求不割讓福建給他國。法國租借廣州灣。英國租借威海衞九龍。
一八九九	前一三	二五	己亥	美國發表開放門戶政策。英俄在中國勢力範圍劃定。
一九〇〇	前一二	二六	庚子	八國聯軍攻佔北京。
一九〇一	前一一	二七	辛丑	辛丑和約成立。
一九〇二	前一〇	二八	壬寅	英日同盟。
一九〇四	前八	三〇	甲辰	日俄開戰。
一九〇五	前七	三一	乙巳	日俄訂朴資茅斯和約。中日訂滿州善後條約。革命同盟會成立。
一九〇六	前六	三二	丙午	民報及新民叢報創刊。清廷宣布預備立憲。英日新同

				盟成立。日本在我東北設立關東都督府及南滿鐵道株式會社。革命黨在萍醴起義。
一九〇七	前五	三三	丁未	革命黨在潮惠及欽廉起義。又在鎮南關起義。
一九〇八	前四	三四	戊申	清廷公布預備立憲期限爲九年。革命黨在河口起義。
一九一〇	前二	清宣統二	庚戌	日本宣布日韓合併。日俄成立協約。
一九一一	前一	三	辛亥	革命黨在廣州起義。殉難者七十二人。川湖等省發生鐵路風潮。大革命在武昌爆發。英日第三次同盟。
一九一二	一			中華民國成立。改用陽曆。
一九一三	二			袁世凱暗殺宋教仁，免國民黨三都督職。討袁軍失敗。日本要求滿蒙五路敷設權。
一九一四	三			歐洲大戰發生。日本攻佔膠州灣。
一九一五	四			日本強迫中國承認二十一條件。「新青年」出版。袁世凱決定稱帝，護國軍在雲南起義。
一九一六	五			袁世凱稱帝，改元「洪憲」，數月後又宣布取消。袁死，舊國會恢復。
一九一七	六			北方督軍團宣布獨立。南方成立護法軍政府。張勳復辟運動失敗。英俄日法意五國訂立密約，承認日佔山東。我國對德宣戰。
一九一八	七			中日軍事協定成立。北軍入湖南，護法軍戰敗。歐戰終止。俄新政府宣布取消不平等條約。
一九一九	八			因山東問題交涉失敗，發生「五四」運動。上海舉行南

西元	民國	大事
		北和議。中華革命黨改名中國國民黨。「建國」雜誌出版。
一九二〇	九	直皖戰爭發生，皖系失敗。
一九二一	一〇	中日軍事協定取消。華盛頓太平洋會議開會。五月五日，國父就任非常總統。七月，中國共產黨成立。
一九二二	一一	湖南公布省憲法，標榜「聯省自治」。直奉戰爭發生，奉系戰敗。孫越協定成立。
一九二三	一二	平漢路「二．七」慘案發生。曹錕以賄選得任大總統。
一九二四	一三	中國國民黨改組，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決定聯俄，聯共，扶助工農三大政策。中蘇訂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定。直奉戰爭發生，馮玉祥倒戈，推倒曹吳，段祺瑞出任執政。國父北上。
一九二五	一四	國父逝世。「五．卅」慘案發生。北方發生反奉戰爭。廣東肅清反革命武力。國民政府成立。
一九二六	一五	國民黨召開二全大會。北京發生「三．一八」慘案。國民政府北伐。
一九二七	一六	英國退還漢口九江英租界。國民黨清黨，取消三大政策，國共兩黨分裂。國民政府定都南京。
一九二八	一七	濟南發生「五．三」慘案。國民政府統一全國。號召土地革命之朱毛紅軍在江西成立，國府派大軍圍勦。

公元	民國	大事
一九二九	一八	中央軍西征。中東路事件發生。
一九三〇	一九	中央軍討汪。紅軍一度入長沙。
一九三一	二〇	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佔據東三省。國民政府公布訓政時期約法。
一九三二	二一	中日在上海開戰，後訂停戰協定。東北傀儡國成立。國府在洛陽召開國難會議。中蘇恢復邦交。
一九三三	二二	日本佔據熱河，進窺平津。中日訂塘沽協定。
一九三四	二三	偽滿洲國改稱滿洲帝國。日本發表「四四一七」天羽聲明。朱毛紅軍北上。
一九三五	二四	日本提出「中日經濟提攜」口號，並在華北大量走私。中國受日本壓迫，訂立何梅協定。殷汝耕成立冀東偽組織。冀察政務委員會成立。北平發生「一・二九」救國運動。上海成立救國會。
一九三六	二五	華北走私猖獗。蒙偽軍侵綏遠，被我軍擊退。國府公布「五・五」憲草。兩廣「六・一」運動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和平解決。
一九三七	二六	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通過根絕赤化案，接納共產黨一致對外的建議，開始進入和平統一的道路。盧溝橋事變發生，中日大戰爆發。朱毛紅軍改爲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總部設延安。中蘇互不侵犯條約成立。國府遷重慶。
一九三八	二七	國民黨臨全大會開會，通過抗戰建國綱領。十月國軍

一九三九	二八			退出武漢。十八集團軍開始在敵後方發展游擊戰爭，建立解放區。國民黨開除汪精衛。日汪訂密約，汪成立南京偽組織。
一九四〇	二九			日寇進佔安南。
一九四一	三〇			皖南事件發生。日對英美宣戰。我對日德意宣戰。
一九四二	三一			我軍入緬抗日。臘戍陷落，滇緬路封閉。
一九四三	三二			中英中美訂平等新約。中美聯軍入緬北掩護修築雷多公路。中英美三巨頭在開羅會議。
一九四四	三三			中美聯軍在緬北進展甚大。日軍打通平漢路，竄入湖南、廣西、一度犯黔南。國共商議改進合作辦法，中共及民主同盟，提出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的主張。
一九四五	三四			滇緬路打通。中國陸軍總司令部成立於昆明，編練美械部隊，準備反攻。中蘇英美發起聯合國大會，在舊金山開會。國共兩黨各舉行全國代表大會。波茨坦對日招降宣言發表。蘇聯對日宣戰。十八集團軍在華北反攻獲勝，進入張家口烟台。日本對盟軍投降。中蘇訂立三十年友好同盟條約。國共會談紀要在雙十節發表。
一九四六	三五			政治協商會議在重慶開會，議決和平建國綱領等案。國府還都南京。



中國近百年史講話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七月初版

著作人　曹伯韓

發行人　孫明心

發行所　致用書店
上海武昌路四七六號

特約分銷處　利羣書報發行所
上海河南路三二八號

聯營書店
重慶・漢口

△定價每冊四元八角

定價

$4.80